

## 目 录

- 诡谋直纪·····毕永年（1）
- 薛福成书札·····薛福成（5）
- 陈其美函牍·····陈其美（42）
- 伪廷幽影录  
——汪伪情况的回忆写实·····罗君强（61）
- 千里哀鸿说“清乡”·····汪曼云（144）

# 诡谋直纪

毕永年

**编者按：**本件记述戊戌政变前夜，康有为等密谋利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乘机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情况。对戊戌密谋，康有为、梁启超一直矢口否认，史家们也大都不予置信，从而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件疑案。本件为解决此案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证据，是研究戊戌政变史的第一手重要资料。此件约写作于1899年初，写成后，毕永年将它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又将此件抄送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现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号为1·6·1·4——2——2。本件由杨天石同志据影印件整理。

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暂寓广陞〔陞〕店。

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往见康，仆即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旧友乍逢，欣慰之至，且得悉闻康之举动，盖钱亦有心人也。

二十九日。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夜九时，召仆至其室，谓仆曰：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仆曰：

“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闻其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康曰：“袁前两日

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袁〕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往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仆曰：“然则仆当以何日见袁乎？”康曰：“且再商也。”正谈之时，而康广仁、梁启超并入坐。梁曰：“此事兄勿疑，但当力任之也，然兄敢为此事乎？”仆曰：“何不敢乎？然仆当熟思而审处之。且尚未见袁，仆终不知其为何如人也。”梁曰：“袁大可者，兄但允此事否乎？”仆此时心中慎筹之，未敢遽应，而康广仁即有忿怒之色。仆乃曰：“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何不急催唐君入京而同谋之乎？”康、梁均大喜曰：“甚善！甚善！但我等之意欲即于数日内发之。若候唐君，则又多需时日矣，奈何！”踌躇片刻，乃同至谭君之室商之。谭曰：“稍缓时日不妨也，如催得唐君来，则更全善。”梁亦大赞曰：“毕君沈毅，唐君深鸷，可称两雄

也。”仆知为面谏之言，乃逊谢不敢焉。康曰：“事已定计矣，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乃共拟飞电二道，连发之而催唐氏。

初二日。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又不知康氏如何令我见袁之法，且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则仓猝之间，彼此交浅，何能深言，又何能行事耶？心中不决，乃与广仁商之。广仁大怒曰：“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及至做事时，乃又拖泥带水。”仆曰：“非拖泥带水也，先生欲用我，须与我言明办法。我一命虽微，然不能糊涂而死也。凡事贵审谋熟虑，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以我意不能置一辞乎？且先生令我领百人，此事尤不可冒昧。盖我系南人，初至北军，而领此彼我不相识之兵，不过十数日中，我何能收为腹心得其死力乎？即起孙、吴于九原，而将此百人，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理。况我八岁即随吾父叔来往军中，我知其弊甚悉，我以一有母丧之拔贡生，专将此兵，不独兵不服，即同军各将，皆诧为异事也。”广仁不悦，冷笑而出。夜七时，忽奉旨催康出京，仆曰：“今必败矣，未知袁之消息如何？”康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康亦盛气谓仆曰：“汝以一拔贡生而将兵，亦甚体面，何不可之有？且此事亦尚未定，汝不用先虑也。”仆知广仁谮我，盖疑我为利禄之徒，以为我欲得官也，可笑可笑！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恢恢

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仆曰：“袁究可用乎？”谭曰：“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仆曰：“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仆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午后一时，仆乃迁寓宁乡馆，距南海馆只数家，易于探究也。

初五日。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探谭君则已迁寓浏阳馆。午十二时，广仁及梁君两降阶迎仆，携仆手曰：“兄来甚善！我等欲荐兄往李提摩太之寓，为其笔述之任，可乎？”仆佞曰：“我非来京觅食者，因先生命我留京，欲令我助彼，故我滞此多时。今先生既出京，而前事已作罢论，则仆亦须东往日本，践徐君之约矣。仆岂来京觅食者乎？”即愤然辞出。夜十时，即致一书与谭，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也。并致一书与梁作别，梁复书欲仆于次日午十二时在寓候彼，尚有多事相商，并云：“公行何神速也？”

初六日。早七时，仆急驰出京，而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

# 薛福成书札

薛 福 成

**说明：**这里所收集的是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及其兄弟薛福辰、薛福祁、薛福庚的信，但其中主要是薛福成致上海招商局会办沈能虎(字子梅，浙江海盐人，官直隶通永道)的信。

薛福成书札作于1875年至1884年之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那时，薛福成正在李鸿章幕下办洋务，直至1884年，始出任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在镇海参与击退法国侵略军之战。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直至1893年任满回国。

薛福成主张实行改革，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工商，兴办教育，变法自强。1879年他写的《筹洋刍议》，提出了变法主张，对当时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他与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均以“谙练洋务”著称于世。

薛福成及其兄弟的书札内容，涉及清廷与英、日、俄、法等国的外交和军事，也反映了薛氏同当时重要人物的接触、交往和对他们的评论。此外，还有不少掌故轶闻，都可供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志作参考。

薛氏书札的注释，应感谢无锡薛民见先生。过去我从他编的《薛福成年谱》(未刊稿)中，曾摘录了一些有关薛氏生平的资料。此外，还应感谢年近九十的郑逸梅先生。他在百忙之中为我题跋。因我水平有限，在标点、注释及判断函札年、月的过程中，或有不妥之处，请大家予以指正。

彭长卿

## 薛福成致沈能虎书札

### 一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保阳畅叙，借罄积棕；阔别兼旬，倍深结轳。比维勋猷懋著，潭祉绥愉，无任企颂。弟自初十日启程后，十四日始抵津门，暂居天津县署内，随班听鼓，匆匆未修音敬，至以为歉。顷蒙伯相<sup>①</sup>雅意，殷拳招入幕中，俾处朱亮翁<sup>②</sup>前年所居之室，拟于明后日搬进，惟与同幕声气相隔，饮食颇多不便耳。弟到津未久，百务生疏，尚祈时锡南针，俾不致迷于所向；受赐实多，曷胜翹盼。承索观拙作《治平六策》，兹将原稿寄呈，冀叨教益，仍望转交亮翁一阅。肃此，敬请勋安，诸希朗鉴，不宣。七月三十日（1875年8月30日）。如弟薛福成顿首。致亮翁书一函，亦希转交为荷。

### 二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奉手书，具聆一是。此间于廿二日夜获雨，号称三寸，只能润土，尚无益于播种。闻各州县亦得二三寸雨不等，此后如能续沛甘霖数次，或者补栽秋稼，冀于岁事稍有裨益耳。水月庵寄存军械，不戒于火。所幸火药、火箭已于数日前运去城中，民居及附近房屋尚无损伤。约计焚失帐棚、洋枪、铜帽等件，合算不到十万之数，亦不幸中之幸也。滇案<sup>③</sup>自经星使<sup>④</sup>复奏后，威酋<sup>⑤</sup>以未满所欲，在都颇肆咆哮，百端要

① 指李鸿章。

② 朱亮翁即朱采，字亮生，浙江秀水人。李鸿章幕僚。

③ 1875年英国在我国云南制造的边境事端，也称“马嘉理案”。马嘉理（A.R. Margary, 1846—1875）历任驻台湾、烟台、上海领事，1875年2月21日在滇境被人杀死。

④ 指湖广总督李瀚章，清廷派他作钦差大臣查办滇案。

⑤ 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F. Wade, 1818—1895）。

挟。去岁彼族所衔恨者，莫如李珍国及岑中丞<sup>①</sup>；今中国既予李应得之罪，彼之意偏又不着重在李，并又不着重在岑。观其盘旋作势，总欲乘此机会尽收中国利权，而所谓“抚恤”、“抵偿”等事，皆所不甚措意者也。刻下总署<sup>②</sup>连日与之辩论，未见端倪，彼此所谈，相离尚远，恐非数月以后不能稍有眉目耳。《曾文正事略》一部，已在幼兄<sup>③</sup>处找到。恕轩<sup>④</sup>仅挑誊录，可惜之至。兹有省垣贺节信三封，弟处难觅申封，特行寄上，敬祈飭送为感。肃此，敬颂勋安，诸惟荃鉴，不宜。如弟薛福成顿首。廿八日（1876年6月19日）。亮生仁兄大人均此致候，不另。

### 三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昨接手书，敬聆一是。家兄<sup>⑤</sup>在京，住东华门之关帝庙。昨阅京报，已于廿二日召见，大约六月初旬即可出都，过津时，或当小住数日。威酋徘徊沪上，近数日来尚无动静，计有兵船八号往来游弋，窥其全神所注，专在厘金。前此赫德<sup>⑥</sup>递节略七条，无论洋土各货，华洋各商，总署已允其正子并交后一概免厘；如是，则内地之厘亦当减去十之八九矣。即幸而了结，亦已不堪设想。赫德去后，尚无回音，但恐威酋得步进步，要求无厌，且肆其恫喝故智，久必弄假成真，以为婪索兵费地步。调兵之说，各报言之凿凿，殆非无因；果尔，则津门必首当其冲。明知设防无益，然人事似不可不尽。刻下大支劲旅多扎大沽、新城一带，然敌船闯入紫竹林，我军必不敢拦也。何也？

① 岑中丞，岑毓英（1829—1889）字彭刚，广西西林人。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

②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

③ 徐庆铨字幼岩，李鸿章幕僚。

④ 钱荣增字恕轩，李鸿章幕僚。

⑤ 指薛福辰（1832—1889年）字抚屏，别号耐斋。官至山东济东道，补天津府。

⑥ 赫德（R. Hart, 1835—1911）英国人，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达四十八年之久。订立《烟台条约》时，担任李鸿章的助理，配合威妥玛的讹诈活动。



恐其借口而开衅也。然敌船到紫竹林以后，我军皆隔在后路，彼可直扑津城，径窥都门，殊为可虑。故必内地另扎劲军，然后与大沽声势联络，彼亦有腹背受敌之虑。“声援壮，而人心固”，将来议和之时，彼之要挟或可略减一二分。劲军之可调者，如河南宋庆<sup>①</sup>一军、山西树字六营<sup>②</sup>、济宁铭军<sup>③</sup>皆是也。鄙见如此，未识尊意以谓〔为〕何如？直省雨水沾足，至为可喜。闻北运河又有开口之说，想尚无大碍耳。专泐，敬颂勋祺，诸惟鉴察，不宣。如弟薛福成顿首。闰月廿七日（1876年7月18日）。如夫人有喜信否？何时可吃喜酒也，祈示知。

#### 四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昨奉手书，敬聆一是。伯相烟台之行，廷旨不稍松动，连日群议汹汹，绅民悬留。想翰翁<sup>④</sup>信中已备述其详，无庸赘叙。刻下许星使<sup>⑤</sup>、马松圃率绅耆二十余人赴烟未返。闻威酋亦尚未到烟；果尔，则伯相启节之期尽可稍缓矣。家兄迟迟未到，来信云：至早须于望后出都。昨李和帅<sup>⑥</sup>又适进京，或再停留数日，则到津当在二十以外也。弟期满甄别公文已于翰翁处见到，费神之至。兹有复蒋君<sup>⑦</sup>一函，仍希飭送为荷。九月间，藩宪六秩大庆，其正生日系是十八日否？所有应送公分，弟已搭入江苏人员帮内。昨吴元翁<sup>⑧</sup>到津，弟曾将衔名开去，仍请执事于便中代为一托汪贲翁，此事闻系贲翁承办也。专泐，敬请勋安，顺颂潭祉。如弟薛福成顿首。十九日（1876年8

① 宋庆（1820—1902年），字祝三，山东蓬莱人。时为四川提督。

② 树字六营，指张树声（1824—1884年）所部之军。

③ 铭军指刘铭传（1836—1895年）所部之军。

④ 景文照字翰青，贵州人。李鸿章幕僚。

⑤ 许铃身字仲鑑，浙江钱塘人。时为驻日副使。

⑥ 河道总督李鹤年，字子和。

⑦ 蒋汝修。

⑧ 即吴元柄，字子健，河南固始人。江苏巡抚。

月8日)。弟于刘观察处<sup>②</sup>，亦拟搭送一幛，但须用属员例书写官衔；或不便搭入幕中，祈为代搭入候补员中。感荷无既。

## 五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奉十三日手书，敬聆一是。敝著《筹海刍论》四篇，前承索观，兹将原稿寄上一阅。此中以何篇为切要，尚希详示；仍请于十日内将原稿掷还，缘舍弟在信亦欲一览，即拟以此稿寄之也。密老<sup>③</sup>已经枢府奏留，仍在章京上行走，为之一慰。望洲拟于七月初五日入都赴任。霖兄尚在津门，□已于五月内捐离原省，其捐省银两亦已先交，将来验放时，即可随意指分一省，缘渠于直、浙、闽三省中，尚须决择也。罗公以道员特发直隶。统计今年骤添道员十余位矣。伯相谓“人才济济，位置实难”，殆非虚语。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廿九日（1879年8月1日）。

## 六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昨奉二十日手示，敬聆一一。伊犁之事<sup>④</sup>，昨奉寄谕，交此间及左、沈<sup>⑤</sup>诸公密商补救之策，然木已成舟，亦复何术挽回。崇帅<sup>⑥</sup>出去时打定主意：索到伊犁即可回华销差，其余一切不顾。此事错在遣使之时，总署自知吃亏甚巨，悔之何及。赫议<sup>⑦</sup>经南洋痛驳，伯相亦函复总署，意在劝

① 刘含芳字芑林，安徽贵池人。

② 钱应溥字子密，浙江嘉兴人。后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③ 1878年清廷派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擅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Н·К·Гирс）签订《里瓦尼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④ 左宗棠、沈桂芬。1875年清廷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收复天山北路、南路。在中、俄交涉中，他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沈桂芬时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⑤ 崇厚（1826—1893）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

⑥ 赫议，指赫德所言。

阻，或竟可作罢论。蜀事颇末，接来示，始知其详。王商二万金之说，前见邸钞。适有苏人自南来者，自称与王余照相交最熟（王与彭若亭<sup>①</sup>方伯系儿女姻亲），弟即以此节询之。据称，王商去秋汇银二万入都，今春复汇银三万，皆因与令威<sup>②</sup>斗法而没。此事蜀人皆知之（并其所汇之银号及时候，皆言之凿凿），无所用其讳匿；惟何人所用，则不可知。又称，王商仇家在蜀帅<sup>③</sup>处控王商十款，其一贖买参摺，其一私设水卡。事诚有之，然王商所收卡利，并无一钱入己，尽以遗都中绅宦。今蜀帅禁止水卡，蜀绅在都者毫无沾润，清苦万分矣。言未已，又深惜恩鸞翁之未得锦城一席，惋叹而去。弟参核所闻各节，谓季重竟卖参摺，似尚未然；且季重之摺实蜀绅所公拟，而使季重上之者。盖蜀人素重乡谊，其在京者一气相通，每有议论，则靡然从风（其风气然也）。必谓二万金尽季重所得，则冤矣。蜀帅复奏能如尊悻所拟，最为妥洽，舍此别无良法。尊论措注盐务，亦极精当，倾佩倾佩！仲虎<sup>④</sup>出洋，其局务接手者系赵晴岚观察（名新<sup>⑤</sup>）。兹复令兄旭翁<sup>⑥</sup>一函，祈附入竹报转寄为荷。手此，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八月廿五日（1879年10月10日）。

## 七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昨奉初十日手书，敬聆一是。俄约<sup>⑦</sup>准驳各条，闻有二万余字，傅相<sup>⑧</sup>尚未见到，稍迟似当寄来。前代

① 彭若亭，彭祖贤字芍亭，江苏长洲人。湖北巡抚。

②③ 均指丁宝楨（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四川总督。

④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科学家徐寿之子。1878年任驻德使馆参赞，赴英、法各国考察。

⑤ 赵新字晴岚，以擒宦官安德海闻名。

⑥ 沈玉麒字旭初，沈能虎之兄。电报局总办。

⑦ 指《里瓦儿亚条约》和《铁路通商章程》。

⑧ 指李鸿章。

幼樵<sup>①</sup>侍讲酌拟《北洋水师章程》，本系潦草塞责，幼樵将正稿携去。闻香涛<sup>②</sup>等均以谓然，仍俟幼樵参酌订定后，函请傅相奏行，傅相前已面允之。兹将草稿附上，阅毕后仍望寄还，缘弟止有此一稿也。综司操练，贵在得人，乃是第一要义。幼樵已将任事者之不厌人望，剀切言之，傅相颇为首肯，此幼樵鲠直之益也。惟其平日论他事立意过高，责人太苛，未免强傅相以所难行，恐非其当听者而不见听（其失与黄寿翁<sup>③</sup>同），为之奈何！黄寿翁规沈相<sup>④</sup>一书，执事必已见之，可将原稿密示否？查小峰不愿赴吉林，然既已奏定，恐亦难遽更改。河阳到津后，已送去木质关防一颗，由支应局月呈办公费六百两，可谓优矣。家兄经吏部咨送军机后，詎料军机章京援该处别例办理，屏不开单；惟从前密保单内小签“丁忧”字样业经揭去，虽于简放尚非绝望，然岁月迟早则不可定。家兄意欲南旋，弟拟劝令暂留，恐万一有意外之幸，而既已离京，或致歧误也。尊意以为然否？前发一函投福升店，曾否收到？俟作书询之。子莲谒见傅相，情意优厚，俾即赴都引见，已给咨起程矣。兹寄上藩、臬署两函，缘弟知府到省一年期满，应稟请循例甄别，希即饬送为荷。翰兄<sup>⑤</sup>云执事与藩幕相熟，如面托之，必可速办，并房费亦可酌省。诸费清神，感歉奚似。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廿一日（1890年）。

## 八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别已经旬，殊深企念。到津后，诸务丛

- 
- ①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1875年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入李鸿章幕。
- ②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1879年曾反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儿亚条约》。
- ③ 黄彭年（1823—1890）字子寿，贵州贵筑人。官至湖北布政使。
- ④ 沈桂芬。
- ⑤ 景文照字翰青。

集，匆匆未及布函。顷于执事致翰兄信中，藉悉一是。承代托鄂卿<sup>①</sup>所购之书，比已接到。《红楼梦图詠》、《列仙酒牌》各一部，该价洋帙五元，遵教暂存敝处，俟将来此间有搭公分之事，即为代办可也。望洲亦收《红楼梦图詠》一部，已由渠自行措价，即觅便寄还尊处。沪道来信：日本近来添募民兵行三丁抽二之法，又筹巨款运往法国购备军装，横滨船厂赶造炮船比往时加紧等语。又遣使来华之说，仍杳无音信，是倭人闻俄事不谐，必已生心；观其举动，恐将伺隙思逞，不出人意料之中。购办铁甲船，价二百万两，以南洋二碰船及闽省续购二蚊船、二碰船价抵之，所短不过四十五万两，总署意欲北洋任之，傅相以北洋存款不可扫数无余，且谕旨飭闽省所筹之六十万，恐不可靠，将至失信外人，欲遂中止；而郑、盛<sup>②</sup>两观察明日将递节略，大约一二日内当定局也。近日都中议论与省垣所闻见各事，望示及一二为荷。敬颂勋祺，并颂潭祉，不具。弟福成顿首。初十日（1880年3月20日）。

## 九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接二月廿七日手书，敬聆一是。倭人竹添进一来谒伯相两次，所求过奢，谈不合龙〔拢〕，飘然而去。盖倭人知俄约不行，蓄意观衅，本无志于了事也。俄约可行不可行各条，闻已由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核定，不久即当行出。左相<sup>③</sup>有三路进兵之信，未知确否？稚帅<sup>④</sup>去冬读左相摺稿，恐中俄遽将开衅，以谓非万全之策；又虑中国无人愿往，且未见另派曾劼侯<sup>⑤</sup>之旨，因自拜疏请行，此正其愚不可及处。现闻又为恒

① 时乃凤，字鄂卿，浙江仁和人。

② 郑藻如、盛宣怀。郑字玉轩，福建闽县人。

③ 左宗棠。

④ 丁宝楨。

⑤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曾国藩死后袭侯爵。1880年崇厚被革职定罪，他被委兼充驻俄大臣，与沙俄谈判改约。

将军<sup>①</sup>所劾（似即系复奏邬纯嘏参摺），有旨明白回奏，省垣有所闻否？勉林<sup>②</sup>处弟亦未接其来计，已作罢论。家抚兄<sup>③</sup>于二月杪抵京（住西河沿福升店），因舍弟试期匆促，未及绕道津门，现已于初一日验到吏部，于初四日各文咨照军机处矣。后事则尚未知也。张幼樵侍讲已来入幕，居东花厅，未经拜晤诸同事，但送一片而已；诸同事亦以一片报之。弟谓将来见面颇难为情，且彼或守“居丧不拜客”之礼，未必竟自尊大，乃姑偕桐兄<sup>④</sup>往拜之。一见，则恂恂儒者，如不胜衣，款谈甚洽，且意气谦逊，惟似无久居之志，谓相聚以一月为期。弟劝以在外阅历，将来乃能卓有建树；且此间为洋务总汇，为考究时务者所必居。渠意颇以为然，傅相亦雅意萦维，现已言定于月杪回京，俟小祥<sup>⑤</sup>后再来矣（今日往大沽看炮台）。恕轩来信，意欲求傅相奏调来直，弟谓奏调格于部例，于恕兄官事未必有益，似不如晋省得缺较易。兹有复恕兄一函，因不知其住址，拟恳设法转寄为荷。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三月望日（1880年4月23日）。

## 十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南北睽违，不通音问将近三月矣。比维勋祉增绥，潭祺休畅，至为企颂。弟自六月初旬抵锡后，料简家事颇极繁琐。令兄旭初观察亦代为设法，藉以藏事。正拟七月十七日启程北上，适有天津携回仆人张定染时症甚剧，既未便留之在锡，又不能带以上道。至廿六日张定病故，医药、棺殓耗费颇多。廿八日始挈眷就道。詎料登舟后，弟疟疾大作，二小儿染秋

① 恒训字诒亨，宗室，满洲厢白旗人，成都将军。

② 李兴锐（180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并增设船、炮厂。

③ 薛福辰。

④ 赵铭（1828—1889）字桐孙，浙江秀水人。官至直隶卡密知府。

⑤ 小祥，丧礼周年之祭。

温之症，更觉沉重。弟过苏垣力疾访旭翁一次，并托令侄开一药方。及抵上海，未敢遽上轮船，住客棧十有一日。弟请时鄂翁<sup>①</sup>医治，初九日始就霍然；小儿另延医调治，亦渐痊愈。乃于十二日上“保大”轮船。诘开轮甫及半日，家岳母年七十九，向与内人相依为命，不得不携与偕行，忽在船上无疾而终。直至十七日黎明，由紫竹林驳往大王庙，始获买棺成殓。事务之琐，耗费之繁巨，更不待言。要之数月以来，晦盲否塞，思之令人烦闷。旭翁属带板箱一只，先已寄上。兹复检上竹报一函，小瓶一个，希即察收。家兄近无来信，未知医事有无掣肘？如有所闻，望示及梗概为荷。肃泐，敬颂台祺，不具。

弟福成顿首。廿一日（1880年9月25日）。

## 十 一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奉七月抄手示，敬聆一一。伊犁偿费尚属近情，而界务、商务吃亏太甚。盖崇公<sup>②</sup>专以索回伊犁为了事，不顾其他，虽悔何及？汉中早允定陆路通商为俄运茶码头，夔府之说，则传闻不实也。赫德之议，沈幼帅<sup>③</sup>来信大不谓然，似有中止之势。球案<sup>④</sup>尚无眉目。徐仲虎<sup>⑤</sup>为使德二等参赞，今日由津回沪，定于月杪出洋。月前，弟接蜀信，谓黔岸积盐不少，系由查办之阻挠。刻下蔡公既去，若此后无甚掣肘，畅销仍确有把握云云。惟蜀绅来者虽不言此事之不当办，而意中总冀早复旧章，此不可解也。闻四川京官仍力谋排击。执事致翰公<sup>⑥</sup>书亦谓

① 时乃凤，字鄂卿。

② 崇厚。

③ 沈葆楨（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官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大力扩充南洋水师。

④ 指1880年3月日本向清廷提出解决琉球问题事。

⑤ 徐建寅字仲虎。

⑥ 景文照字翰青。

蜀事串弄日棘，果确有所闻否？弟谓吴镇贿卖参摺一节，既由宋大奎京控案中自行揭破（闻王余照又汇银数万人郡，决计欲图报复，有一苏人言之），朝廷已洞见隐微，若仅由蜀绅疏劾，必置之不理。其他省京官及一二卓卓自负者既闻有此说，必不肯蹈瓜田李下之嫌。至延陵卖参实据，外间皆云已为令威所得，若再不自戢，尤属可危。倘其见机韬晦，似令威亦未必尽情举发也。尊处所闻之说，可示及一二否？亮兄引见一节，已定行期否？肃泐，即颂台祺，不具。

弟福成顿首。十三日（1880年6月28日）。

## 十二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奉初七日手教，敬聆一是。俄事闻有合龙之机，西汉、松花江均允缓商（伊犁南境可还）。偿款于崇公所许之外，再加四百万罗布（仍作为代守兵费）；即续有增添，亦不过再加百万，合成十兆之数而已。劾侯办理此事，已算十分做脸；若郡中主持之人再恃虚骄之气，不知顺风转帆，则是明明意在横挑强敌无端开衅，吾不知其所底止也。左侯相于明正可以抵京。顷已见其来咨，谓俄船二十二号不如闽厂所造二十五号之多，又谓俄人之强不如粤、捻、回等逆十倍。又闻其致译署函，谓已捐廉六百万，商之织呢洋匠，购鱼雷三十具，若置之大沽海口，可使敌船片帆不返；又拘守旧闻，谓俄之兵船不能出地中海等语。弟疑此老或另有作用，否则于事理太觉隔膜，更远出香涛等之下。若彼到时俄事尚未议结，其不酿成巨衅者几希。吁！可危也。梅公<sup>①</sup>之疏，须稍缓再复。铁路事，昨已拟摺稿，尚未核缮。大旨归于不遽兴办，先将集股、借债、选料、募匠各事宜交刘公<sup>②</sup>逐细考究擘画，俟一二年后再行定议。若有军旅之事，则

① 梅启照字小岩，江西南昌人。

② 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番禺人。任光禄大夫，反对兴建铁路等一切兴革措施。



暂从缓议。昨刘公已奏请续假回就医，未知批旨如何耳。裁汰绿营，以其费用办铁路，尽可敷用。伯相以中外拘牵成例，恐办不动。昨张家骥又有谏阻铁路之摺，恐此举终成画饼耳。书价银二两六钱已交翰兄，兹附函二件，希飭送为荷。蒋君汝修现办米仓差事，即送仓内可也。手此，即颂台祺，不具。

弟福成顿首。廿五日（1880年2月26日）。

### 十 三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本月初旬接到手书，聆悉一是。俄约<sup>①</sup>已于冬月杪在俄定议。本月初八日奉旨发电报，准其定约画押。其节略大致统还帖克斯一带，帖西照明约，喀界不提前约，就现管界勘定，塔界在崇线明界之中酌定，西汉删去不提，径废松花江专条；偿款于崇约五兆罗布外加四兆罗布；天山南北暂不纳税，商旺再议；原议添设领事七员，今仅减存嘉峪关、吐鲁番二处。劫侯此行独为其难，挽回大局实非浅鲜，初不料其竟能如此议结者。大抵劫侯口才本属敏捷，或适遇俄人将有事于欧洲（闻土耳其割地未定，又将有战事），不欲启衅中国也。此事已了，如一劫既赢，全局皆振，即可腾出精神专办琉球一案。日使宍户玘<sup>②</sup>屡在译署催问前事，旋有照会责其欺弄，并将克期回国，颇存挟制恫喝之意。弟谓该使不识时务，尽可置之不理。傅相昨函复译署<sup>③</sup>，劝以坚持勿允；谓如有变端，请独执其咎，似可稍壮译署之胆矣。来示详述圣恙<sup>④</sup>原委，弟即经函询家兄，旋接来信，谓系告者之过。惟症本难治，立方又多掣肘，拟于岁杪决计请假；能否脱离尚未可定，殊悬悬也。复梅格学<sup>⑤</sup>一摺，已将减绿营事叙入，恐

① 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吉尔斯在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签订《中俄改订条约》。

② 宍户玘，1879—1881间日本驻华大使。

③ 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④ 1880年慈禧太后病时，薛福辰被李鸿章推荐为慈禧看病。

⑤ 梅启照。

朝议终未必能准。兹先将铁路摺片稿附上，俟两三日后，再将议复梅摺寄上（现尚在文案处），请俟阅毕后，一并掷还可也。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十七日（1881年1月16日）。致方伯贺年信一封，请飭送为荷。又及。

#### 十 四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腊杪奉到手书，敬聆一是。漫谓旌从新正必可抽暇到津一行，畅叙数日，不谓足音竟然也。铁路等疏稿，过承奖许，令人增慙。铁路事，南洋复奏珊珊来迟，不知究竟如何定义。

吴江<sup>①</sup>捐馆，出人意外。方其在时，被人攻击，亦不觉其长处；今则继其后者，勤能谙练，似又远不如吴江也。左侯相于灯节后，闻可过保定。观其累次咨牍章奏，似共有联络之意；果能从此两家辑睦，同奖王室，亦大局之幸也，海内之福也。家兄于岁杪蒙两宫颁赏白金四百两及大料袍套、云龙、福字。圣眷非不优渥，乃当道诸公随事排挤，若有夙憾者，不知究系何故。现值圣躬暂停请脉之时，已于初三日先请一短假；假满后，仍即续假，决计引退，业经搬至锡金馆居住矣。俄事自电报定议后，尚未见到全文。倭事诚如尊论，目下尽可不闻问也。入春以来，连日酬应忙录；此后，当稍可清闲矣。手肃，敬贺春祺，并颂潭祉，不具。弟福成顿首。十四日（1881年2月12日）。

#### 十 五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连接廿八、初三日两次惠函，敬聆一是。家兄续假二十日后，傅相接到京信，知有议其规避者，因嘱弟写

<sup>①</sup> 吴江，指沈桂芬（1818—1883）。

信劝其销假。大致谓：引退未可必得，而先坐实规避与见危不救之咎，恐万当不起；事既至此，只可听其自然；且马文植<sup>①</sup>系是布衣，势难加以重咎；则他人事同一律，似可无大处分云云。家兄已遵傅相之意，于初三日销假矣。但圣恙自廿九日以后，每日泄十数次，食物均不消化，殊可虑也。寿翁<sup>②</sup>匡时三策均属要务，尚未见枢寄交议，未知伯潜<sup>③</sup>已上陈否？太冲<sup>④</sup>初入政府，即荐南丰<sup>⑤</sup>自代，甚为公道。若从此平心和气顾大局，乃海内之福也。商局之件，杏兄<sup>⑥</sup>被诬实甚，客冬拟复岷帅<sup>⑦</sup>函稿，已将商局原委详晰告之；无如岷帅近来事事欲与北洋立异，顷闻咨来复奏摺稿，已将杏兄弹劾，大抵偏信叶顾之之言也。傅相于数日内想当复奏，且必为杏极力湔洗；但既受参劾，虽欲雪之，总觉事倍功半，为之惋叹而已。岷帅复奏球案一摺，将北洋及陈、张、<sup>⑧</sup>等疏无不痛驳；而按其文义，处处自相矛盾，且归宿处并无办法，文理亦为诸疏之殿，读之令人喷饭，缘其茫无所知，而又欲以洋务自命也，匆泐，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初六日（1881年）。

## 十 六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连接十二、十八日两次惠函，敬悉一是。傅相回轅后料检积牍，至今始稍清楚。尊论球案办法，深合机宜；

- 
- ① 马文植，字培之，江苏孟河人。1880年慈禧太后病时，江苏巡抚吴元炳推荐马文植为慈禧治病。
- ② 黄彭年字子寿。
- ③ 陈宝琛（1852—？）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人。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有名，与张之洞等有“清流党”之称。
- ④ 太冲隐指左宗棠。
- ⑤ 南丰隐指曾国荃（1824—1890）。
- ⑥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督办。1880年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
- ⑦ 刘坤一（1830—1902）字岷庄，湖南新宁人。时为两江总督。
- ⑧ 指陈宝琛、张之洞。

越石之件，经大手笔勾涂，居然警切，意义亦较一律，执事真有点铁成金手段矣。其中仍微有一二矛盾之处，粗看已不觉得，盖由其下笔时茫无一定主见，非洗刷所能净尽也。洋药①闻与威使议定：每箱加税十五两，其内地加厘，仍由各省自为酌定，不与②洋人相干；如此较为活动，将来俟加税开办后，不妨将约厘逐渐增加。至每岁十八省所收洋药厘金，惟户部有总数可稽（闻在三万内外），敝处亦难考确数。执事知好中如有为户部司员者，似可寄信托令查出细账（各省厘金总数亦可一查），以饷同人。圣恙颇见转机，潭水搅局，实出情理之外，虽经傅相面加严饬，闻仍倔强如故。家兄惟有俯就群闇随同画诺而已。花村③事经农译议出，着笔极其轻淡，亦甚圆融。卯金④官司已输，未知能甘心退让否？月来时论太变，詠史⑤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早在意中；主人⑥闇然口章，声望已渐出其上，半年之后尚有可观。倭人颇以穴户为孟浪，然亦尚无另派使臣之说。蕤斋⑦似于五月内可到，板桥⑧经荔老⑨荐作替人，傅相曾向政府为之说项，以其经手事件颇多，欲使留任，政府似尚未定议；万一竟持节远行，此殆许、刘⑩诸公之财运也。邵小村⑪现已到京。俄约全文弟托人抄录未竣，翰、桐⑫诸君尚须借弟本抄之，执事似可再借翰本抄之也。迩来通省均获甘霖，曷胜欣抃。刻下农田尚望雨否？如夫人病去

① 即鸦片。

② 威妥玛。

③ 花村隐指盛宣怀。

④ 卯金隐指刘坤一。

⑤ 詠史隐指左宗棠。

⑥ 主人，指李鸿章。

⑦ 黎庶昌（1837—1897）字蕤斋，贵州遵义人。1881年以道员任出使日本大臣。

⑧ 板桥隐指郑藻如。1881年以候补三品京堂任出使美、西、秘大臣。

⑨ 陈兰彬字荔秋，广东吴川人。使美大臣，1881年任满回国。

⑩ 许景澄、刘锡鸿。许景澄（1845—1900）字竹笈，浙江嘉兴人。

⑪ 邵友濂（？—1901）字小村，浙江余姚人。曾署理驻俄大臣。

⑫ 翰、桐，指景文照、赵铭。

十之七八，至为可喜。若佛前能如此施治，则大妙矣。尊函已速即寄去。专复，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廿三日（1881年）。附摺稿一件。

## 十七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奉十二日手书，聆悉一是。洋药厘金，近闻闽督<sup>①</sup>来信，闽中于三十两正税外，已每箱收厘至九十两，粤中亦收八十两。此皆去年筹办海防所加，似尚未奏咨，故户部并不能周知。各省欲留备不虞之用，似亦不肯全数报部，但折收偷漏在所不免耳。然闽中税厘并计已得百二十两，将来再加厘三十两，似尚可以办到；即伸缩加减之权，亦仍在我。然则威使所议免征内地厘金，另加税五十两者，中国所得不偿所失，而又以自主之权授之洋人，弟前所以谓不合算也。为今之计，惟有就各省原收厘数层累加增，多设巡船，严惩偷漏，自系正办。闻津关初议欲加至百两为度（税厘并计）。昨左相来议，必以百五十两为率，不能再少，且欲傅相为各省倡；傅相已告知玉翁<sup>②</sup>矣。尊议公司一节，诚能办到，则大气包举，可省去许多葛藤。弟所虑者，洋债二千万，都人士闻之，必皆疑骇，群议蜂起，阻之使不得成。既立公司之后，洋人既以每岁应销之烟售与公司，必再私自斥卖，私烟之价既大减于官烟，则买者必舍官而就私；烟既囤积，本利必至折阅。又公司局面既大，用人必杂，如卖放、夹带、侵蚀等弊，亦恐难免。此不可不审慎者也。执事托人在户部抄录货厘、药厘总数及近年丁漕、关税之实数，俟到时望借一抄，决不耽误。左相驻津两日，与傅相畅谈，似尚开诚相与。其论水利，欲先自永定河下手；且谓洋药加厘，傅相如能照伊办法，则治河筹费彼亦任之，盖欲以药厘办水利也。如夫人宿恙全愈，殊代为喜慰，

① 何璟（？—1888）字小宋，广东香山人。时为闽浙总督。

② 周馥（？—1920）字玉山，安徽建德人。1881年任津海关道。

已将尊意转达家兄矣。外间皆言报安在途，而家兄终不能无忧；且以事多掣肘，侘傺无聊，殊属可念。《图书集成》需价六千金，傅相未必愿买；前岁有索五千金者，相意不甚许也。方伯<sup>①</sup>升任东抚是意中事。傅相谓：彦昇之任直藩，远出周福帅<sup>②</sup>之上（似四月与政府谈及，亦告以如此），孙省翁则更无论，深以替人不能如意为虑。弟有贺禀一函，希飭送为荷。专泐，敬颂台祺，不具。弟福成顿首。廿八日（1881年5月25日）。

## 十 八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四月下旬泐复寸函，谅早达到。洋药加税事，现无消息；想威使请示本国，辗转往返又须延宕数月矣。查各省抽洋药厘金：福建每箱三十六两，江苏每箱三十两，北洋二十四两，加以各项额费，每箱亦三十余两，广东与福建约略相等。客冬申报粤省因办海防，有每箱加至六十两之说，未知确否？总之，中国于加税事，须得寸得尺徐与磋磨；至洋药厘金，系内地自主之权，不妨俟加税开办后，尽力加厘，且分数次层累加之亦可；若并厘于税，虽骤加数倍，而内地不得再征，究虑妨我自主之权，似不甚合算也。执事托人在户部钞各省药厘总数，如已寄到，务望借弟一抄，原稿当克期奉交，决不迟误。此间榷席在居停主人，尚无搬动确信；而外间已拟议多人，甚有祝颂鄙人者，无其实而有其声，尤觉令人惴惴！譬之秀才初应乡试，而旁观遽以翰苑相许，有是理乎？以鄙见度之，延陵似可望调补宣平，越石或有一人治津席者；否则何子峩、邵筱村<sup>③</sup>诸公（张幼樵前有保荐子峩之说），或当以无意而得之；更恐有揣测所不到者。至

① 任道镛字筱沅，江苏宜兴人。时由直隶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

② 周恒祺字子维，号福皆，湖北黄陂人。时由山东巡抚改漕运总督。

③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峩，广东大埔人。曾为驻日公使。邵友濂字筱村，曾为使俄大臣。

七月间美使瓜代，板桥之是否在选，亦尚未定，缘荔叟荐郑、黎<sup>①</sup>二公自代（谓召民星使），而板桥得主人之说项，或者竟免是役，亦未可定。又黎莼斋约于六月可到，届时或将莼斋调为美使，以资熟手，俟腊月间英使任满，再授板桥，亦事之未可知者，缘英使大席非曾任实缺关道者，不足以充选也。偶因无事，辄缕述之，仍勿告外人为要。圣恙闻有起色，但冀敷衍报安，俾家兄脱离苦海，斯大幸耳。傅相六月间须往旅顺口，闻黄寿翁有同行之意。彼处形势险固，关系重要，诚不可不往一游也。前托代觅方子勤<sup>②</sup>遗文，未知书局有刻本否？《朔方备乘》全书，未知已告成否？如夫人宿恙既愈，现复静养，半月谅可复元。专泐，敬颂台祺，不具。初九日（1881年6月5日）。

## 十 九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昨奉七月廿五日手示，敬聆一一。槓差事闻远不如前届，然其辛劳则一，执事想已预为筹措。究于何时入都？望示及之。贱名闻在随员之列，知府班领款究有若干？亦请代查为荷。如能预先领出，拟恳台端代具领纸，即于中秋节以前带到津门；若中秋以前未得妥便，即请执事携至都门转交，缘弟入都后恐有要用，不能待至差次具领也。费神之处，容当面谢。致赵君坚一信，望阅后代封飭送为感。周玉山<sup>③</sup>观察奠仪廿金，可否即交与赵哲如县佐转寄？亦请代询君坚是荷。弟前接家信，痛悉季怀<sup>④</sup>舍弟因拟引觐，春杪自蜀回锡，偶染症疾，骤致变端，竟于七月廿四日溘逝，为之顿足惊恸！窃念舍弟频年奔走，无一日安，所学亦百不一施，遽尔摧折，殊非梦想所及。叨在知好，

① 郑藻如、黎庶昌。

② 方愴（1849—1878）字子勤，一字退斋，大兴人。李鸿章招修《畿辅通志》，卒于保定，年仅三十。著作多散失，仅存《退斋文集》。

③ 周馥字玉山。

④ 薛福保（1840—1881）字季怀，江苏无锡人。同治间佐丁宝楨幕，官至四川知府。能文，邃于经史诸子，有《青萍轩文钞》二卷、《青萍轩诗钞》一卷。

谅必同为惋惜也。药厘事久无消息。近日总署议定洋货进口值百抽十，概免内地税厘；通筹国计，似尚无甚亏损。然自此津关最优之缺，当变为第一苦缺，故自周玉翁以下皆甚不愿，但非一处所能挽回耳。弟神情惘惘，不能复道其详，谅翰兄信中必及之也。肃泐，敬请勋祺，诸惟心鉴，不具。愚弟期薛福成顿首。十二日（1881年8月12日）。

## 二十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十四日肃布一函，想早尘览。旋接十三日手示，猥以孔怀之感，备承宽慰，勿感易任。弟家运多蹇，罹此痛毒，复何所言。舍弟眷属幸尚在里。舍侄一人年已十六，再读书数年，或可冀其成立。其后事，则适值五舍弟<sup>①</sup>尚未赴鄂，均已部署楚楚，差堪告慰。家兄前日又有一信，内有要方，弟即刻交包封递上。如夫人宿恙是否全愈？至以为念。雷、琼<sup>②</sup>一缺，僻而不瘳，人之所以惮往者，以其隔海且多瘴耳。自不如高、惠、南<sup>③</sup>者得一为妙。佛恙现似照常，摆脱尚无准期。白下一席<sup>④</sup>南窃比<sup>⑤</sup>既不肯接任，则越石<sup>⑥</sup>一时尚不交卸，然势在必动，则南非似可量移。近闻南皮<sup>⑦</sup>又有催令速到甘任<sup>⑧</sup>之奏，而以任、黎<sup>⑨</sup>诸公作陪客，则彼之注意明明为两江作梗也。板桥业已南行，译

① 薛福祁。

② 广东省雷州、琼州。

③ 广东省高州、惠州、南海。

④ 白下一席，指两江总督。唐武德时改金陵为白下，即今南京。

⑤ 窃比指彭玉麟（1816—1890）。彭字雪琴，湖南衡阳人。1881年命署两江总督再疏力辞，留督江、海防如故。

⑥ 越石，指刘坤一，时为两江总督。

⑦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

⑧ 指陕甘总督之任。

⑨ 任道镛、黎培敬。黎字开周，号简堂，湖南湘潭人。光绪七年五月十五日，任由直隶布政使授山东巡抚，黎由漕运总督授江苏巡抚。



署似欲将其遗席位置康节<sup>①</sup>。台端料事不啻十得八九，佩服之至。总之，将来补此席者，非爱莲<sup>②</sup>则康节矣。执事承办槓差，起程在即，前函奉托之事，究竟如何？赵君坚处有回音否？手此，敬祝勋祺，不具。弟期福成顿首。闰月廿四日（1881年9月17日）。敝同乡蒋牧汝修困顿益甚，如蒙推爱，酌加拂拭，铭感尤难言尽。又及。

## 二十一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别后一路顺平，于廿二日四鼓回津。马眉叔<sup>③</sup>有生男之喜，登岸即得佳音，异常欢抃。味兄<sup>④</sup>于四五日内即须起程南旋，其事由莲兄<sup>⑤</sup>接办，已经相座酌定。新制碰快船二号，已于廿七日抵大沽口，停泊拦港沙外。傅相定于初二日驰往验收，弟与翰兄亦拟同往一观。闻此船洵系利器，惟炮门离海面只三四尺，海水每易冲入，稍有风浪便不能开炮，此其弊也。英厂自定此式后，仅造过三号，而中国得其二，现已翻改前样矣。昨蒙相谕云：宣化王补庵<sup>⑥</sup>太守卓异引见，已于途间告知薇垣，一面檄令请咨，一面挂牌委署，将使弟往权篆<sup>⑦</sup>。惟此等短局不过两月气候，嘱弟单车前往，勿携眷属云云。弟思宣化离京甚近，王君似尚可赶回过年。弟此去看印数十日，一往一返，能免赔盘费已属倖事，然总是傅相之栽植，只可譬作出差一次耳。惟弟初次登场，诸务均不谙习，究竟赴任之始，何者为亟应办之

① 康节隐指邵友濂，时在总署任职。

② 爱莲隐指周馥。1881年，继郑藻如任津海关道。

③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曾留学法国，并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为李鸿章办洋务及外交事务。撰《适可斋纪言纪行》、《马氏文通》。

④ 朱憬然字味莲，浙江余姚人，李鸿章幕僚。

⑤ 沈保靖字品莲，李鸿章幕僚。

⑥ 王袞字补庵。

⑦ 时薛福成以候补知府署理直隶宣化府。

事，尚希详示为荷。藩署究于何日挂牌，亦望代为一问。弟是否须赴省一行，尚须请示傅相。又弟若赴省，尚拟向执事挪借二百金，以作盘费，大约年底必可筹还，不致有误。是否可行，亦请裁示。玉山观察捐银十万两，为傅相改造督署，可称豪举。弟所寓之大胡同房屋，亦经官买，以拓督署基址。弟尚须觅屋迁徙，不免劳费矣。专泐，敬颂勋祺，诸惟心鉴，不具。

愚弟期薛福成顿首。廿九日（1881年11月20日）。

## 二十二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昨在保垣，诸承关注，叨扰郇厨，有宾至如归之乐。匆匆握别，渴想弥殷。只以莅任伊始，百务蝟集，音敬稍迟。比维潭祉绥愉，勋猷日懋，至为企颂。弟于十月廿五日抵京，停留两日，至冬月初二日行抵宣郡，初八日接篆视事。所有谒庙、拜客、阅城、过堂及一切酬应纷至沓来，几无暇晷，似须一月后方能整理就绪。此间府缺，向恃节寿，除宣化，蔚州两属处，每处或送八十，或送六十至四十不等。所幸酬应无多，用度可以撙节；即照弟从前在幕时排场，人亦不以为怪，或当免于裼蹶。若打官话，道府节寿陋规本不宜受；然使并此而去之，则署中蒋致断炊，故弟亦不为此矫情骇俗之举也。弟在郡时，见傅相致家兄手书，定于廿八日启节，而崧藩宪<sup>①</sup>于廿七日由京起程，约计冬月初五日必可接印，是以将台端所嘱之事与家兄言之，而未及遵办也。刻下藩宪究于何日接篆，叶廉访<sup>②</sup>究于何时入郡，望示及梗概为荷。如夫人药方之事，家兄自谓实系江郎才尽，弟嘱其于无可设法之中勉思妙法，未知近有好方寄上否？抑如夫人喜占勿药否？念念。傅相明春寿礼，弟与家兄皆准附分。摯甫<sup>③</sup>

① 崧骏，字镇青，满洲厢蓝旗人，时任布政使。

② 叶伯英字冠卿，安徽怀宁人。

③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师事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文宗法桐城派，有《桐城吴先生全书》。

所作寿序已寄到否？尊款约于腊底春初可以清。还寿分每人须派若干，想可约略预计。洋药加厘及洋货免厘事，如何定局，希示及之。致翰幼兄各一函，望转致为荷。匆泐，敬请筹祺，并颂潭祉。弟期福成顿首。冬月十一日（1881年12月31日）。

### 二十三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奉手示，敬承一是。傅相十九日由吴淞口开船北上，大约明后日可抵大沽。奏明素服办事，俟安葬有期，尚须请假，如此较为心安理得。朝鲜乱首李崑应<sup>①</sup>经筱轩<sup>②</sup>军门诱至军中议事，羁留在营，即以“登瀛洲”一船驶送来华。昨晚二鼓抵津门，即当护送入都，听候朝命。渠魁既得，日本亦为夺气，诸事当迎刃而解。惟日本又遣使来华，其意未肯下休，彼必将琉球、朝鲜并作一案，以相搅扰，则善后各节尚费经营耳。香涛中丞<sup>③</sup>夏初所做长篇，来示谓将询之恕轩，已得回信否？葆王荷戈塞北，都中清议皆谓情真罪当；近且波及南丰，照例系降二级调用牌子，未谗能加恩否？王益吾<sup>④</sup>所撰之嘉庆一朝《东华续录》，琉璃厂是否可购？执事去秋在都所买，该价是否系每部二两四钱？便中希示及为荷。省垣近事如何？手泐，敬颂台安，不具。弟期福成顿首（1882年9月2日）。

### 二十四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别已旬日，渴想弥殷。比维勋猷日懋，

- ① 李崑应（1820—1898）朝鲜国王李熙之父，封兴宣大院君。壬午（1882）之变，清廷派兵执崑应以归，囚之保定，阅三年释还。东学党之乱，闵妃以“清慈侧”为名，率兵入宫杀之。
- ②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1882年8月奉命率部赴朝鲜汉城，镇压兵变。
- ③ 张之洞字香涛，时为山西巡抚。
- ④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累迁翰林院侍讲。历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院长等职，从事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编有《十朝东华录》，著作甚多。

潭祉增绥为颂。李昞应已择日解送省垣安置，执事会同督察，必臻妥协。兹有愚者，敝同乡秦膺唐大令（焕尧），弟之同年也。台端前在望洲处想曾晤及。渠到省二年，未得一长差，景况甚累。前日与瘦兄荐之玉山观察，为办幕事，未及有成，复谋请玉翁以看守李昞应一差位置，既承允许。顷见札稿，始知归省中司道主政。然既云酌派二人，执事似必可位置一人。秦君实精细勤干，弟可保其必无贻误，务恳阁下与薇垣妥商委派，因此事关系紧要，恐不能稍缓须臾。弟志在必成，亦知其必成，故一面写信附文寄上，一面嘱秦君即日就道赴省听候指挥。阁下向于朋友事无不尽力，想必蒙金诺也。感激之私，岂仅身受者已耶？振帅<sup>①</sup>定于廿一日启程晋省。邓承修<sup>②</sup>请伐日本之摺，已由弟代拟双衔复奏稿，措词尚觉圆融。《朔方备乘》月内能刷印否？匆泐，敬请勋安，祇贺节禧，不具。弟期福成顿首。中秋节（1882年9月26日）。

## 二十五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两奉手书，敬承一是。秦君之事，承逾格栽培，妥为位置，并向薇垣展缓限期，俾免另派，和衷感激，奚啻身受。秦君性太迟缓，诸事望随时策励之。昨傅相手起一札稿，禁候补各员及杂色人等人内探望、与李昞应私谈，诚属急务。即如李昞应在津旬月，杂色人员多与笔谈，其才足与簧鼓群愚，百般谣说由此而起，诚（下缺）

## 二十六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布寸函，想登签室。承属留意越南近状，兹摘录越南王来咨一件，奉寄一阅。闻法国宝使<sup>③</sup>向总署理

① 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时由两广总督调署直隶总督。

② 邓承修（？—1891）字铁香，广东归善人。鸿胪寺卿，总署官员。

③ 宝海（Bou ree, F.A.）1880—1883年间法国驻华公使。

论，总署有奏请特派全权大臣与宝使商办之说，未知能否定议？竹报中如有述及越南近事，亦望垂示一二为荷。《朔方备乘》不能速印，令人闷闷。张幼樵条陈朝鲜六事，欲派大臣往监其国，而以何子戡任之；又欲屯重兵于永兴湾，而以吴谊卿统之。二君者，一其世侄，一其门生，又皆翰林也。其附片则劾马眉叔，颇牵涉归天主教各节。此事因吴筱轩与眉叔积不相能，向人谈眉叔之短语，浸达于京师。傅相昨经复奏（系亲笔稿），将监国事痛驳；其眉叔事，则须俟筱轩回文再复也。省垣近事若何？中外各事有新闻否？敬颂台祺，不具。弟期福成顿首。初六日（1882年11月16日）。家兄来信，以执事送舍侄喜分，属先为道，冗忙不及写信也。又及。

## 二十七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前奉手书，敬聆一一。如夫人抱病多年，遽尔溘逝；修短有命，人力实无可施，尚望顺时达观，善自排遣为要。执事脱离幕府，何修何幸而得此机会，弟视之如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即，健羨奚似。此间公务甚简，较伯相时不过十之一二，亦藉此偷闲藏拙。近见邸钞，文硕<sup>①</sup>护崇礼<sup>②</sup>劾陈、邓<sup>③</sup>；而陈、邓复曠所亲劾之。明季朋党之风大著，有世道之忧者，能无顿足三叹！闻张香涛中丞保举天下贤才五十九人，（文如张幼樵、吴清卿、朱肯夫、游子岱<sup>④</sup>，武如张朗斋<sup>⑤</sup>、吴筱轩皆在内）黄

① 文硕，字叔南，满洲厢红旗人。

② 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

③ 陈宝琛、邓承修。

④ 吴大澂，（1825—1902）字清卿，号恒轩、恣斋，江苏吴县人。官至湖南巡抚。朱迥然字肯夫，浙江余姚人。同治进士，官詹事。游智开字子岱，湖南新化人。1889年以广东布政使署理巡抚。

⑤ 张曜（1832—1891）字朗斋，顺天大兴人。1876年，以提督名义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官至山东巡抚。

寿丈<sup>①</sup> 桥梓皆在前列，朱亮兄<sup>②</sup> 亦在内。执事曾见全单否？颇有知好在枢廷者，可托一抄否？弟所识者如子密<sup>③</sup>，以事忙而不肯录，荆南以谨慎而不肯录（家兄处亦未觅到）。然此系大观，尊处如另觅得，希转录一示为荷。手肃，敬颂台祺，不具。（家兄一函附上）弟期福成顿首。初九日（1882年）。

## 二十八

子梅仁兄大人：客腊肃布寸函，兼呈菲仪二种，谅登签室。旋接十二月十四日手示，敬聆一是。比维勋猷懋著，春祉蕃增，至为企颂。此间一是如恒，镇、道、县先后晋省，弟只可在此留守。差徭事，据各处陆续详复，果能照章妥办，当尚不至病民。现已叙稿核转。惟周载翁所禀号草、屯粮、官价等事，须迟至月杪汇齐禀复。鹤渚之事，詠史如何复奏，迩来有消息否？六诒、然藜、淮甸、茂叔皆以嗜好被人指摘，其事果确，恐当不安其位。近日封疆何调动之多也。兹乘枫臣军门赴省之便，带还前借襄平足银三百两、寿分五两，希即察收。匆匆泐布，稍达谢忱，敬颂春祺，不具。弟期福成顿首。新正初六日（1882年2月23日）。

再顷接津门家信，知以弟鼓盆之感<sup>④</sup>，猥承宠以华幃，勿谢弥殷。弟在此恐致各州、县烦费，拟勿举动；俟春杪交卸回津，稍就寅友最熟之处酌散讫函，即遣小儿扶柩南旋耳。王补庵太守已晋省请咨，可赶于二月初旬引见，上巳节前，似可回任。此间三月府试，四月院试，若王君于端节前回任，弟系暂署人员，实属赔垫不起，已面呈其勿稍稍延矣。再颂勋祺，不具。弟期福成又顿首。

① 黄寿丈，黄彭年字子寿。

② 朱亮兄，朱采字亮生。

③ 钱应溥字子密。

④ 指薛福成元配陈氏（1838—1882）于十一月初八日病卒。陈氏为候选州同陈晓峰之女。

## 二十九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握别兼旬，每殷渴想，旌从回省后，想甚忙碌。弟掣签一事，尚未得信，大约春、夏之交总有消息。前承示及《朔方备乘》，三月内必可到手。顷徐仲虎来函，亦托代询。弟如掣改他省，尤难永待，务恳执事再向兰石<sup>①</sup>一催；如已刷竣，希即觅妥便带下为感。计弟所经手者共有五部。其中仲虎所须之三部，似于去秋先已交价至弟所，未知确否？顷阅邸钞，溥泰革去公爵，孟传金发往军台，办理殊为严厉。又有人自京来者，（王可庄<sup>②</sup>殿撰为宫保述之）述及宝竹坡<sup>③</sup>之妾并不美，且多麻点，而竹坡平日自署其著述，曰：《满汉八旗名士诗草》，于是都人士为属对曰：“满汉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颇觉字字工雅，为之一粲。肃泐，敬颂台安，诸维心鉴，不具。弟福成顿首。三月初十日（1883年4月16日）。

## 三十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顷奉廿二日手书，详示各节，知前函所陈乃系弟之误会，从此恍然无复疑怪矣。然非直罄所怀，则彼此疑团莫释，且恐执事未遽惠我好音也。一笑！承示心气亏损，已服药十余剂，务望节劳调摄为要。比已霍然否？念念。《朔方备乘》津局既有存书，拟就近先买一部，以应急需。至弟与仲虎拟印之七部，只可俟后再议。其先交之价，现查得旧账，系是津平九两四钱，想刷印此书，又须缓至六七月矣。越事竟无善法，将来必归到全属法国而后已。此事误于去冬唐鄂生<sup>④</sup>之撤退滇军；法人知中国本无意于争越，故将宝海分界保护之议翻驳，而并撤

① 吴煥采字兰石，号兰道人，别署宛溪吟客，安徽人。李鸿章幕僚。善画兰竹，有兰石画谱行世。

② 王仁堪（1848—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光绪进士，官至苏州知府。

③ 宝廷（1840—1890）字竹坡，满洲厢蓝旗人。同治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

④ 唐炯（1829—1909）字鄂生，贵州遵义人。1883年由云南布政使迁云南巡抚。曾率滇军参加中法战争，但对黑旗军在怀德、丹凤抗法不加支援，后以擅自逃回云南被撤职逮问，定为斩监候，经左宗棠解救获释，戍云南。

宝海，缘滇军之退在宝海来议之先也。弟于正月间曾著论一篇，痛辟鄂生退军之说，见者莫不叹为确论。今事已无可为，傅相若遽南行，徒致不得收场，想在沪暂驻月余，即须回津也。相节于廿三日抵沪，法廷派其驻倭公使脱里古<sup>①</sup>来议越事，日内计已抵沪，然必不能就范也。旭翁想已抵保垣，联床共话，乐叙天伦，殊堪健羨。废唐昨已过天津赴省，据述坟案谓“不敢决为实系秦墓，亦不能断为必非秦墓”，其论似尚平允。弟亦贻书屡劝家兄格外退让，但事既做到如此劣拙，碍难收场。且彼无和意，我亦未便求和，致令得步进步（浙事虽已发动，亦未甚得力）。执事才长识远，颇有排解之法否？复敏被召之说，至今寂然，想皆不愿出山也。敬颂台祺，诸惟亮察，不宜。弟福成顿首。廿六日（1883年5月2日）。

### 三十一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秋初别后，久未通问，以无事可言，且因夏间家兄处缠有口舌，故不欲多费无益之笔墨也。比维勋猷懋著，潭祉绥愉为颂。法、越之事愈逼愈紧，两不相让，猝难转圜〔圜〕。如有兵事，当在冬春之交。粤帅<sup>②</sup>以刘团之退（实奉越王之命）归咎于滇；滇中屡奉严旨诘责，岑帅<sup>③</sup>自请挑带万人进扎山西<sup>④</sup>闻已俞允。吴清翁添募三营，京东防务自可分任。曾沅老<sup>⑤</sup>为张宫保<sup>⑥</sup>所劾，其回奏甚得大体，傅相称其涵养功深。前日过津入都，不知朝廷如何位置也。尊处于时事有新闻否？省中近状如何？秦废唐照章得奖，来信称此事承执事始终成全，甚为

① 脱里古 (Tricou, A.) 1883—1884年间法国驻华公使。1883年6月6日，脱里古到上海与李鸿章谈判。

② 两广总督张树声。

③ 云贵总督岑毓英。

④ 越南地名，在河内西北。

⑤ 曾国荃字沅甫。

⑥ 张之洞时为山西巡抚。



感激。惟上有老亲，亟盼得一委署，台端能为向方伯一言否？徐种虎来信催索《朔方备乘》，不知局中究竟何时可以开印耳。肃泐，敬颂勋祺，诸惟朗鉴，不宜。弟福成顿首。十一月十四日（1883年12月13日）。

### 三十二

子梅仁兄大人阁下：手示敬聆一是。越事自山西失守后，久无续音。法人扬言进攻北宁，而徘徊已阅数月；或者稍留余地，以待转圜，亦未可定。嘉州<sup>①</sup>于冬月杪督师二十营由滇起程，大约年内可抵越南之兴化，斯时法国添兵已到，而中国亦骤增大军，声威较盛，或竟辍其进犯北宁之议。然相持日久，终是不了之局。南丰久无位置，恐又搁住。詠史正在假中，又碰一钉子，似是催令速去之意；然闻膺史决不引退也。季重<sup>②</sup>刻意练兵，于新式火器颇极究心，开岁必可膺疆寄。秦君之事屡费清神，随时照拂，感同身受。旭兄处珠绸款一节，当即转达家兄，似已将详细情形径复尊处矣。匆泐，敬贺岁禧，不具。弟福成顿首。廿九日（1884年1月25日）。

### 薛福成致沈玉麒书札

旭初仁兄大人阁下：阔别两年，弥殷渴想。比维勋猷日懋，潭祉增绥，至为企颂。此间<sup>③</sup>自正月望日法船来犯口门，幸炮台兵轮合力迎击，两挫凶锋，浙防恃以完固。弟筹办防务，寝馈为废者四十余日。今虽和议有成，尚须严为之备。如不再有反复，

① 嘉州，指岑毓英。

② 季重，指吴大澂。

③ 薛福成时为浙江宁绍台兵备道，护理浙江海关监督。

斯中外生灵之福也。顷接保定来计，惊悉令叔<sup>①</sup>大人骑箕仙逝，駭愕实深！惟宏勋伟业彪炳南天，况福寿全归，哀荣兼备，斯亦可无遗憾矣。兹有祭幛一悬，因闻子梅已起程赴蜀，恐付浮沉，特寄尊处，希查收转致为荷。兹有恳者，先君<sup>②</sup>涤非斋文板前经执事代为收藏，敝处存本无多，而索者络绎踵至。兹寄上漕平银十两，请执事代为刷印一二百本，经交信局寄下，必可速到。诸费清神，曷胜纫感。匆泐布达，敬颂勋安，诸惟荃鉴，不宣。三月十一日（1885年4月25日）。治愚弟薛福成顿首。

## 二

旭初仁兄大公祖姻大人阁下：奉十七日京口<sup>③</sup>惠函，敬聆一是。就途荻芳懋著劝办直赈捐务，至为企念。浙省捐项，闻中丞<sup>④</sup>之意，拟认解六万金；省局来文，系照海防捐数派定一五折。昨绅会议，却未能确有就绪。惟既可援例请奖（照海防捐再作八折），明春或可陆续收捐如所派之数，但不能克期交卷耳。尊意欲为小女执柯，承示吴子实<sup>⑤</sup>学士之次公子近甫断絃，年二十五六，品貌亦好，如能撮合，深惬鄙意。应请执事一面与子实兄商议，如渠意谓然，可再将女八字寄上；惟男八字亦须开示，以便弟用子平命理一推，庶彼此可以会商。至弟之诸子，除大小儿已完姻外，二小儿十五岁，三小儿十三岁，四小儿十岁，皆未经聘定，执事如能代为留意甚善，甚感。惟择媳与相攸微有不同：相攸专取家世清华，家道殷实与婿之年貌、品学；择媳先问家世与家教，及

① 熊沅寿恪，字朗山。

② 薛福成之父薛湘，字晓帆。道光进士，官至广西潯州知府，未赴任而卒。薛福成弟兄六人，兄福辰、福同，弟福保、福初（其自署名皆作福初，不知何故）、福庚。

③ 即今江苏镇江。

④ 指浙江巡抚刘秉璋，安徽庐江人。官至四川总督。

⑤ 吴宝忽字子实，江苏元和人。廷琛之孙。同治进士，授编修，典试陕、甘，擢侍读学士，充广东学政。

女之德性、容貌，诸费清神，随时物色示知，纫佩曷已！手复，敬颂勋安，顺贺年禧，诸惟鸞照，不宣。治愚弟薛福成顿首。祀灶日。

再启者：昨闻子梅已经傅相札委会办招商局务，想不日可以到沪；宁、沪一水相隔，自能音信常通，深为欣慰。执事到省数年，现于电局之外，尚有何差？谅必夙猷日懋为上游所倚重，至以为颂。兹有奉托者，弟有两女，年已长大，尚未字人；从前选择过严，遂致耽误。今大者已廿二岁，次亦十九岁，势难再缓；因思苏垣系东南都会，执事亦太邱道广，拟请随时费神，代为物色。大约门户相当，读书聪明，家道殷实，三者缺一不可。然门户虽高，而已多习气；读书虽俊，而人欠诚笃；家道虽富，而怙侈蔑义者，亦无取焉。抑或有少年科第，而年未及三十，才德两优者，即为续絃，亦无不可。务恳于官绅中留意焉。倘能有成，感谢奚似。再颂勋安百益。弟福成又顿首。

### 薛福辰致沈能虎书札

#### 一

芷麋仁弟大人手足：八月初六日酉刻，奉到七月廿五日复教，何濡滞乃尔耶？承询各节，非但忠君之谊笃，抑亦爱友之意多，感何可罄。津门喧传：或红或泻；伯相来信并无此言，想是鄙呈伯相各城屡请秘密，遂致有以讹传讹之词。然切恳勿即以贱子揣度厄词函询津、沽也。西圣<sup>①</sup>自廿四日泻止熟眠，日有起色，至七月廿六日，眠食居然复元。太医李德立以为到此地位，渠虽不敏，总可操券，以报大安，因千方百计营求。至廿七日清晨，渠单衔进方一个，竟蒙圣上试服。谁知依旧通宵不寐，并见肝风大动，举朝震恐。鄙人万不得已，仍钦遵圣训，代制一达木培土之方，

<sup>①</sup> 指西太后。

一服而新症悉平，眠食康复。圣上经此比较，便知高下判然，立将李德立要交刑部治罪。经内务大臣碰头四次，奏称李德立不过医术荒谬，其急欲求好之心，盖与薛某无异，乞暂宽免，乃蒙俞允。从此处方论药便少掣肘。自廿八日至今初六日，调理又将九日，居然食量加增（谓比未病时有加），仍在内办理紧要公事，了无困乏。大约从此竟无阻碍，则早在中秋，晚在寒露节令，当可告成矣。江苏潘中丞<sup>①</sup>以得失心重（盖本钱较大也），到即以乞病假一月。马文植、赵天向均经随同请脉数次，日下奉旨无庸再诊，但须于方子头上备列衔名。浙省所荐之薛宝田、仲学轺，今日始经过，而圣躬已九分九厘大安，想亦方子头上列衔之局（惟沅公<sup>②</sup>所荐汪令<sup>③</sup>颇为小兄得力之帮手耳）。其他如湖南所荐连士华，岷帅所荐程春藻，计日内先后可到。总之，鄙人此次为之事，系勉竭驽骀，幸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事须权其轻重，迫于义之不得不然，非得已也。太冲入替，确有此说，前蒙伯相密询，已经据实以复。盖宝廷之密请，而枢府从而玉成之，以为卸责地步耳。至于医事中之千回百折，惟伯相得知其详，而求其不必告人，虽作尺书，寸许不能尽述，留作他日谈资矣。令伯兄旭初仁棣处，念念不置，实不暇修函为歉。正写此函，而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只可即此数次封寄；欲言者尚有倍于此絨也。专此密复，敬颂勋祺。如小兄名心泐。初六日戌刻即复。阅后即付祝融氏<sup>④</sup>掌之，一切均求勿泄。又及（1880年9月10日）。

① 潘爵（？—1892）字伟如，江苏吴县人。湖北巡抚，1880年免职。

② 曾国荃字沅甫。

③ 汪令，汪守正字子常，浙江钱塘人。汪小米胞侄。官山西阳曲知县，通水道，精于医道。

④ 祝融氏，火神。

## 薛福祁致沈玉麒书札

### 一

旭翁仁长兄大人阁下：日昨躬诣德门，饫聆清诲，只以匆匆肃别，未获畅所欲言，益增怅悒。正拟肃函布候，适奉华翰，殷殷垂念，关爱良深，感谢曷已。弟解装后，随询家事起衅颠末，枝节横生，势成不解。自维弩劣，实无术以了此奇变，爱我如公，其将何以教之？敝眷早已返宅，而家长嫂暨舍侄昌侯尚住外家，风波未定，不能遽议安集。现已驰告叔兄<sup>①</sup>，请其作速南旋，主持家政；并将实情函告抚兄<sup>②</sup>，请其酌度情形，妥筹行止。异时诸昆遄返，弟责成或可稍轻耳。承询家兄候简始末，初到京时，吏部照章咨送，即有章京云：题缺列单，枢廷向无成案；因遍谒大枢密，金云：吏部即有公牍，枢廷总当照办；比及部文到枢院时，大枢密均未及开口，章京进云：题调选向不列单；各堂亦不置一语，遂被搁煞。盖道、府两途归简（以应补列单），则统压各班，随到随放；归选，则周转甚滞，非五、七年不能得。是以章京诸公把守甚牢，一毫不容放活也。嗣又谒见邸堂，因以吏部有成例而枢廷无成案各节详悉禀陈，蒙答云：定例数十年来起复道、府不少，何至竟无成案？若拈出样子还是列单，容当与各堂商之。次日谒见王少司农，蒙告云：今日邸堂入值，因阁下事饬章京辈彻底根查，不容含糊了事，章京辈颇为震慄；此事系道光五年后军机私定之例，未经咨部者，故部处办理两岐，以阁下之才望，且系有单之人（此系密语），何患不放？何必争此，以后幸勿再提。自此亦不容再说矣。现在抚兄之事应补单，虽未办成，而从前李、

① 薛福成字叔耘。

② 薛福辰字抚屏。

丁<sup>①</sup>诸公之密保尚有三四起在内（枢廷汇集一处，因部文知照揭去“丁忧”字样）。若官星透露密保单，亦易发动，惟不能拘定何时；若轮选，则周转甚滞，不能作用也。知关履念，故缕及之。吴门有无近闻？风便祈示我一二。手此布候，敬颂潭祺曼福。如小弟福祁顿首（1880年）。十舍弟附笔请安。

## 二

旭翁仁长兄大人左右：奉廿三日赐书，敬聆一一。即谗潭祺嘉谥为颂。抚兄自七月初八后，尚无片纸到家，正在焦盼间，接展来示云云，为之忻慰。所事虽口有起色，但观咄咄书空一节，想见担荷綦重，劳恐备尝，真有公尔忘私光景。私心窃计，但祝极早脱身，斯为至幸耳。叔兄到津，尚无信来。惟舍侄暨仆从人等已于初八日附轮，已于十三登岸矣。季兄<sup>②</sup>在蜀消息常通。稚帅<sup>③</sup>近无新政。惟川省机器局自遵旨重开后，委员曾姓忽于局旁小河内引出自然之火（川省火井自富顺外，他处不多见），无意之中发天地自然之宝藏，实于各省机局外别创奇观。惜经费支绌，川江险阻，购运不易，不能尽其妙用云云。俄事尚无归束，恫疑虚喝，西人惯技；若我纯以柔道胜，则彼势必于十八款外多所要求；若稍欲自强，则守御殊无把握，后此波澜正不知伊于胡底，思之殊切杞忧。以后如有续闻，仍祈赐示一二。抚兄处如有信来，谨当随时驰慰绮注。手此奉复，敬颂台祺，不具。如小弟福祁顿首。八月廿六日（1880年9月30日）。通甫弟暨舍侄辈均附笔请安。

## 三

旭翁仁长兄大人左右：久未上书，但深驰结，正拟肃函布候，适奉赐谕，快如晤谈。即谗潭祉绥愉，履祺嘉畅，式符所颂。

① 李鸿章、丁宝楨。

② 薛福保字季怀。

③ 丁宝楨字稚璜，时为四川总督。

抚兄在都，接过九月廿三日所发信，得悉西圣新恙悉愈，须旧恙一一就痊，方许报安云云。圣意向用诊事，尚无了期，翻不如仲、薛、连、赵<sup>①</sup>诸君，转可悠然事外。昨接叔兄十五日来书，得悉抚兄近状，医事近稍顺手，不问公自知（昨问业已南旋，确否？）技穷势绌，渐自引退，业已两次谏吉报安，既而中止，盖圣躬虽臻大愈，然元气过亏，终未能拔去病根。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来书所述俄事，一如来翰所云。闻译署议结球案吃亏过巨，言路已纷纷纠弹云云。不知是何等吃亏，来书未经缕述，尊处颇悉其详否？维私公接篆后，韵流锋发，是否不减曩时？与延陵公有无齟杌？吴中新政，便中乞示我一二。天气枯旱，吾邑疾疫流行。前月中，抚兄处眷口大小俱病，日来甫陆续就痊，然次侄女竟以慢惊殇；抚兄以回天妙手，而眷属却皆不免于病，所谓“其床缺足，而不能理者”，非耶！手此布复，敬颂台祺，不具。如小弟福祁顿首。十月廿五日（1880年11月27日）。

#### 四

旭翁仁兄长大人座右：春间道出吴门，专诚趋访，适从者旋里拜扫，未获晤谈，怅然而返。前月沪江返棹，风利难泊，未果祇谒起居，尤深悒悒。顷读致通弟<sup>②</sup>手示，敬聆一一。即谗瀛潭嘉谥，菲禄便蕃，式符所颂。禧圣现报大安，薄海臣民同深庆幸。躬与医事者，以抚兄为到京最先，奏效最著。懿旨谕令枢臣破格拟奖，而钧轴胸有成见，故示裁抑，仅以“原阶奖叙，记名题奏”字样，较诸候选，自胜一筹。现已奉谕留京，调理数月，异日喜占勿药，到准其销差时，当另有一番恩遇也。知关厘念，谨以缕陈。弟本拟前月杪赴苏，盘桓旬日，添置行装，乃到家后俗务猬集，又兼炎暑逼人，不克如愿。现拟望后附轮赴鄂，届时取道吴

① 仲学谔、薛宝田、连士华、赵天向诸名医。

② 薛福庚字通甫。

门，必当祗谒台端，饫聆清诲也。手此布臆，敬颂潭祺曼福。如小弟福祁谨拜上。七月初九日（1881年8月4日）。

## 五

旭翁观察大公祖大人座右：杨玉至署，奉到赐书，敬谂正月杪肃布一緘，已尘笈室。即惟荐祺潭祉，与日俱新，允符私祝。令叔<sup>①</sup>方伯大人东山重望，遽尔骑箕；噩耗传来，五中駭愕。子梅观察万里奔驰，见星行亟，其为摧迫，自不待言。惟入蜀后部署家务，纷如蝟毛，想料理丹旆，东旋尚需时日。迩来有无竹报到苏？至深驰结，中法停战已久，而和议尚无成说，谅不至再起波澜。惟江、浙漕粮数百万腾（囤）积河干，腐变薰蒸，官商交困；迩届和议垂成，不知都已起运否？叔哥近亦嘱代印《涤非斋》<sup>②</sup>二百部，从此流传益广，或者可冀风行。惟屡屡以此琐务烦渎我公，渥荷盛情，但有歉仄。抚哥虽拜升缺之命，内转外升均无把握，近来精力稍衰，频年走俗抗尘，颇形苦累；倘得优游京秩，稍息尘鞅，固深愿而不可必得耳。杨玉千里远来，重以鼎言诤讠，分应收录（现在署无事，且俟到汉阳再说也），惟祁自奉文调补，荐牍盈箱，几如山阴道上。虽从严收用，若辈已无插足之区；即使履新（何时履新，尚无确耗）调任后酌派佳事，总以僧多粥少，所获甚微，恐渠亦不耐久居耳。手此布复，敬颂勋祺，并贺午禧，不备。薛福祁拜上。五月初一日（1885年6月13日）。如有赐函，请交福兴润局，寄省城司门口青华室纸店转交不误。又及。

## 薛福庚致沈玉麒书札

旭翁仁兄大人阁下：接七月初五日惠函，具悉一是。敬惟潭

① 沈寿榕。

② 指《涤非斋文集》。



第绥和、升祺迪吉，为慰颂怀。弟于七月内偶抱渐疴，以至不能即时裁答，罪何可言。想知我如兄者，必能见谅也。八家兄<sup>①</sup>以六月十三日到家，部署一切，拟于本月二十外起程赴鄂，尚不至逾限也。西佛<sup>②</sup>以六月二十五日报安。抚哥所赏扁额为“职业修明”四字，系禧圣自撰；汪子常<sup>③</sup>扁额为“效奏雷桐”<sup>④</sup>，系徐阁学颂阁<sup>⑤</sup>所撰，而禧圣取以赏子常者也。抚哥亦不能即时出京，盖报安后仍须请太平脉，非耽擱数月不可也。江左诚意伯<sup>⑥</sup>为张孝达<sup>⑦</sup>等所劾，首款系吸食洋烟，现交衡阳<sup>⑧</sup>密查，即从前统带水师之某帅也。某帅素称铁面，或者顾梓桑之谊，亦不至于易位。我兄两次来函，称谓搢谦太过，十年以长，本为弟所(?)兄事，兼以我兄与诸昆多年交谊，断不可用寻常客套；以后幸勿再以尊称相加为荷。是所至禱。肃复顺颂升安，惟希伟察，不宣。如弟薛福庚顿首。(1881年9月)。

## 附录

### 徐悲鸿先生题跋

书翰之汇集，吾之不学。唯从孙过庭《书谱》中，知晋谢安素善尺牍，是存留时人书简之僻也。吾居欧时，见报端消息记载一拍卖场所拿破仑手札一通出售，求者争致。盖汇集古今各地邮票可证地理、历史，与集古印者俱为掌故之资耳。而嗜之者实不留题。彭谷声先生聚古人书简逾十万通，真洋洋大观。不足，又遍邀诸友好，指名求索，以成其美。不佞闻见鄙陋，以所知识诚

① 薛福祁。

② 西太后。

③ 汪守正字子常。

④ 雷公、桐君，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医药学家。

⑤ 徐郟字颂阁，江苏嘉定人。同治状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⑥ 诚意伯，指两江总督刘坤一。

⑦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

⑧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曾巡阅长江水师。1881年，命署两江总督，辞免。

未尝有也。其中或葆有重要史料，未可知也。“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为题数行，用志墨缘。

一九五三年癸巳，悲鸿。

### 徐悲鸿先生书札

谷声先生惠鉴：弟曾复先生一函，殆未收到。先人手迹收有不少，其余可任其在社会流转，弗需留意已。尊藏名人手札十万通，必有精品，可举告其目录否（一二十通）？弟不搜集，但名流投书，皆为保存，亦不下数百通，故难以分赠。如命题字，自深欣幸。敬祝百益。弟悲鸿顿首。三月卅一日。

### 郑逸梅先生题跋

溧阳彭谷声先生，彬雅渊达，富收藏，尤多蓄前贤牍札，与予有同癖。情契趣洽，彼此过从者若干稔。既而先生捐馆，哲嗣长卿犹在童髻，赖母、姐抚养，备极艰困。及弓裘载衍，而乃翁遗泽什亡其半，继之十年浩劫，则仅有寥寥，不堪遮眼矣。幸也，长卿于罡风暴雨之余，整辑丛残，尚得梁溪薛家诸札，凡四十通，遂汇为一册，付诸什袭，虽涓流之于沧海，一篑之于山丘，却聊胜于竭源而灭迹。且札中往往有铨叙名理，裁量人物，足资征考者，长卿此举，作劲文物，不毋有功。蒙见示，寻绎一过，爰识小语，以为末跋。郑逸梅时年八十有九。

## 陈其美函牍

陈其美

**编者按：**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1906年到日本人警监学校，参加同盟会。1908年回上海，往来沪、浙等地，联络会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7月参加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总部。武昌起义后，联络上海商团武装起义。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都督。1913年在讨袁战争中，曾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部长，主持中华革命党的日常工作，从事反袁活动，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1916年被袁世凯收买张宗昌派人刺死于上海。

本篇共收陈其美于1914年至1916年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时期与有关革命党人来往函件公文三十五通，内容为联系党务、筹款、运械及上海肇和之役等讨袁情况，为研究中华革命党人活动的珍贵史料。原载于1977年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秦孝仪主编《陈英士先生文集》一书，各函均系录自国民党党史会所藏原件、或影印件及档案。《文集》各函下原注有“党史会藏影件”、“党史会藏毛笔原件”、“中华革命党总务部第二局公文存稿”等字样，今于刊出时均略去。各件标题及括号内公元年月日为编者酌加。

### 1. 致叶独醒函(1914年5月4日)

独醒同志仁兄鉴：据阅四月十五日来缄，欣悉宿务筹捐，足下出而肩任，吾党深庆得人，欢慰无既。书中抱志坚迈，语语皆从肺腑道出，快人如兄实不可多觐。怡朗寄来闽饷额二千元，已交财政部发给收据，日间可到。陈民钟君曾经本部委任来埠办理闽债券事，务望足下竭力赞襄一切。吾党近日各方面甚形活跃，

惟军兴之际，需财孔殷，在在仍冀我兄鼎力也。袁氏固在必倒，吾党进行以实力为主旨，决不肯作苟且因循计，足下所虑，足见关心，殊为敬佩。国事日趋佳象，宜为道自爱不宣，即颂伟安。总理复，总务部代，陈其美五月四日。①

## 2. 复宿务部长叶独醒函(1914年5月10日)

迳复者：五日九日接到足下四月二十三日来函，内称谭荣、欧阳尧二君技艺既臻娴熟，又忠于本党，愿服从命令为国家尽力，披览之余，无任欣慰。足下与贵埠同志，对于两君极力慰留，以待本部处置，尤能特见其大，足征宏识，比即面呈总理中山先生，商计一切。惟飞机事业，应当如何计划进行，以副将来应用时，得收圆满之效果，此间无从酌夺，总理命令即请足下主持，或宿务同志就近协商办理，以期妥善，并希将本部瞩望殷勤之意，转达于谭荣、欧阳尧二君，一面将办理情形报告本部，以便呈请总理核夺。此复。即颂大安。宿务支部长叶独醒君鉴。总务部陈启美启。五月十号。②

## 3. 收到居正文来约书收据(1914年7月16日)

收到觉生老哥交来玄字号约书印本一册，自八百〇一起。嘱转交夏之麒收，当代收明转交勿误，立收据是实。中华民国三年七月十六日立。陈其美具。

## 4. 收到总理交来公用费收据(1914年7月17日)

收到孙先生交来，分付各省公用费日银一万一千元。此据存信。中华民国三年七月十七日立。陈其美亲笔。

① 原注：原件未书年分，当为民国三年所发。

② 原注：原件未书成分，初步考订当为民国三年所发。

### 5. 致军事部公函(1914年9月)

为移交事，窃以大部业经成立，所有各省支部长及各同志，先后送来关于军事计划调度各意见书报告册等，自应汇交大部，以策进行而专责成，庶量才器使因应，不至乖方，缓急后先，举动易期一致，除各意见书报告册等附送粘列清单表明件数外，合具缘由，敬请周、许二先生督核施行，至纫公谊。陈其美上，九月。

表列各意见书报告册件数如左：

一件周吴陈条，陈对于江苏之意见。

一件徐支部长报告江西军事进行之方略，附表二纸。

一件徐支部长报告江西支部职员册。

一件徐支部长报告第一次委派内地干事人员册。

一件徐支部长报告第二次派往内地人员册。

一件徐支部长报告第三次委充内地干事人员册。

一件组织福建讨袁军，刘专员条陈经略福建大计书，附呈请发给枪械军票等表一纸。

一件蒋专员呈对于三次革命意见书，附官民两军比较强弱表一纸。

一件湘支部报告委任职员册。

一件湘支部保荐党员册。

一件湘支部呈报委任回国党员应给川资名册。

以上共十一件。

### 6. 总务部成立报告(1914年10月11日)

中华革命党总务部为呈报事，窃总务部遵照总章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于十月十号成立，每日办事时间，自午后二时至午后五

时止。再前奉颁下石质印信一顆，文曰“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印”，遵于十月十一号启用。除通告各部各支部外，理合呈请备案存查，为此具呈，须至呈者。右呈中华革命党总理孙。陈其美。中华民国三年十月十一日呈。

### 7. 本部仍设东京复诸同志函(1914年10月29日)

总理孙先生交下尊处来函(九月廿八日发)，具悉一切。左右关怀本部，恐因胶州战起或致变迁，足纫公谊。所堪告慰者，本部机关毫无动摇，设立地址在日本东京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足下来函封面但写明林蔚陆收启，不可写出机关名目。至参与要事诸同志，自当别列清单通告海外也。肃此奉复，即颂义安。诸同志均此，陈其美。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启。十月二十九号。

### 8. 致菲律宾某支部函(1914年11月9日)

迳启者，十一月八日由总理发下委任状二件，改委郑君汉淇为菲律宾支部长，王君忠诚为副部长，并谕转寄等因。为此除将委任状二件寄交外，即烦贵支部长查照收存，并希将办理一切情形汇册详告，其前所给发马尼刺支部长之委任状，亦望寄回注销，实为至盼。此启。顺候时祉。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十一月九号。①

### 9. 总务部致安徽同志函(1914年11月14日)

安徽同志忠信先生公鉴：昨奉总理交下诸君十一月五日公函，公推金君维系任皖中司令，暂兼皖南事宜一节。其后总理续得沪电，业经电复照准，并据电准委毕少山君为皖北司令外，属敝部再具函答复，希即遵照办理为幸。将来皖省之事，务望诸公融洽各方面之意见，成一致之进行，不胜切盼之至。专复此请公

① 原注：原件未书年分，初步考订当为民国三年所发。

安。总务部启。十一月十四日。

#### 10. 总务部致湖北詹大悲函(1914年11月17日)

大悲先生鉴：顷奉总理交下执事本月八号所发手书，敬悉执事热心奔走，以致鄂省党务大有进步。日下时机瞬息千里，仍希全力奋进。蔡君已来东京会晤一切，业返长崎，当刻日赴沪也。专复并颂筹安，总务部。(三年)十一月十七。请缮发，持<sup>①</sup>注。十七日。

#### 11. 总务部致黄寰函(1914年11月17日)

顷接本月九号所发手示，备悉一切。前发电大村，请足下来东京一节，因该时有特别事件，拟与足下筹商，不意足下出发甚速，业已起程西行，又未留目的地之通信地点，本部遂别求办理之法，已告完结矣。其后接由清津来函，请款接济，本部一时无款，故一面复电，一面发信。盖虽无款而其时有可以得军械之希望，询足下能得海口起运与否，此事非电文所能言者，故特具函上达，殊邮局将原函退回，谓执事已离清津也。今来书敬悉执事锦旋大村，北方之事暂守沉静。辱询本部近来之进行，本部无时不取积极主义，但每款项掣肘，难如所愿。足下当有万全之计划，使本部刻日奏功也。望裁复，不尽欲言。此致醒尘先生鉴，总务部(三年)十一月十七。请缮发，持注。十七日。

#### 12. 总务部致汉口某人函(1914年11月17日)

陆生先生鉴：前得沪汉两笺，知执事已安抵汉口。今又接十一月五号手示，汉口近况亦已备悉。款项一事，理应照办，惟本部目下困难异常，无款可拨，仍请勉撑难局，毅力进行。此间自蒋士立<sup>②</sup>被枪后，足下还国一节，业已见诸新闻，湘省之行，本

<sup>①</sup> 指谢持，下同。

<sup>②</sup> 蒋士立为袁世凯派往日本的特务。

部极为系念，还汉口时，望速函报东京也。专此奉复，即颂筹安，总务部，(三年)十一月十七。请缮发，持注。十七日。

### 13. 总务部复某人函(1914年11月17日)

孝甫先生鉴：日前接到一函，内附徐君誓约一纸，本拟即复，因周君当时将来东京，故未复也。今又接来示及内附秦君誓约一份，深念足下之窘困情形，已函知上海照料，倘上海款项略能活动，必有以报足下也。附上徐、秦两君之党证，即希查收转寄为禱。此复并颂近祺，总务部。(三年)十一月十七。徐君党证因不知徐君之名字，故未寄上，请即将徐君之名字开下，以便即寄。又及。请缮发，持注。十七日。

### 14. 总务部勉李绪昌奋力猛进函(1914年11月22日)

敬复者：顷奉总理交下十月八日所发手笺，敬悉执事留心党事国事，不胜纫佩。所言各条之洞中款要，多与时局有益，通告一节，尚待斟酌。至于国际上之办法，本部略有成竹，可勿过虑。嗣后对于时局，仍希奋力猛进，以达宿愿。如有卓识，尚望随时见示为盼。专复。此致绪昌先生鉴，并颂义祺。总务部启。(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请缮发，持注，廿二日。

### 15. 总务部复上海管毅函(1914年11月23日)

迳启者：读阁下廿一日致英士先生之函，敬悉沪上同志困难情形。索款一节，理应照办，而本部近来窘状万分，所筹划之款，不但尚未到手，且更不敢遽尔有望，是以实难应命，更希将此间近况酌告沪上同人为幸。英士先生现已卧病，故特以本部奉复，方命之至，尚希原宥是荷。并附还附件七封，即希检收为禱。此致管毅先生侠鉴。总务部启。(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 16. 复庇能支部长陈新政函(1914年12月16日)

迳复者：接11月18日来函，比悉各节，据称南洋党人凡有举事，向之捐款甚易，而进党甚难，于是欲变通办理，不必一体改进，党员方能多集云云。夫不进党固不能谓之党员，且对于党中无维持之责任，故凡各地设立支部，皆必须按照章程循序以图扩充，侨胞不愿进党，必系惕于利害关系，而有所趋避，是即智识不足、眼光不定之故，务烦切实开导，多方鼓吹，总以得其进党为第一要义。凡人偶有不爱党而断无不爱国，吾党所以不避艰难困苦、日夕经营者，非为国家之事乎，侨胞能见及此层，则移彼爱国之心以爱党，特一南针之拨动耳。诸事尚希热心毅力，勉策其难，若通融手续而显背章程，则非敝部所敢出也。至军事未发生以前，事前筹款尤关紧要，对于党外运动，务希全力注视为要。现贵支部既收积入党费数百元，即希直接汇寄日本横滨(yokohama)“渣打银行”，可到东京本部，以为事前之用，以后无论何种款项，均请照前次通告，一律办理，此复庇能支部长陈新政君鉴，并颂时祉。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十二月十六日第二号。①

### 17. 致筹划把东支部杨濮孙函(1915年1月11日)

迳启者：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总理台谕，现值实策进行之秋，必须物色人材，协图并举，方能克期奏效。查把翁君筱生道德经验、声望素著〔著〕，此次来函所陈各节，既洞悉侨民心理，亦实防后日流弊，总先后以为言，着着具有见地。应总务部函达把东支部嘱其邀同翁君筱生，悉心筹划支部进行。或请其担任职务，以冀将来党务发达。至翁君所陈侨商豪富之家，畏言革命，苟有人鼓励则虽不能显然入党，亦能得其暗助巨资一节，想属实情。当请足下与翁君详细审察，如实有不能显然入党，但由总理具缄联

① 原注：原件未书年分，初步考订为民国三年。

络，或请其赞助即能收鼓动之效者，希即随时函照，实为公便。此启。把东支部长杨濮孙君鉴，并颂新祺。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四年一月十一日。

#### 18. 致麻坡支部长郑汉武函(1915年1月12日)

迳启者：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到致敝部与党务部来函，并附誓约六十六张，党员名单一件，进支款目表一件，并寄回分部长委任状一件，均已察收。除将誓约党员名表移党务部存案外，余归敝部分别保存或销毁。来函内称前由新加坡台湾银行电汇一千元，此款已经收到，并由总理于十一月廿八日发给第十九号收条。寄卢君耀堂转寄贵支部事，阅两月之久，谅早收到。如未得达，即祈就便转向卢君领取，以免稽迟。又邻埠麻六甲支部已举定沈鸿柏、龙道舜为部长，麻楮巴辖分部亦举定甄寿南、雷锦超为部长。在事实上已经成立，均属热忱爱国毅魄堪嘉，除该分部已经呈报另案办理外，而该支部尚未自行直接报告，其手续似未经完了，然际此军兴在即，党务立策进行，不妨变通办理，除一面商同党务部禀呈总理先行发给委任状正式委任外，并烦贵支部传达本部奖励之意，嘱其从速直接报告补完手续，实为公便。此启。麻坡支部郑汉武君鉴，并颂时祺。附笔致候财政员蔡启凤君。总务部部长陈其美。(第一号，中华民国四年一月十二日)

#### 19. 总务部请委用茅祖权致党务部函(1915年1月17日)

迳启者：顷由总理交下贵部转据江苏支部长吴藻华，呈请委任茅祖权等为科长参议各职一案。奉批准照办理等因。合行转达，即希察照。顺颂大安。党务部鉴。总务部启。一月十七日印。(四年一月十九日上午十时收到)

#### 20. 为拟定军事服务状式上孙中山呈文(1915年1月30日)

总务、军事部部长谨呈：前奉面谕，拟定军事上服务状式。兹已拟就，理合呈请核定。嗣后凡遇发给委任状时，即令被委任者先行照式填写。其委任在前者，亦应一律补填。又发给委状时，如其人不在东京，应将空白状纸与委状同时递寄，由该被委任者填写，寄军事部存案。是否有当？敬请批示。右呈总理钧鉴。陈其美、许崇智。民国四年正月三十日。

具服务状人	今因时政恶劣，国步阽危，本本党宗旨，甘愿担任	任务。
如有虚伪退缩，甘当军法。此状。		
中华民国革命党总理鉴。		
	省 县人	(指印)
中华民国四年	月 日	

附：总理批陈其美、许崇智呈：“所拟适当，着即日施行；惟以前已领委任状者，按时地宜否酌量办理就是。总理批。正月卅一日”

## 21. 致林纪卿等函(1915年2月8日)

迳启者：去岁十月七号，接到足下九月二十一日复总理来函，已将承商各节，于十月二十九日具发矣。兹阅有四月便鸿未至，国家变局不知凡几，凄风猛雨，日促同胞于苦境，所望者惟革命一点之曙光耳。故内地人心之望革命军兴，犹如望岁，我同志经营年余，敢不勉乎。兹幸四方消息日进优胜，春师雷动，义或可与海外侨胞协心一致，各埠计成立支部者约几二十，而分部尚不计也。足见人心奋励，公理未泯，祖国前途大有可望。贵埠处马来群岛之中，东不联于婆罗洲，西不接于班卡岛，南不与巴达裴亚毗连，地势孤悬，若附丽他埠，诚如来书所云，日后有难期推广之虞，故前函请变通办理。即就万里洞全岛设一支部，党员除旧同盟会、国民党党员令其立誓加盟外，凡邦人侨寓斯土，如

有宗旨相同者，亦望广为延纳，远树声援。贵埠为南洋锡之出产地，侨胞在此经营矿业者，谅大不乏人，若支部成立，凡系资本家均望极意联络，以资臂助。本部为广播革命宗旨起见，无论大小各埠，均欲令其酌量情形，一体设立支部或分部，共策进行，以解决国家根本问题，为同胞造无穷之福。前次奉总理制定海外支部通则，一律颁发施行，贵埠亦曾照例寄上，务祈于通则收到后，即日邀集同志开会，组织新党，并依通则选举，各项职务汇表详报本部，以便加给委任。去岁来函内以独当一面，恐会员寡陋，于定章微有不符等语。兹查贵埠组织之初，虽会员寡陋，然于海外支部通则，似含有第二条第一、二项之意，而与第三、四、五项不同，并无与定章不符之处。顺此声明，专候惠复。此达。林纪卿君、吴鲁阳君同鉴，并盼时祺。徐云兴君近日返埠否？复函希便示及，再启。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四年二月八日。

## 22. 致仰光支部长函(1915年3月27日)

仰光筹饷委员长、支部长鉴：公启者，本党财政事务渐繁，非设财政部专理不能清楚划一，去年已由总理委任邓泽如君充当部长，后以隔涉南洋，办事不便，辞而不就。兹由总理改委张人杰君充财政部长，廖仲恺君充副部长。财政部于以成立以后，关于财政事宜，请与该部接洽，并将民国三年以来，所有每次捐款总数，捐款者姓名，每人捐款数目，并注明何国货币，开列清单，迳寄该部，以凭照章发给债券为禱。此致。并请大安。总务部陈其美启。中华民国四年三月廿七日。（财政部仍设立林蔚陆内）

## 23. 致江苏支部函(1915年4月7日)

迳启者：本年四月三号准贵支部长呈请核给汪自强讼费一案，经敝部转奉总理面令此款应当照拨；惟本部目前无款，如江

苏支部长有力通融，先行筹给墨洋叁佰肆拾元，再由本部缓期照补亦可。等因合行函达，即希察照办理，实为公便！此致江苏支部长吴君藻华。总务部陈其美启。四年四月七日。

#### 24. 收到上海通用银洋收据(1915年8月27日)

收到借款上海通用银洋壹万元。中华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陈其美亲笔。

编者按：原件上有蒋中正先生批“收回”二字。<sup>①</sup>

#### 25. 呈请委任张祖汉为总务部第二局局长文(1915年10月6日)

敬呈者：十月五日案准军事部部长许崇智函称：查本部规定各局应设人员，早经呈请总理批准在案，因未得适当之人，故至今均未请委。兹有张祖汉，前清时由闽省讲武学校毕业，第一次起义与各同志组织闽省同盟会，成效甚著。光复后历充军务部执法科长及邵武府知事等职，均实心实力，一扫官僚敷衍贪污恶习。最后崇智开办新兵团，期整顿闽省军队，委该员以征兵训练事务，第二次独立亦复极力进行。崇智稔知其热心任事，常变不渝，堪以委充本部第二局局长，特函此请贵部呈请总理察核批示。此请等由准此，除复函外，理合呈请总理察拟示遵，须至呈者。右呈总理钧鉴。总务部呈。陈其美(印)。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印，中华民国四年十月六日。

附：总理批：行。

#### 26. 复黄吉宸、徐统雄函(1915年10月7日)

迳复者：十月四日奉总理交下九月十五日第九号来函，所称民安栈关系本党在南洋交通机关一节，自属实情，现因经费不充，不得不商筹继续办法。据第五次股东大会决议二条，奉总理

<sup>①</sup> 此按为原书所有，下同。

核准，参酌两种办法以资尽善，而邓君子瑜同时亦有函总理呈，自愿承认经理该栈善后事宜。兹奉总理命即派邓君子瑜为该栈总司理，各旧股东为董事，代本部办理该栈，准由本部拨给五千元作为资本，除前拨一千元外，再由财政部发给债券四千元，交由贵支部转交邓君，所有一切善后，当由邓君按照营业性质制定规则，整顿将来，惟此事经营匪易，同志藉辞负帐等情，在所不免，为是再希贵支部通告各党员，须知本部出资维持，纯系为交通机关起见，并非为个人便利而设，务使人人各有维持之心，方不使经理者之随时棘手，谅众同志公德为怀，亦必有以乐听也。除另函知照邓子瑜君外，特再致复并希查照办理，此启。星洲支部长黄吉宸、徐统雄君鉴，并颂时祺。总务部陈其美。民国四年十月七日。

#### 27. 致伍横贯函(1915年10月19日)

迳复者：十月十一日由美洲三藩市支部代转到呈文名册各一扣，据称军事研究社为造就本党军事人材起见，自制定章程布告侨美各同志后，四方来学者据名册所录，已有学员五十一名，人心鼓舞，贵教务办事热心可见一斑。现既公推冯自由为社长，各职务亦有部署，自应稟呈总理准照立案，并将名册转咨军务部存案。务望加意培植为将来效国之用，敝部有厚望焉。此复。贝市埠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教务长伍横贯君鉴，并颂时祺。总务部部长陈其美。民国四年十月十九日。

#### 28. 致饶潜川、杨景藩等同志函(1915年11月19日)

迳复者：十一月十七日奉总理交下十月十二日来函，并十月十三日蓝君来函，统悉一切。李贞伯奉谭命组织再造党，在瓦城捐去二千余元，虽属等诸虚掷，然党外行动本部无法干涉，是华侨辨别主旨，明其率从也。至陈耿夫原属本党党员，其往各埠筹集

款项，纯出个人运动，并未奉本部特派命令，又因越在海外无法遥制。然查彼经过数地所筹的款，均由各该地同志直接寄来本部，亦不能拒而不收，似此行动虽未呈明，而一段热心确系为党效力，既无他种不规则之举动，则当原其迹而谅其心，望诸公导归正轨，务使以后事事遵照本党正式手续办理可也。又以前云南周知礼君来函，亦述及陈某苏某筹款之事，未悉是否指陈耿夫而言，如晤周君并烦知照至老同志，如庄君等反对筹款，想系不明本党改组之主旨，而误信谣言致成冰炭，务望设法解释，平心静气，喻之以理，正之以义，当无不可融洽也。至诸公等办事勤劳，党务赖以维持者甚力，近日仰光党务，成绩优美，未始非诸公任款任谤遗艰投巨所致。现正事事待理，安可忽然放置。滇蜀虽有动机，而成期未熟，遽以海外远归，恐不免人地生疏之感，尚望留办党务，襄助筹款，其为国之功则一也。此复饶君潜川、杨君景藩、陈君陆明、蓝君磊合鉴，并颂时祉。

附启：蓝君来函合此致复，恕未另笺。

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总务部部长陈其美。

### 29. 上海肇和之役经过通告<sup>①</sup>（1915年12月15日）

十二月五日，上海之役，为第三次革命海陆军突起之一大霹雳，又为各地讨袁军最强有力之导火线，此各报纸所喧传，亦世人所公认者也。事起之后，未及十二时，举已得之军舰，已降之制造局，已占领之城西北淞沪警察署及南市等，均复失之于敌。凡期望革命事业之成功者，莫不为之扼腕！抑知此役以临时之事变，与吾党之计划及时日相违，而决计于仓卒，以致配备未及完善，其他方面，未及应援，遂众寡不敌，起而即仆。兹据○○○○报告情形，除宜秘密者外，专就上海方面述之于左：

本党之谋第三次革命，认上海为东南重要区域之一，军事上

<sup>①</sup> 〈通告〉后注有“第十九号通告”字样。

在所必争，而对于上海之经营，一则遴选党员，购备器械，为组织基本军队计划；一则联络袁氏之驻沪陆海军队，作为响援及策应，期于实行充足，筹备完善，然后约同其他方面，同时并举，此事前之筹备情形也。

近月以来，本党对于驻沪陆海军队之联络，袁氏有所侦知，遂渐将所疑之陆军，分别驻扎，或迳调往北方，次第解散。复遣萨镇冰以检阅海军为名，分调赞成革命之军舰，于十二月六日，出航外海。○○○以为再稍持久，则所联络之军队，四分五裂，不足有为，而某某舰内同志，复以应调生惧，请求急速发动。其时肇和、○○、○○、○○等舰，俱泊上海，皆海军之精华，以吾党之力，益以内应，则此数军舰，必同时可得。再用军舰威力，以临陆军，陆军亦必非降则溃，故遂定计于十二月五日起事，此发动期日决定之情形也。

期日既定，遂为应急之规划，以勇锐党员组织若干支队，海军方面，则以两小艇分载党员，趋赴军舰，促使开战。并令开战之后，以三分之二组织陆战队，助陆路党员进扑制造局。陆路方面，则于攻制造局外，分攻南市，袭上海县城，夺警察署，别遣游击队，破坏电话电灯两局，夺中国银行，皆于五日午后傍晚，先后出动，均以海军炮声为号，此临时布置动员之情形也。

海陆军发难队出动后，约两小时，司令部得一报告，水上两小艇，其一为海关阻遏，不得泊岸，当派人往助未及，而其一所载之党员，已登肇和军舰，开始发炮，向制造局攻击。北兵守局者多奔溃，遂悬白旗降，一面用灯号招各军舰，各军舰次第回号，皆表赞成。时夜已深，陆战队未及组织，而陆上支队亦先后占领南市淞沪警察署，城北城西各处。翌晨各军舰中变，开炮齐击肇和军舰，盖萨镇冰以重金收买故也。肇和药库中弹爆裂，舰遂废。战士不得已，乘小艇退还。陆上军攻入警察署时，守者多携械逃。我军略得步枪若干，都无实弹。及晓，贼陆军四面包



围，我军持手枪应战，不能敌，亦退。趋制造局之军，未及达，被抄袭，又失海军之援。占领南市，及城西城北之军，亦不敌，遂皆退。制造局悬白旗而降之北军，仍复为敌有。攻电灯电话银行之军，更以他障碍未达目的地，于是全体挫败。我陆上军死伤及被捕者百余人，海军将士死十余人，伤数人，此战斗经过之情形也。

是役虽起于仓卒，而从事战斗之同志，类皆奋勇效义，争先恐后，以数百人与数万之海陆军队及警察接战，能得军舰，陷制造局，占领南市及城北城西，攻入警察署。以言革命之精神，其勇往无前，几过广州三月廿九日之役。而所受损害无多，元气未亏，以图再举，其事非难。所惜者，应变而起，未久而仆，他处未及响应耳。至其失败之最大原因，则由财力之不裕，此本党年来历尝之苦，而于此一役，所尤痛心者也。自此次之事言，当地同志不下数万人，而迭次勉力购备之军械，不能供千人之用。此役由陆路进者，分携炸弹，而短枪犹不能尽人而有，故遇包围抄袭，不能长时应战。水上计划，用小艇运送同志，登舰促战，而以款绌之故，事前仅购备一艇，临时五日晨再备一艇，五日适为礼拜日，海关不办事，未能注册领牌，致被关员所阻，不得淀泊码头，运送党员之事，因以不济；遂不能将已有内应之军舰完全夺取，而陷肇和军舰于孤立，终以众寡不敌，受此挫折也。年来海外同志捐助资金，往往罄于临时之应付，不能储蓄大款，以应事机；而由于临时之应付者，复不能敷军事计划上必需之额，此中困难情形，诸同志谅皆意料所及者也。袁贼之罪既已滔天，全国人心咸知本党此时不患无奋勇死敌之人，而患资力之不给，望同志之牺牲生命，不及望同志之输助资金之为急且切也。兹特将上海起事情形及其失败原因布闻，所望同志洞鉴于此，辇金出资，惟力是视，集腋以成裘，合少而为巨，俾本党能为充分之规划，圆满之进行，庶国贼可除，国家可保。夫失败者成功之母，

革命事业不畏百次之失败，终图一次之成功，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也；而武昌有八月十九日之举义，愿与我同志共勉焉。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部长居正启。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 30. 复留沪湖北同志函(1915年初)

留沪湖北同志均鉴：顷由总理交到尊处公函，并命审查答复，窃大事日有转机，湖北同志与有经营之力。其美等鞅党事立志颇奢，惟能力所限，恐难如愿。发挥所本，既有总理之教训，复得同志之相谅，俾革命精神毫无扞格，此吾党可为告慰者也。湖北在我国本部之中心，为军事最有价值之地，第一次革命，武昌一起，天下风从，虽曰人心成熟，地理之关系亦多。去岁刘君殷东来，所有鄂中军务党务进行之方略，已经分别言明，兹不复赘。来示所称，关于军事分区进行一节，正与本部所定计划吻合，惟此后负有军务责任者，不由一分部之机关发生，乃由总理之委任发生，湖北筹备处乃本部未曾成立以前之权定机关，本部成立以后当然取消。且各省凡有筹备机关皆然，湖北不能独异。嗣后湖北军务虽曰分区进行，事权仍期统一，应由总理择人委任，被委任者一立〔律〕实行对于总理及军务部负完全责任，于大计划上较易收臂指相连之效也。专此，敬复，并候全福，总务部长陈其美。①

### 31. 为讨袁汇款联系务求安全致同志函(1916年1月12日)

同志诸公均鉴：迳启者，恭维新岁，覃祉凝禧，远企文旌，延厘是颂。纪元五载，乃民国政脉绝续之交，一线希望全赖人心维系。兹义师振奋滇池，黔桂湘蜀云靡波动，一阳始复，万象更新。雷震春前，正好砺戈锻矛，剪除神奸巨蠹，诸同志自旧迄今

① 原注：原件未书明日期，初步考订当在民国四年初。

联结集合，发扬蹈厉，爱国精神适足以楷模一世，将来新世纪造成，共和恢复，克尽国民之大职，永垂历史之光荣。诸公毅力实有足多者，凡事有因，然后有果；造因既多，结果自速。上海一役，实肇今日之影响，败未旋踵，胜即基之。以后局面开展，疾风密云，一竿千里，大局指顾可定，直意料中事。惟当兹军机切迫，贼胆惊寒，对付虽穷于实力，而造谣献媚乞怜外国，毒施诡譎伎俩，以作为种种妨害本党之计，交通政权未归掌握，外人轻信暗助与本党以打击，是亦事所不免。以后互通函电汇寄饷款，务祈设法求全，不落圈阱而使前途接济无中辍中断之之虞。则文士磨盾草檄，武将上马杀贼，内外一致，天讨共张，民贼早授首一日，则国基早奠定一日，不召外侮，不丧元气，以达迅速解决之目的，则真正共和民国，行告成于五年，以迄于亿万斯年，而底于无穷，不将薄海腾欢举国告庆乎。区区微旨，敢布斯忱。专此敬颂新禧。总务部启。一月十二日陈其美、谢持代署。

### 32. 收到上海通用银九万元收据(1916年1月26日)

今收到上海通用银九万元正。中华民国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陈其美。(当时定明为借款，一切悉照党章办理。)

编者按：原件有蒋中正先生书“收回”二字。并注明为“贝仁元借出”。

### 33. 为筹款讨袁致同志函(1916年1月27日)

贵分部诸同志先生义鉴：顷据夏君归述，贵处党务情形，及诸同志之踊跃输将，热诚救国，殊堪嘉佩之至。今有欲为诸同志言者，袁氏僭帝中国，云贵健儿既兴讨贼之师，东南各省均已着着进行，所以迟迟未发者，非筹备之不成熟，实饷项之难为继，与其急而旋起旋仆，何若迟而稍厚其势，以期一举而倒袁。故云贵起义月余，各省仍未见有十分举动者此也。

近者祖国风云日迫，本部屡电催美洲领袖支部汇款，该部虽屡有应命，惟弟以区区美洲一隅，同志纵极热心捐输，为数亦必有限，而该领袖支部之所以能源源汇来者，全赖各处分部之总汇该处无疑。今本部需款孔亟，而美支部亦闻支绌异常；贵分部诸同志既经认购债票，则望速将该项汇归美支部，再由该支部汇齐汇来，本处如此办法，财政固可以统一，而本部亦可以得一巨款，经营各方面之事业。至于贵分部每次汇款若干交美支部，则请同时将所汇金额及寄美支部之原函，另贻一纸，寄交本部，以备存案，而为异日稽勋之凭藉。在诸同志热诚奉公，固无暇计他日之勋，然酬勋慰劳，亦为本部责任所应尔。诸公高明，谅亦洞明此意矣。用特修函通告，须知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内地同志或则酣战疆场，努力杀贼，或则奔走东南，准备兴师，则所赖以接济饷械者，惟海外诸同志耳。呼吸存亡在此一战，自由奴隶由君自择。愿诸同志其速图之。海天万里，引领为劳，寒风凛冽，伏希珍重，专此敬请团安。不宣。

再，贵分部以后每收到党员饷项，可由贵分部负责即时给发收条，该款汇到美支部后，复由该支部给发总收条或分收条，如该支部能给发分收条，贵分部可不必换回自发之收条，即将美支部收条重行颁发各同志，否则请将总收条粘贴党所内，以便党员之到观，如斯办法则可以明各方面之信用矣。又及。总务部部【长】其美，谢持代署。财政部部长张人杰。中华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 34. 为委任总务部职员呈文（1916年3月9日）

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副部长谢持呈。为呈请事，窃本党成立以来，于民国三年九月组织本部机关，其美忝膺委任备员总务部部长，受职之后，凡总务部应设各局局长职员等，业于党员中遴选

相当人员，分别面呈总理，当蒙允许，遵即召集各员就职在案。惟讫今时阅两年，各员尚属勤谨，理合呈请总理正式加给委任，除将各局长员等姓名另录呈核外，所有呈请加给委任状之处，是否有当，敬乞裁夺施行。再，其美在沪，此次呈请系属副部长谢持主稿，理合申明，为此具呈，须至呈者：

第一局长 余祥辉

职员 陈璞 兼机要处职员

刘祖章兼机要处职员

赵瑾卿

第二局长 陈中孚

第三局长 任寿祺

第四局长 郭崇渠

职员谢心準 连城

第六局长 丁人杰

右呈总理钧鉴。总务部部长陈其美、总务部副部长谢持。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九日呈。

附：总理批：“行”。

### 35. 收到上海通用银五万元收据(1916年5月1日)

收到上海通用银五万元正。民国五年五月初一日立。陈其美。(借款照定章办理。)

编者按：原件注明为李徵五借。

# 伪廷幽影录

## ——汪伪情况的回忆写实

罗君强

说明：《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写实》，是汉奸罗君强写的回忆材料。

罗君强，名光治，别号庸生、竹候、健行。一九〇二年五月生于湖北竹山县。一九三七年八月，罗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少将秘书兼总务组组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四组上校秘书。一九三八年一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秘书长，仍设办公厅，罗任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并兼任艺文研究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同年十二月被免去职务。一九三九年三月，罗君强由重庆经昆明往香港，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

一九二六年开始，罗君强与周佛海过从甚密，以后遂成为周的亲信。当他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之后，不遗余力地进行降日卖国活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重要成员。他参与汪精卫召集的伪国民党“六大”及汪伪政权的筹备活动，被任命为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伪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政训处处长兼党务特派员。汪伪政权成立后，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中央税警学校校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伪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罗君强在党的教育改造政策的感召下，对汪精卫汉奸集团及汪伪政权存在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自己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卖国贼的罪行，也有所悔悟，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逐步将其亲身参加、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予以追述。但是，由于罗君强晚期一直患病，并于一九六九年病故，预定的写作计划，未能全部完成。

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罪行，及其所进行的种种罪

恶勾当,并为历史工作者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及汪伪政权罪恶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上海市监狱办公室提供了这份回忆,今略加整理刊出。本文若干标题及注释为编者所加,个别段落作了删节,个别文字作了润色。

整理者 蔡德金

##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与汪精卫

蒋介石在沈阳事变日寇大举侵华,东北四省相继陷落之后,仍然高叫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逢着纪念日期,虽在文告中略提一句把〔要〕收复失地的表面文章,思想上惟求苟全,连华北也不过只求不换旗帜,树立半傀儡政权,亦所欣然。淞沪抗日战役之停战协定,长城战役后之何梅协定,那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卖国契约。在东北沦陷,张学良出国之后,蒋介石(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行政院长)同谋共计,先后派遣日本人公认的“和日派”首要何应钦,赴华北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再派蒋介石最亲信的盟兄黄郛,去当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搞出了一个上述的何应钦、梅津协定,满足了日方一时的要求,使华北“特殊化”,国民党势力完全退出华北。黄郛承蒋之命,办好了华北对伪满的通车、通邮工作。

一九三五年冬,汪精卫遇刺受伤出国就医<sup>①</sup>之后,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任命其盟弟张群为外交部长(在辛亥革命沪军都督府时期,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仿桃园三结义,拜为盟兄弟,蒋是老三。其后陈其美被袁世凯遣人暗杀,张群补缺,仍为三兄弟,是为老四)。

张群受命与日本驻京大使川越茂秘密谈判了一个很长时期。蒋介石渴望中日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后以日本条件过苛而无法妥

<sup>①</sup>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受伤,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由上海赴欧洲疗养。

协。西安“双十二”事变时期，汪精卫急遽归国<sup>①</sup>。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回宁后，蒋、汪再度合作，蒋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仍注全力于“反共”。那时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是张群，他是杨永泰死后的政学系主脑，也是以“知日派”闻名的。

## 二、庐山谈话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蒋、汪想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知名之士”，见见面谈谈心，以孤立中共，统一舆论，联名具柬，邀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从七月中旬起，拟分三期举行）。会上，蒋、汪并坐主位，张群任秘书长，曾仲鸣任秘书主任，我和陈方（现在台湾任总统府政务局长）任秘书，无其他组织及形式。发言是随便谈的，出席者当然是国民党人占多数。我大约记得参加的人如下：张君勱、曾琦、胡适、张伯苓、陈立夫、萨孟武、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陶希圣、张肖梅、洪深、叶楚傖、高宗武……。蒋介石讲话，要求团结御侮。汪精卫表面显得情绪有点激昂。只有一位洪深义愤填膺地发言，使我当时为之一惊，现在记忆犹新。他最后说：“希望蒋、汪两先生不要学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口称抗战抗战！却把黄金带向英国去了！”我记得我那次和叶楚傖等从南京同轮赴九江的。七月八号船抵九江，叶楚傖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刚才接到电报，北方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芦沟桥的炮声已经响了。”大家为之愕然。第一次座谈会仍然开会，但是嗅不出一一点战争气息，大人先生们个个都很笃定的样子。本来还想二次三次依期开下去，由于情势日见紧迫，蒋介石只好带着张群狼狈下山，回南京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澎湃，由于非嫡系军人头目，特别

<sup>①</sup> 汪精卫得悉西安事变消息，于十二月二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乘船回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抵上海。



是桂系的主张抗战，更由于害怕中共方面将取得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内外交迫，蒋介石才不得不采取了实际拖战表面抗战的策略，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为了乘机更加扩大个人的战时权力，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式的包揽全国军政大权的统帅部，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张群为秘书长，好像是左丞右相。下设一至六及管理部等七个部。其中第二部是“政略”部，以亲信熊式辉兼部长，周佛海、陈布雷副之。据周佛海向我透露，这个部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问题的。第六部，部长陈立夫。戴笠、徐恩曾，军统中统两头目，分任该部第一、第二两组组长。把特务部门上升为“部”的阶级，这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虽然迫不得已已在“八·一三”搞起了上海抗战，他心里还是和沈阳事变后希望国际联盟出来帮忙一样，希望搞成国际调停的局面。英国驻宁大使许阁森，本来想来尝试调停，不料许阁森坐着汽车往来沪宁公路时，虽然汽车顶上漆上了大幅英国米字旗，日军飞机看着这些汽车有些特殊，怀疑这是蒋介石借用英国国旗来掩护自己在战地巡视的诡计，无情地加以射击，许阁森受伤<sup>①</sup>，调停的工作也不提了。

### 三、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

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员，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周佛海、陈布雷（蒋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陶希圣，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在一九三四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设了一间防空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住在他家里，认为比较安全。来客也较多，胡适之、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陈方、陶希圣、梅思平住在那里。胡适

<sup>①</sup> 八月二十六日，英国大使许阁森爵士乘汽车往上海途中，遭日军飞机扫射，受了重伤。

之曾替周佛海住宅题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熊式辉才警告周佛海，这样传扬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当时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纳粹头子希特勒，为了自己的世界霸权之梦，他倒是真心不想中日两国兵连祸结的，他企图保全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将来好和他一起对付苏联，所以他命令驻宁大使陶德曼，向中日双方进行调停。周佛海等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口号。

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各方主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在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为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到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他当了行政院长）<sup>①</sup>等人，都已同意投降。蒋介石在河南开封附近，正在布置一个圈套，用开会名义捕捉韩复榘。张群首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讲话。蒋介石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他拿着听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的话照例是罗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介石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题不以蒋政权为对手，陶大使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当汉奸后，曾发表一本单行小册叫做《举一个例》，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题的经过，对于陶大使之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

#### 四、高宗武秘密赴日

德国调停虽成过去，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仍然鼓动汪向

<sup>①</sup>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继任行政院长。

蒋进言，和平之门还是不可闭。蒋介石遇事首鼠两端，惯于骑两头马，深中下怀，遂定下密派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赴东京试探和平之阴谋。蒋介石背着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派遣这样一个密使潜赴敌都，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我那时本职是行政院简任秘长，兼任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再兼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长由该室副主任周佛海兼任）。陈布雷命我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个军用证明书，目的在避免出国入境时的检查。我私自填了军用出差证明书给高，随便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因为非军职人员是不能持用的。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六千元（约美金二千元）。陈布雷又命我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须经过中央银行才能寄出外汇，我又只得以军委会办公厅名义，致函中行按月寄款。

高宗武去了两月左右，从东京经香港回汉口，陈布雷又命我妥慎前往机场迎接高宗武，到场，张群也在那里。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着行箱（这样特务不能检查），送他上车。高、张同车前往陈布雷处。高带回日本所提条件内容，我不得而知。蒋介石心切投降，他又害怕中共和人民，同时，大约日方条件过苛，使蒋无法公开接受。

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待命，蒋介石既不叫他再去，也不表示不必再去。周佛海、陶希圣再怂恿汪精卫，密商陈布雷，通知高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费既然未停，就说明高宗武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往，也不算错，就让高再飞香港。过了多天，蒋介石佯问陈布雷，高宗武现在何处？陈说高已再往香港，蒋亦不加可否。

当年七月，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忽然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特派员汇款文件，醋劲大发，居然向蒋提出质问：您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大损纱帽。蒋只好耍无赖。矢

口否认他曾派高外出，孔祥熙悻悻而退。蒋介石盛怒之下，写手条问军需署，得宗武月款是何人经手领去？军需署核实答复。蒋介石又责备我，为何这样小事弄得中央银行的人全知道了？我虽然晓得派高是一件机密事情，我哪里会晓得蒋、孔姨夫之亲，又是堂堂行政院长，怎么会不让他晓得这件事呢？

事后，周佛海和我谈及，当高宗武奉派赴日后，外交部长王宠惠，曾密问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蒋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港患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王宠惠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不敢再问。周佛海说，蒋介石曾一再告诫他，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蒋介石小朝廷这样神秘诡诈的政治，只能说是特务政治也。蒋介石一气之下，同时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费，命高即回汉口，以图掩饰。高宗武因别有怀抱，抗不从命。

高宗武几个月间，因往来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已和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两人均系日本头号特务土肥原贤二大将的部属，以陆军武官名义在华活动），发生了密切联系。高宗武回汉口时，周佛海、陶希圣得知有此路子，就和高密议，万一蒋介石不能投降日本，就循此道路把汪精卫捧起来另搞一套；对日本来说亦极有利，所以高要急回上海、香港，进行新把戏，对蒋即不加理会了。

## 五、汪精卫逃往河内

周佛海、陶希圣极力鼓动汪精卫出来“跳火坑”，勾串汪妻陈璧君来作内应。汪精卫对于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当然也是暗骂中共八路军的。他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有朝一日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

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周、陶旧友梅思平，从汉口奔丧回浙江，丧事完毕到上海，不想再返重庆。梅、高本是温州同乡，往来素密。梅思平、高宗武居然以汪精卫代表名义，和日方特务影佐、今井两人订下秘密协定，决定日方将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他建立反蒋介石反共产党的新政权，而进行中日媾和。其步骤是由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个对中国招降的重要书面声明。汪等设法秘密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到达国外某地，发电响应近卫主张，对日停战投降，进而商谈和平。

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陈大喜过望。据周佛海说，汪精卫在家设宴招待梅思平，为他饯行。走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返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走后，汪、周、陶还有曾仲鸣，忙于乘间设法脱离重庆势力范围，而逃往国外，陈璧君则为这几个人的出走秘密造成条件，便利通行。

当时周佛海的最高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正式部长是汪派的顾孟余，长居香港），陶希圣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周、陶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最后会于昆明。汪精卫也乘蒋介石到湖南南岳开军事会议之际，宣称飞赴各地作抗战讲演，先到成都，后到昆明。汪精卫由重庆飞出的坐机票，是改组派分子、当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替他密购的。特务事先不知道。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sup>①</sup>，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越南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汪精卫南京傀儡政权，推原祸胎，蛛丝马迹，我可以肯

<sup>①</sup> 应为十二月十九日。

定地说，蒋介石为汪精卫铺平了当汉奸的道路。

## 六、文艺研究会——一个暗中散布反共降日毒素的文化团体

一九三八年春，蒋介石、汪精卫退至武汉以后，日寇并未穷追，蒋、汪就想在武汉喘息，苟安一时再说。蒋介石让孔祥熙当行政院长，张群为副院长，魏道明为秘书长。把前几个月划归军委会的第三部（重工业）、第四部（重工业），归还行政院系统，仍以翁文灏任新设的经济部长，吴鼎昌回任实业部长（旋调贵州省政府主席）。表面上说是作长期抗战布置，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孔祥熙的面子要求。连军政、海军两部，也仍归行政院系统，只在军令方面由军委会统率节制。其第二（政略）、第五（宣传）、第六（党务、特务）及管理部名义均撤消，宣传归中宣部，特务分属中统、军统两局，改第一部为军令部，使之成为独立的“参谋本部”。军委会仍设办公厅，以贺耀组为主任，下设秘书、参谋、总务、交际等处及机要室（我当时兼秘书处处长）。

蒋、汪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方面要占上风，扩充地盘及队伍，由周佛海、陶希圣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陶希圣两人平行担任总干事。下面的组织主要成员如次：秘书李厚微（留苏学生，邓文仪系统），总务组主干罗君强（以后李他调，由我兼任秘书），编审组主干陶希圣兼，出版组主干叶溯中（C·C分子）。另外还有两个主干，组名我已忘记，他们是刘炳黎（复兴社分子）和刘百闵（C·C分子）。主要是以付稿费的名义拉拢、津贴、收买一切不同情中共的文化界人士。我现在把记得领过钱的人写出一批：叶青、郑学稼、蒋廷黻、李圣五、梅思平、姚蓬子等。对于当时甘作国民党尾巴的两个小党，由蒋介石密谕每月由会津贴各三千元。“青年党”由左舜生具领，“民社党”由张君勱具领。

该会也出钱支持别人在各地办小报，如上海的樊仲云等。会中出一种艺文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主编人是陶希圣，大约付印过四五种。

周、陶搞出一套口号：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这些口号完全暗中对付中共而发。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说要团结，不要闹党争，不要搞摩擦；表面说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也就是说军事第一，从而引伸到军令要统一。

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林柏生（当时是立法委员）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变相的分支机构，叫做“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同时也给高宗武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会、蔚蓝书店，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我说汪精卫的当傀儡，蒋介石又一次为他铺平了道路。

艺文研究会的经费每月为五万元，是蒋介石下手条命军需署从军事特支费内开支的。十二月汪、周、陶从昆明逃跑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停支该会经费，由我向陈布雷办清交代手续。以后仍利用这笔款，由叶溯中办了一家“独立出版社”，在抗战中出了大批反动书籍，那是后话。

## 七、周佛海、陶希圣其人

现在叙一叙周佛海，陶希圣两人的反动经历。

周佛海原是一个穷苦学生，湖南官费留日。由鹿儿岛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京都帝大学经济。因和杨淑慧恋爱同居，生活费用不足，就投机拚命翻译日文关于社会问题或社会主义的书籍，来适应五四运动后文化市场的要求，粗制滥造，只图糊口。他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连爪哇这个地名都弄错了。

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当〔在〕广州中山大学当教授，每月薪金二百四十毫洋。按规定按累进额纳

费七十多元，杨淑慧认为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缴纳这么多钱作党费太可惜，鼓励周脱党，周终于藉故离党。广州中山大学反戴季陶的风潮一起，周思想右倾，辞职跑来上海，一九二六年再往日本完成大学课程，即回上海教书。同时，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后改为“独立青年社”，似政党非政党，似学会非学会，这样一个团体。先出《孤军》杂志，后出《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十二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益增介绍加入该社过，我同周佛海就是在罗益增房间里开始认识的。因为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编辑，由何介绍当时该所编辑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芳）入社，周、陶、梅之成为好友，从那时开始。

北伐军一九二六年秋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湖北找蒋介石。蒋正在南昌，由行营参谋长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开始嫖妓，染上梅毒，急躲入日人医院治疗。蒋回汉传见周，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和周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即派周为新筹办中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升为少将。我由罗益增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一九二七年武汉开始反蒋后，我请示周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着潮流走好了。五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sup>①</sup>，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到沪即被陈群、杨虎捕押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他是有谅解的，派员迎提到宁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周佛海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获利十余万元。以后又当了一年多的军校政训处少将处长，

<sup>①</sup> 名为《逃出了赤都武汉》。



三年多的总政训处处长、总政训部中将主任，大搞其“反共剿赤”的宣传工作。在国民党一九三一年中委补缺选举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先后当过中央民训部部长，代理过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二年起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近六年，以铁腕来镇压摧残进步师生，几次大规模解散学校。

一九三二年蒋、汪合作后，蒋介石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逃出了赤都武汉》小册子中曾骂汪精卫“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衍敷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周因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亲近，不怕蒋之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的总参谋长。

蒋介石对于周佛海之坚决反共献策最早，印象深刻，好感甚重，所以周佛海当过汉奸被判死刑之后，蒋终藉词减刑，免其一死。周佛海曾和我说过，他是为了研究唯物史观而特意到京都帝大向河上肇博士学马、恩经济学说的，那知愈研究愈出问题；他相信二元论，既要唯心，又要唯物，单纯地主张唯物论，是不对的。

陶希圣原是在北京大学读法科出身，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由周佛海介绍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当政治教官，伪装左倾。一九二七年武汉军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去紧急应变打夏斗寅部的时候，施存统（即施复亮）任该师政治部主任，陶为秘书，后又当军法处长。一九二八年由周佛海拉他当南京军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学生认为他在武汉时曾大杀拥蒋反共的学生，群起攻讦，几被扣押。周佛海让他到上海来共搞《新生命月刊》，旋即往北平教书，参加过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观点反动，主张不定。又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汪失败后，周佛海为他求得陈立夫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后又再往北平教书。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命陶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主编农村复兴

丛书。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和周佛海、高宗武等三人，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一切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陶两人为他大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 八、包接包送的云南王——龙云

汪精卫在重庆决定叛国降日，奔赴国外搞汉奸政权以后，当时外出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便捷，但太冒险；一条是经由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再图北上。这条路比较有可能性，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首先由陈璧君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见了云南王龙云，首先表示同情龙主席的处境（当时蒋系空军已以昆明为根据地，特务也将次渗入）；次谈汪先生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到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先生总是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璧君保证：汪主席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地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陈璧君得了这颗定心丸回到重庆，汪精卫才敢飞到昆明。密商之后，由龙云替他包下一架欧亚航空飞机，启行时龙云亲到机场护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sup>①</sup>，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同机由昆明飞向安南河内，从此走上叛国降日的罪恶道路，万劫不复了！我记得大约一九四〇年或四一年，我们在汪精卫南京颐和路卅四号住宅举行座谈会时，汪曾提及最近已与云南的龙志舟<sup>②</sup>接上了头，他还要派员前来接洽，以

① 应为十二月十九日。

② 龙志舟为龙云的号。

后再无消息。

### 九、日本内阁近卫首相的招降声明

在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所订《上海密约》，由梅思平携往重庆取得汪精卫同意之后，日本方面专等汪精卫飞赴国外的消息，以便及时动作。日本报纸甚至在约定日期数日之前，即已透露近卫首相即将发表重要声明，以引起各方注意。汪精卫行期迟延，近卫托故特往京外一行，宣布声明将稍迟发表，及至汪精卫飞抵河内的电讯一到东京，近卫文麿即行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也就是无形中取消不以蒋政权为对手的说法。不久，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发出《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愿意投降。一唱一和，酿成千古之丑戏。

### 十、汪精卫降日卖国第一炮——《艳电》

汪精卫等五个汉奸到了河内之后，因那儿活动不便，汪精卫带着曾仲鸣留在安南；周佛海、陶希圣急赴香港，进行活动；陈璧君则往来香港、河内之间，以资联络。汪精卫临行前密电陈公博，迅速设法出国相会（陈当时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冒险乘机经重庆赴香港，由港转越<sup>①</sup>，晤汪，参预叛国活动。

陈在河内小住数日，汪以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持往香港，嘱找顾孟馀（曾参加改组派，汪任行政院长时，顾为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中央宣传部长，住香港，看不起蒋介石而不赴渝）、周佛海研究商量后，命林柏生在港发出<sup>②</sup>。顾孟馀看见此项电稿后，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稿绝不能

① 陈公博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成都经昆明抵河内。

② 二十九日（韵日代日为“艳”），汪精卫将他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声明，交由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带往香港。原意是征得在港的顾孟馀同意之后，由林柏生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由于顾孟馀坚决反对而推迟。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一意孤行，终于将《艳电》刊登在三十一日的《南华日报》上。

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先生是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此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即臭名昭著之汪精卫的《艳电》。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馀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 十一、汪记汉奸集团的初步雏形——政委、军委、财委

汪精卫本身是一个大党棍子，到了河内之后，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委、军委和财委三个委员会。政委、军委均由汪自兼主委，财委则由周佛海兼主任委员。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兼委员，周佛海、陈公博同时是军委委员，政委军委都由周佛海兼秘书长，这样看来，三个委员会都在周佛海手里，那时也只有政委在香港九龙约道某号秘密开会，军委人少，开不了会，财委干脆只有一个主委。

当时，凡是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必须先由政委通过，然后才由财会〔委〕发给生活费。我记得军委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叫叶蓬，叶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员不少。以存心抗日罪名被日方攻击失职；又以私恨，准备杀害张群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降日集团。他看见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他自命将才，野心勃发。他亲到河内见汪献策，大搞军事。他希望汪精卫能做孙总理，他敢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策。本来想讨汪精卫的欢心，不料引起周佛海的疑忌。另一个人是杨揆一，留日士官第三期毕业，在武汉行营当过何成濬的参谋长。从未正式带过兵，嗜烟好色，暮气沉沉。以后汪还用他当过军委办公厅主任和参谋总长等要职。

### 十二、所谓首义分子和高干会议

汪精卫当汉奸头目后，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同声提出要

求，他们今后要全心致力“革命”了，无法顾及家庭生活了。汪精卫很聪明地理解到他们在伸手要钱，就提出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八人为“首义分子”。并在第一次有汉奸集团的收入时，即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各五万元，声明以后参加人员，不得援例要求。以后到了上海，政委无形解消，由首义诸人加上一个特务头子丁默村，组织高干会议，汪精卫随时召集开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再后，高、陶逃回蒋方<sup>①</sup>，丁默村、梅思平以人事关系受汪打击，高干会议亦不再举行，有要事由汪、陈、周三人会谈决定算数，我们从背后称之为“三巨头会议”。

### 十三、大资产阶级向汪精卫“献礼”

汪精卫的汉奸运动，在香港由周佛海、陈公博、林柏生搞起来之后，在香港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由钱新之、唐寿民作代表，通过杜月笙把几十万元港币，交由高宗武送给汪精卫，作为“献礼”。他们说汪先生勤劳国事，需款必殷，我们略表微忱，以申敬意，但求严守秘密，以后当再筹献。这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 十四、陈公博以退为进

周、陶鼓动怂恿汪精卫出任傀儡头目的酝酿过程，为了绝对保密，完全没有让汪的老搭档、坐过改组派第二把交椅的陈公博知道，汪到最后才打电报约陈速赴国外见面。陈公博的“首义”头衔是汪钦锡的。陈公博既不能像顾孟馀那样深明顺逆，拒绝当汉奸，又感到自己对“和运”无功，将来即使搞出一个局面，个人难免冷落。徬徨顾虑，左右为难，就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sup>①</sup> 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高宗武、陶希圣由上海逃至香港，从此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

所以他经过河内到香港同意发表《艳电》之后，只在香港出席政委会会议数次，在私人间也不和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来往。汪精卫以后经东京转上海，他始终未参加，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港休养来推托，引得汪精卫当着我们的面，几次骂陈。连一九三九年八月在上海举行的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未曾出席，直到当年冬间，他才来到上海。那时汪精卫派以周佛海为首的代表团，和以影佐少将为首的日本代表团秘密谈判《日支基本关系条约》。为了给陈面子，才又派陈代表汪方和日本海军武官须贺中将，密谈关于海南岛问题，使陈和日本海军发生密切关系。当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陈得兼上海市市长四年多<sup>①</sup>，就是这次会谈为他创造了便利条件。上海是日本海军警备地区，海军当然希望和他们有交情的人来当伪市长。至于陈公博在参加汪伪政权后的活动，容后再叙。

### 十五、谷正鼎游说无效

汪精卫等逃出重庆蒋政权势力范围之后，蒋介石晓得这件事的发展，将对他十分不利，但他除了用开除党籍、口诛笔伐等手段而外，别无其他有效措施。左思右想，还是采取对汪试图妥协的办法，决定派谷氏三兄弟中之最小一个谷正鼎，秘往河内见汪，进行游说（按：蒋介石手下有一个贵州军阀谷正伦，身任南京警备司令兼中央宪兵司令。十来年是一个专业杀害革命烈士的刽子手，因此极得蒋的信任。正伦的两个弟弟正纲、正鼎，原来都是汪精卫改组派的活动分子，列名中委。蒋汪合作，正纲、正鼎同来南京。蒋介石通过大谷，利用封建关系，把二谷、小谷收为走狗。谷正鼎在汪任行政院长、顾孟馀当铁道部长时，当

<sup>①</sup> 傅筱庵，名宗耀，时任伪上海市市长。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日，在上海寓所被其仆人朱升砍死。十一月六日汪伪行政院任命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市长，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止。

过铁道部总务司长)。蒋教谷对汪说，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对于这一引诱，断然加以拒绝了。

## 十六、曾仲鸣代汪丧命

谷正鼎游说失效，返渝复命之后，蒋介石切齿痛恨，大动杀机。戴笠的特务组织，日渐羽毛丰满，几年来暗杀任应岐、吉鸿昌、史量才、王亚樵，绑架刘庐隐等成功后，蒋介石日益相信戴笠的活动能力，付他以暗杀汪精卫的重大任务。戴笠受命布置，从收买法方勤务人员入手。当时汪家尚无武装设备，仅有一个巡警看门。春节后不久，戴笠所遣特务，夜间爬墙潜入汪寓<sup>①</sup>。汪寓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卧室都在楼上，特务连夜窥伺，侦得二楼朝南的一大间，几晚电灯通夜未熄（他们动手之夜倒是电灯熄了），他们就断定此房必为汪之卧室无疑。他们登楼，即向该朝南一间冲进，发现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裤的人急起，准备开灯，他们从形影上也认为是汪精卫本人，枪弹速射数十发，即下楼夺门而逃。其实，这朝南的大间睡的是曾仲鸣夫妇。曾随汪到河内后，曾妻方君璧由香港赶来会晤。汪素性虚伪，以为曾、方夫妇久未团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间让给曾、方同住，结果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也受了伤。

当夜，汪精卫住在隔壁房间，原由一知道武术的山东大汉赵国庆替他在房门口看门，赵闻声立即避入汪室，连房门也来不及下锁，赵躺在楼板上以双足抵房门（头靠着床）。特务如果破门检视，汪精卫决难倖免，也许汪伪政权，在母腹中即告流产。

<sup>①</sup> 时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

## 十七、林柏生敲破脑袋

抗战前汪精卫小集团办了两家报纸，在上海的叫做《中华日报》，在香港的叫做《南华日报》（社长曾仲鸣，副手林柏生，曾死后由林转正）。林柏生自在香港代汪签发《艳电》之后，《南华日报》的汉奸色彩日浓。特务戴笠在河内刺汪得到半成功之后，亲赴香港，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

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用枪声响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来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对准头面砍了两下，林即倒地<sup>①</sup>，凶手亦终被获。林因带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柏生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传说刺林凶手于就逮后，在英国监牢里被另外由军统收买的流氓，作为私人斗殴把他打死了。确否未能证实。

## 十八、汉奸集团的经费来源

汪精卫投身傀儡活动以后，需钱极为迫切，香港几个大资产阶级的“献礼”，只是杯水之济，还不够几个“首义”分子安家费的开支，向日方伸手，成了财委周佛海的中心任务。日本人向来小气，算盘极精，虽然拉你下水当汉奸，却不愿自挖腰包有所破费。影佐等想出一条“妙计”，他们知道，中国对八国联军各国的“庚子赔款”，历年由海关在税收内尽先支付，如有多余，称为“关余”，例存英商汇丰银行（因为总税务司一直是英国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沦于日军后，这笔关余改存日本的正金银行，几

<sup>①</sup> 林柏生在香港被砍破脑袋，时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年来蒋政权无法向其取用，积有相当数额。影佐说，日本政府为了汪氏树立新政权，愿意把关余全部交给给汪所成立的政府，而在政府未成立前，由汪方暂向正金银行按月照实际需要借用，作为记帐，以后由汪政府与正金银行结算。汪方当然如获至宝，立即同意，大约每月由财委向正金借用港币二百万元左右。汉奸中心转移上海后，即改为每月借“法币”二至三百万元。最初是由陈春圃代表周佛海去提款的，以后由杨惺华以财委秘书名义去领钱的。每次由愚园路到虹口取款，还有带枪的便衣日本宪兵押车护送，以免中途被劫。这件事在日方是惠而不费，在汪方则已如鱼之得水矣。

### 十九、汪精卫带领伙伴参拜东京日酋

汪精卫既以傀儡头目自居，一切不能不请日酋面授机宜，因此决定带领伙伴，作一次东京之行。日本军方派一艘山下汽船会社的“北海〔光〕丸”货船，从越南把汪秘密运载赴日，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由另一路赶赴东京取齐<sup>①</sup>。代表日方“欢迎”护送汪精卫的，有日本前内阁总理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及军官数名；为汪等作日语翻译的有周隆庠。汪精卫和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秘密会见一次，其余日汪勾搭之具体初步条件，由周佛海负责和日本陆军省大臣板垣征四郎谈判。

汪精卫方面要求仍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作号召，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继承旧法统<sup>②</sup>，然后进行对日讲和。几经磋商，日方才勉强同意。日本所希望的是双方及早谈好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具体内容，并及时予以签订。人家勾引汉

<sup>①</sup>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晚，汪精卫在影佐、犬养等的保护下，由河内往海防，乘船逃离越南。五月六日抵上海虬江码头，八日登岸。五月三十一日偕周佛海、周隆庠等人飞往东京，向日本首相呈递降表，并谈判成立汪伪政权的条件与办法。

<sup>②</sup> 所谓“旧法统”，系指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法统。下同。

奸培育傀儡，为的是想从条约的文字上和实际的贡献上取得战争中所不能取得的权益，一切形式口号是次要的。影佐祯昭通过近卫文麿，让日本天皇裕仁在大本营举行一次御前会议（影佐新升少将，破例特许列席），确定以汪精卫为对手来搞中日媾和问题，已有的一切南北汉奸组织<sup>①</sup>，均合流于汪伪。

## 二十、胡兰成以汉奸“理论”受上赏

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一向销路不佳，仅靠体育新闻来搞点收入。自当了第一家汉奸报纸之后，香港闻人甚多，是为了看看汉奸消息而看看《南华日报》。《南华日报》有一个小编辑浙江人胡兰成，原在内地当过初中教师，是一名托洛茨基派，逃往香港谋生的。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胡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胡的作品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篇，极为陈璧君所激赏，认为胡兰成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胡兰成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不易维持；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柏生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亦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由于胡兰成非广东籍，广东会馆式的宣传部长容不了他，他终于和林闹翻，林把他的职务驾空，胡遂另与日本驻宁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勾搭。胡大肆批判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宣传部，并写成书面交给池田。池田把这份东西私下拿给宣传部司长黄菩生看，问他真假如何。黄竟向林告密，林哭

<sup>①</sup> 南北汉奸组织，系指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前者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后者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诉于汪，汪大怒，命林处理。林竟命自己搞的那个特务组织“政治局”，把胡秘密禁押起来。我和樊仲云（胡的小同乡）闻讯，认为林柏生做得太过火了，就约同苏成德三人联名致函汪精卫（苏为该政治局局长，特意将他拉入），略谓胡兰成身为中委，如有过失，可予批评，责令反省悔过，不宜遽以非常手段对付，这样将使大家灰心。周佛海、陈公博也说不必因胡的问题而兴起文字狱。汪、林无法僵持，由胡兰成写一悔过书了事。

胡被释后投奔李士群，李约他任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的副社长兼总主笔，胡又秉承李的意旨诋诽周佛海的财经措施。李死<sup>①</sup>后胡再向我接近，我仍假以词色，并予资助。胡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速撤的谋略文章。并设公开讲座，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其时汪精卫已死）。抗日胜利后，胡又逃匿无踪。

## 二十一、上海第一次“干部会议”

汪、周等朝拜东京后，同回上海，日方在江湾体育会路旁边很空旷的地区，找到一所被战火毁坏过的两层楼洋房，略加修理，让汪居住。因为外围都是日军，没有民居，既便保护，又便监视。

七月某日，正是大热天，周佛海派车接我到他住所去（他也住在体育会路的一所旧房子内），约我一同到汪精卫住所开所谓干部会议。我约略看一看，大约四十人左右。我由周带去正式见汪。记得当天到会的人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叶蓬、李士群、丁默村、何炳贤、李圣五、岑德广、赵正平、赵尊岳、傅式说、朱朴、陈春圃、陈昌祖、周隆庠等，其余一些人，

<sup>①</sup> 李士群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被周佛海与日寇合谋毒死。

当时不认识，也就毫无印象了。

开会时，首由汪精卫报告进行“和平运动”的经过，并说今天首次和各位干部见面，以后还要继续商谈。当时无人发言，过了一阵，何炳贤起立致词，大意反对对日投降，认为这事毫无保证，必须慎重考虑。汪当时脸色变得很难看，但未说话，忽然有人提议今天可以散会了，汪点头强作笑容，大家纷纷登车而去。

何炳贤是陈公博两个暗妾何大姑、何三姑之弟兄，留学美国，在陈公博的实业部当过国际贸易局长，原为改组派。这位反对汪精卫当汉奸的先生，仍然当了汪党的中央委员，在汪伪组织成立时即任军委第三厅（军需）厅长，历任经理总监、中储银行监事、南京中央军校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权倾一时。现在香港作“白华”，真是善于以退为进。

## 二十二、特务支配一切——魔窟76号

汪伪政权是由一群野心文人、落伍军阀、失意政客、投机党棍混合拼凑起来的，没有一寸土，没有一个兵。初期所凭藉的惟一实力，就是以日本宪兵为靠山的特务组织，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今梵王渡路）76号<sup>①</sup>，就是它的大本营。76号原为军阀陈调元的旧宅，上海沦陷后，日人用作特务办公场所，如金子机关之类，即设在其中。

一九三八年蒋系中统特务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台湾籍间谍关小姐的关系，在汉口被军委第六部长陈立夫侦知。正在下令捕李，李士群、叶吉卿夫妇俩即利用株萍铁路调查室的身份证，由汉逃港，找得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的线索，由中村转介于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即命李在沪组织汉奸特务，设机关于诸安浜十号<sup>②</sup>，挂的是内河轮船公司的灰色招牌，由日人供给

① 今上海万航渡路四三五号。

② 今上海延安西路六六五号。

武器。李找到吴云甫（即吴士宝），拉些沪西流氓地痞白相人来成立特务行动组织，配合日本宪兵工作。适李之老上司丁默村，因在汉口受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对他吃醋，向蒋介石控诉丁默村贪污招待费用甚多，丁恐查究，即由汉经港逃沪暂住。

李士群因以前在上海丁默村主办小报《社会新闻》时，在丁手下当过八十元一月的编辑，同隶中统系统。李夫妇最初都是中共交通人员，投降国民党中统后，又曾向中共泄露中统上海区长行踪，以致当区长的有死有伤。陈立夫侦知，即将李押解南京拷打录供，关押南京板桥镇十八个月。其领导人丁默村本不知道内情，也被陈立夫传往南京讯问，调了工作。李士群觉得很对不起姓丁的。李士群因其妻叶吉卿献媚中统局长徐恩曾，得以获释，仍派往株萍铁路任上尉特务室主任之职。李士群为了向丁报恩，大向日方吹嘘丁之才能及其经历，欢迎他到自己的巢穴里当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自居副席，日人对此自无不可。汪精卫出来当汉奸后，日方决定让丁、李的特务组织，首先合流于汪。

丁默村原与周佛海为同乡旧友，又曾同在C.C系统，闻周佛海当了“和运总军师”，喜不自胜，即派湖南人翦建午前往香港向周密通款曲。周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政治资本，遂向汪进言，要好好地利用这班人来搞“和运”。汪因过去丁默村主办《社会新闻》，专以共产党及改组派为攻击对象，旧恨颇难冰释，但又无法拒绝。所以汪、周一到上海，经过日人撮合，汪即全盘接收；日人也以这批特务，对汪作为陪嫁的妆奁。我们以后背地里常说它是汪政府的拖油瓶儿子。

汪精卫任命周佛海为中国国民党<sup>①</sup>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李士群为副主任委员，唐惠民为秘书长，马啸天、苏成

<sup>①</sup>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汪精卫汉奸集团，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汪记伪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

德、王天木、戴英夫、汪曼云、顾继武、李志云、茅子明等为委员。另设特工行动领导机构叫做“特工总部”，主要任务是在日军、特别是宪兵的提携和配合下，对蒋帮特务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对中共方面也不会客气的。我因未曾参加76号的组织，对其内部情况，人事方面不太清楚，但知特工总部一成立，即首先成立警卫总队，由吴士宝任总队长，着重保护汉奸的“安全”。另有一个行动总队，由黄埔六期学生林之江为总队长，实际这是一个打手队，专门对外的。

丁、李和蒋帮特务，多系旧识，所以潜伏租界的蒋方特务，除上述诸人外，如万里浪、马啸天、傅胜兰、苏成德、胡均鹤、陈明楚、张瑞京、石林森等军统、中统人员，自投的自投，归降的归降。76号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蒋特转为汪特的重要分子。李士群志得意满，受了日寇上赏之余，我曾见他在一次会议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C.C团”的口号。当时的汪精卫汉奸集团，无政治、无党务，一切活动就是特务。当时人民呼沪西为“歹土”，呼76号为魔窟，特别是杀人如麻的吴士宝，名气在汪精卫、李士群之上。小孩子在母亲怀里哭叫，母亲说：“吴士宝来了”！小孩居然不敢哭了。这是什么一种景象！

汪精卫有了这些特务之后，加紧拉人入伙当汉奸，或者不许人家反对他，其手段不外威逼利诱，杀人示威。特工总部曾发布一张名单，包括上海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司法界人士一百多名，弄得全市震恐。首批惨遭毒手的，我现在记得有上海女中校长吴志騫、租界法院庭长郁华、《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负责人张似旭等，中、军两统的高级干部由汪特弄死的，也有常某、邵某、张小通、戴星炳、陈觉吾、平祖仁等。这些“特殊人物”，求名求利异常积极，所以打手林之江、苏成德、马啸天之类，俱已名列中委，特务经费虽然龙大，日方赏赐虽然频繁，仍然不能满足特务们的贪欲，因而76号以包烟土、包赌、绑票、勒

赎来大量增加收入。最妙的是投机市场的“沪西帮”（以吴士宝作代表），是带了手枪上交易所的，如果他们输了赔了，那就翻脸抵赖，所以他们的买卖是永远有赚无蚀的。至于强买地皮，强占房屋，那更是平常小事了。

一九三九年，汪伪政权尚未成立之前，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地，以及沪杭、沪宁、津浦南段各铁道线，日军已引导汪特分别前往设区、设站，普遍进行活动了。丁默村由李士群迎为老大哥之后，以首脑自居，对李发号施令，李已对他不满，汪、周一来，丁仗周势，对李更不客气。两人为了权利、人事分配、钱财分赃不均等事，时有斗争摩擦。李士群对特工中的实力派拉得很紧，对周佛海也十分恭顺，终于唆使苏成德等发难反丁，说他不配领导特工；周佛海对丁不加支持，丁遂铍羽退出76号，专门去搞变相的特工——“社运”去了。丁离76号后，李士群升任特工总部正主任，丁系人员除被李拉拢收买者外，一律排出特工范围。李士群认为特工是争夺政权的最好武器，首先争得一名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后取得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代行委员长职权）、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长，一连串的有势有权的职位。李在投周反丁得势之余，又想照老路反周拥汪，卒以此招杀身之祸。

### 二十三、汪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既以继承国民政府“法统”，继承国民党“党统”作号召，在来沪后，即加紧准备举行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选极为困难，汪密遣新自欧洲回到香港的周化人（旧改组派），潜赴重庆，去拉改组派或自愿参加“和运”的人员来沪，仅拉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前来。再遣周化人北上拉人，来者更少，就不得不让C·C系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从江浙就地取材，充实数字。适上海C·C系市党部、市区各级的三十六名

委员联名发表宣言，反蒋拥汪，老C.C系就在党务方面又占了优势。

丁默村在周佛海支持下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人选，还想染指南京及皖、浙省市。汪想对此加以抵制。陈璧君让弟弟陈耀祖、陈昌祖，侄陈春圃、陈国琦、陈国丰、陈国强一齐入会；李圣五也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同时塞进来；林柏生发动《南华》、《中华》两报伙计参加。但结果在二百多名大会“代表”中，周、梅、丁关系的人物仍占绝大多数。

大会筹备处由梅思平任秘书长，我也曾向他介绍过几名代表。丁默村为我推荐吴淞中学校长程霓正为代表事，责怪我搅乱了他的人事布置，这是我在汪伪时期不高兴与丁合作原因之一。大会筹备处在大会期间改为秘书处，秘书长仍为梅思平，我及陈春圃、陈允文、张中寰等十人任秘书。开会时，推举汪精卫为主席，主席团为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丁默村、高宗武、杨庶堪、□□□（蒙古人名字忘记了）、陶希圣、陈璧君等。汪本人仅作极简短的报告，即通过各项法规，发表中委名单（系指定，而非选举）。我现在记得的中委部分名单如下：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曾醒（女）、丁默村、李士群、焦莹、刘仰山、金家凤、林柏生、陈春圃、周化人、陈昌祖、陈耀祖、夏奇峰、胡兰成、苏成德、马啸天、杨惺华、金雄白、汪曼云、罗君强、沈尔乔、戴英夫、巫兰溪、马典如、张永福、王敏中、朱朴、林之江、王天木、蔡洪田、任援道、陈群、胡泽吾、叶蓬、杨揆一、张仲寰、章正范、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褚民谊、戴策、周学昌、周隆庠、陈君慧、何炳贤、陈之硕、李文滨、肖叔荃、鲍文樾、陈次溥、溥侗、茅子明、李志云、陈允文、翦建午、恩克巴图、卢英、唐麟、彭年、陈济成、颜加保、傅式说、凌霄、李讴一、樊仲云、李凯臣、李圣五、徐苏中、顾忠琛、奚则文、张克昌、孙鸣岐、黄庆中。



中执委、中监委及候补委员共一百余人，现在仅能忆出上数。其中有小部分是会后陆续发表的，据说当时是为了保密，要人到南京才公开发表。

大会会议中宣读法规草案、人选名单、各方贺电及决议全文，均由我一人包办的，当时还拍了电影一部。

大会修改了党章，废除总裁副总统制度，仍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推荐汪精卫为主席，负责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原已宣布，只许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会毕全部交还秘书处。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文件，刚刚缺一全份，正在惊疑，当选中委的一部分党棍子汪曼云、顾继武等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认为卢英耍流氓，当侦缉员出身，作恶多端，当选中委有损党誉，请予撤销中委名义。主席团即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难题。汪精卫认为卢英在上海首先通电响应《艳电》，率五千党员表示拥护，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特提名中委，以资鼓励。结果派员疏通。此时，梅机关嘱托犬养健，适来找大会秘书长梅思平，云有要事商谈。梅下楼与犬养健谈话后，面有忧容，据说是因为日方看见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选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他们说，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何能派人来此开会？有人说，大会印刷文件，是照以前老样抄的，而且我们还没有承认满洲国，只能如此写法，事实上并无东三省代表到会。我说，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中有此一条，确系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事实确无代表到会，请予谅解，特致歉意。梅思平照我的话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事后发觉这份文件是李士群交给日方晴气中佐的，李亦直认不讳。

汪精卫到沪数月，其惟一据点就是76号特工总部，汪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76号的大礼堂开的。日军把曾经做过常玉清的黄道会会址的愚园路1136弄前蒋政权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拨与汪精卫做“公馆”。这是一所别墅式大花园洋楼，建筑华丽，当年王伯群任大夏大学校长时，为了要娶女生保志宁为妻，特造此新屋来藏娇的。邹韬奋曾拍摄照片，掲載在《生活周刊》上面。

丁默村在接收后，再加装修为汪居住，特工总部再把全弄原住各户，通令一律迁让，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汉奸巢穴。计伪中央党部占屋一厅，梅思平、周佛海、陈春圃各住一所，陶希圣、林柏生、汤良礼合住一所，日兵宪兵特遣小组占一所。我住60号，楼下作为举行会议之用，以后即设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通讯处于该宅。各家房屋围墙上加装铁丝网，汪宅四周设望楼，门窗均装上铁门铁栅，颇有牢狱意味。特工总部警卫第二大队，由大队长张鲁率领，负保卫本弄的全责。弄内岗哨重重，弄口便衣累累。人民经过此地，不免暗中怨骂几声，真是千夫所指的坏处所。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宅隔邻，即为好莱坞大赌场，车水马龙，胜过该弄。金钱赌博，害在倾家，政治赌博，祸至亡国。

## 二十五、我在香港落水当汉奸

一九三八年二月，陈布雷嘱我为高宗武发护照领款项时，再三要求我严守秘密，并说千万不要向高本人提出他不能答复的问题，因此我只能猜得到高的任务，而无法知其活动内容。梅思平突然飞渝，匆匆而去，飞机票也是周佛海嘱我代办的，我当时也不知他们搞些什么。据说他们曾共同誓约，在未到国外之前，决不向人泄露密谋，所以连陈公博也被他们蒙在鼓里。

当年十二月，我被蒋介石下手令说：“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行政院会议仅通过免职，而并未“查办”。我在

汉口认识一位“交际花”孔慧明，后来她要求和我同居，我同意了。同时，在汉数月，经常和张道藩等，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法租界的咖啡馆闲逛，有时有何应钦、陈立夫、陈公博参加，往往在深夜碰着戴笠。以后戴在重庆把这些情况密报蒋介石。蒋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我因有孔慧明问题，而受的处分最重。

周佛海、陶希圣从昆明出国之后，蒋介石严令结束艺文研究会，陈布雷嘱我办理交代。我在半个月内把存在香港的外汇收回，将现金帐表及一切档案全部交给陈布雷，并向陈布雷表示，我将离渝远行。陈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对蒋介石说，罗秘书手续完全办清楚了，他想到昆明去看看家眷。蒋“嗯”了一下。陈对我说，你走好了。但他并未将我的侍从室秘书兼职免去，我就把从前任军委会秘书处处长时特意留存的一张空白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自己的姓名头衔，带在身边，并利用没有缴还的侍从室的特别证章和身份证，通过了重庆机场的特务检查，飞向昆明。又通过了老街的海关查验，脱身出国，经河内、海防而达香港。路遇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约我带着妻儿去到她家玩玩。按址前往，她和老母住在一座半山楼房里。周佛海据说住在九龙，行踪甚秘。

过了几天，樊仲云找到我住的六国饭店，说周佛海通知他陪我去谈谈。我同樊仲云到达九龙约道某号，会见了周佛海。周同我谈及他们搞“和运”的经过，并说要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均无变更，约我加入。我回来经过思考，答应周可以参加。那一次是带着孔慧明同去的，在周处午餐。他说，我们已决定请你暂时屈任政委会秘书，月支生活费四百元。随后他又从袋里摸出港币一千元，并说，你先拿去零用吧。我之落水当汉奸，主要是由于昧于民族大义，因为恨蒋而反蒋，醉心权势，想利用周佛海的关

系，而在政治上大干一阵。重个人而忘了国家，一失足成千古恨。今日向隅而泣，罪有应得，悔之何及！

在港遇到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徐继庄（号子青，浙江人）。我在行营帮过他发行巨额钞票的大忙，而未曾要过他的报酬。他对我甚为感激，交情甚厚，一见我即表示关怀我的行止和生活。我因心脏病在港卧床两月，他每周必来看我，每来必偷偷放些钞票在我抽屉里，几次流泪劝我莫往上海，莫参加汪、周集团，保证我家生活，并保证替我向宋子文介绍工作（当时宋在港搞中国银行及广东银行）。我终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在轮埠码头上挥泪送别。今天反省起来，一个人生活的堕落，必然影响他的思想情绪，可能弄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 二十六、汪党的中央党部

汪记国民党在开过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立即成立中央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陈群、李圣五等。常务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以后改为每两星期一次）。常委会下的常设机构如下：

秘书厅——秘书长褚民谊（出任驻日大使期间，由罗君强兼代），先后任过副秘书长的为陈春圃、罗君强、周学昌、戴策等四人

组织部——部长：1. 梅思平，2. 陈春圃，3. 陈公博（兼），副部长先后为戴英夫、王敏中、刘仰山、巫兰溪等四人。

宣传部——部长：1. 陶希圣，2. 林柏生，副部长先后为樊仲云、朱朴、马典如……等数人。

社会部——部长：1. 丁默村，2. 彭年，副部长先后为彭年、顾继武、翦建午、黄庆中等人。

特务委员会——主委周佛海，副主委李士群、丁默村（此项特

委会人选，并未在常会提出过，所以共有委员若干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党史编纂委员会——主委陈群，副主委李文滨。

海外党务委员会——主委陈春圃（这个单位以后才有，不久又撤销了，它还办过一次华侨党务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陈公博继任中执委主席后，还密设过一次“对共委员会”，主要参加者是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周学昌等，听说秘书长是胡均鹤，其他人事不详。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秘书长由褚民谊兼。

## 二十七、《中华日报》在上海复刊

一九三九年夏，汪精卫在上海公开活动以后，那时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帝国主义所办中西文报纸及倾向重庆的华文报纸，都还不少，如英文《大陆报》、《士林西报》、《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申报》、《新闻报》等都是，日人直接主办的报纸，只有华文《新申报》及日文《大陆新报》各一种，销路都不好。他们利用小流氓，在马路上采用挨户硬派的办法，民众苦之。

汪系原在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抗战后即自动停刊，此时就急于恢复该报，使它成为有力的汉奸报纸。经过疏通运动，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终于同意，让《中华日报》复刊<sup>①</sup>。连同宁沪、沪杭两线各地，总销数不到两万份（《新闻报》每天销六万多份）。该报复刊时，首先刊载了周佛海的《回顾与前瞻》的长文章<sup>②</sup>。这是周佛海卖足气力所写的一篇大讲汉奸“理论”的文字，当时颇有摇惑人心的作用也。由于管理不善，有一

① 《中华日报》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刊行。

② 该文在七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的《中华日报》上连日刊载。

次该报戏剧广告栏内，居然发现了“打倒汪精卫”五个大字。汪气极了，叫了林柏生到面前去，赏了他一记耳光。《中华》、《南华》两家报纸的从业者如郭秀峰、叶雪松、赵慕儒、许锡庆、颜加保、许力球、范镠、梁秀如等人，以后都成为林派搞宣传工作及地方行政的要角了。

## 二十八、昙花一现的肃清委员会

丁默村抓了特务、党务之后，发发野心，想搞部队，勾结日方，怂恿周佛海来弄一个肃清委员会，即在76号内成立机构，周居其名，丁居其实，以丁的亲信彭年任总务处长，任王天木为和平救国军总指挥，这是一个光杆司令。再向江南、苏北地区拉些游杂部队，以何行健（即何天凤）、丁锡三、谢文达、李宗盛等人为第几路第几路司令。这些司令，有的有千把多人，有的只有几百人，分驻各地，各行其是。但周、丁、李这一活动，大家传为大规模的招兵买马，声势不小，惹动了军人出身的叶蓬、杨揆一等的怒火，联名向汪精卫攒纱帽。叶说，曾左彭胡又要复生来治兵了，还要我们军人干甚么？汪精卫觉得苗头不对，恐怕一起头就会闹到散伙，急劝周佛海罢手，周亦趁势收篷。不久何行健被刺，丁锡三、谢文达所部改师，李宗盛部成立一个旅，纳入汪伪军的建制，雄心勃勃的肃清委员会，就以昙花一现告终。

## 二十九、陶希圣、高宗武逃往香港

陶希圣多疑善变，向来出名，这次为汪精卫运筹帷幄，自念功不在周佛海之下，自己仅得一席常委，兼个党的宣传部长，听说周佛海又将掌伪府财经大权，更是因羨生妒。自命一介书生，当个冷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因此向汪精卫有所表示。那知汪已将教育部长许给了当时所谓无党派人士赵正平。陶心怀抱抑郁，恰好重庆中统特务又来勾他、吓他，他感到当汉奸也会当

不出一个名堂来，只好再动别的脑筋吧！

高宗武在伪府成立前，一心要当外交部长。他学生时期，原是有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根本没有国民党的党籍，常委帽子带的也不合适（重庆国民党也居然不翻翻名册，就宣布开除高的“党籍”，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么）。汪精卫因高的年纪才三十挂零，这样年轻资浅的外交部长，摆出来恐不“登样”，拟自兼外长名义，以高为次长，让他代行部务，过了一个时期，再行转正。高宗武觉得卖了这样大的气力，竟然仅能屈任次长，十分愤愤不平。

高、陶当时均在法租界租赁花园洋房住着，平日往来较多，谈话甚是投机，就密商一同返回香港，弃汪投蒋，献些密计，以功折罪。他们终于同船走向香港，到港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大骂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sup>①</sup>。以后陶希圣还在《大公报》写了许多文章，把周佛海攻击得体无完肤，以泄私愤。高宗武不敢回重庆，带着爱妻逃往美国。陶希圣蛰居香港，直到日军攻占香港后，才从九龙步行离港，返回重庆。陈立夫、叶秀峰承蒋介石之命，把陶放在歌乐山的一所房子里，幽居了半年，然后外出活动，终于再得蒋介石的青睐，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大发谬论。在陈布雷自杀后，更作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

陶、高出奔，对汉奸方面当然是一大冲击。汪精卫乃再在自宅召集一次干部会议，特务李士群还在会上建议派人到香港，再去找他们回来。我和陶希圣积有私怨，他离上海前，我因受命筹办南京出刊的《中报》，曾写信给陶，说你当宣传部长我办报，以后只能帮忙，不能捣蛋，如果再象从前那样诬蔑怀疑我，我对你还是不客气的。陶持信哭诉于汪，竟至磕了一个头，周佛海为

<sup>①</sup>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刊登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签订的《中日新关调整要纲》，揭露了汪精卫集团的卖国嘴脸。

此大大责备了我一顿。这次他走了，我想走了正好，我在会上说：“陶希圣反覆无常，人所共知，滚了也好，可免后祸，我代表青年同志反对再找陶希圣回来。”汪精卫连搓两手，嘟着嘴说：“这也是我的不好。”不久即散会了。

### 三十、江湾陆军军官训练团

汪精卫为了要训练汉奸军队的干部，就成立一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地点是借上海江湾日军所建临时营房。汪自兼团长，叶蓬为教育长，郭尔珍为教务处长，黄曦为总务处长，我兼政训处长及该团党务特派员，张诚为总队长，刘培绪为副教育长。前往北京招收所谓“在乡军人”入团，为学员队队员，另招一批中学程度的知识青年入团，为学生队学生。学员队成份不一，有些当过警察或干过其他职业的青年混入其中，是一种速成性质的军官训练；学生队则类似士官式的正规训练，修业期限较长，均以军事操课为主，辅以政治训练，总之是要培养这些年轻人当小汉奸。其入团宣誓书上有：“誓以至诚相信三民主义，拥护汪主席的和平运动”等语，所以这些人也算集体参加了伪国民党。

一九四〇年二月，该团学员队结业。在南京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及政委会会议时期，该项学员集体编为汪精卫的亲卫队，担任内卫（由日本宪兵任围墙外的警戒）。以后只有少数人分配在伪军中当干部，南京各军事机关的内勤人员，安插了不少。约有四十名，由我替他们介绍了工作，大都安插在财政部、中政会、警政部、边疆委员会及首都警察厅等处；没有毕业的学生，则由叶蓬带到武昌，另行组建军分校去了。

叶蓬还从上海卢英手下的伪警中，抽调数百名曾服过兵役而体格较好的警察，编成一个警卫大队，以洪□为大队长，满其蔚为大队副，在军训团附带受训。按原计划本来是准备替汪精卫当卫士队的，后因汪、叶感情不佳，汪认为这批人恐怕政治上靠不



住，仅仅把他们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大队，在南京机关里站站岗，或替“要人”们守守大门，不久又把把这个大队并入以张诚为警卫旅长的部队内。汪本人则由陈璧君替他从广东招来“丰沛”子弟数百名，成立一个卫士大队（后又改为卫士团），以汪精卫一九三五年在南京中央党部院内被刺时，当场开枪打死刺客孙凤鸣的卫士挂连轩当团长。

团里有个日籍教官岩崎大尉，实际是一个联络官。岩崎是影佐的同学，此人跋扈非常，又复贪污成性，团里修房造路，装安电等项，都由他招日商承办，揩油不少。在举行开学的那一天，他坚决不许在室内悬挂青天白日旗，他说这是蒋介石的旗子，我们不能用。我说，这是孙中山的旗帜，既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汪精卫的，只要是孙中山的信徒就可以挂。他才无言而退。岩崎的贪污不法等情况，渐为影佐所闻，撤销他的教官名义，他终于在旅馆羞愧自杀了。

### 三十一、何行健被刺王天木下狱

何行健原来是军统外围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军官，投伪后在浦东当一路的司令。因为他是湖南人，很高兴和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攀同乡关系，汪伪军训团成立时，他还首先要求派遣所部军官来受训，因团方无此计划而作罢。一九三九年的圣诞前夕，76号大宴宾客，许多人酒醉饭饱之余，涌向法仑司夜总会去跳狂欢之舞。天明前舞毕登汽车时，何行健和另一军统分子、投伪仍任特工科长的湖南人陈明楚同被刺客击毙。事后查出此案系王天木的保镖，伙同军统行动人员所干，王之随从已逃匿无踪。按王天木原系军统老特务，与戴笠为干亲家，投伪甚早，得任中委及和救军总指挥。此案发生，李士群、林之江认为王天木嫌疑甚重，遂将王关押起来。王被关年余，由周佛海保释的。周再向陈公博、陈群推荐他当过江苏省镇江专区专员。据说，军统高级特务

陈恭澍在被汪特逮捕降伪后，曾出版过一本叫《蓝衣社内幕》的小册子，其实是王天木在狱代为捉刀的。

### 三十二、南北汉奸的分赃会议——青岛会谈

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北京有个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有个维新政府，日方要把所有关内的汉奸的组织合流于汪精卫，这是不容易的。经过日方的提线和汉奸们的疏通，终于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南北汉奸三巨头会于青岛，举行会谈。当时伪蒙疆自治政府也派了两个代表来参加，一个是李守信，另一人姓名忘记了。和汪精卫同去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和我，我们都住在德国殖民总督所住过的提督楼。会议无任何形式，汪精卫命我把周佛海、影佐他们在上海谈好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内约》宣读一遍，大家表示毫无异议，即行散会，然后在会后私自接洽地盘及人事分配问题。那是名副其实的分赃，大约三天才办好。该项内约内容，我因事后事先均没有机会看到（我一读完，汪即把它放进皮包内），现在回忆到最重要的是承认伪满洲国的一条，其他还有驻兵地点、经济合作、内地杂居等项，印象大约如此。当天早饭后，我正在同张仲寰布置会场，汪精卫忽然走进大厅来，他让张仲寰退去后对着我说：“喂，你看今天报上专电，陶希圣、高宗武这两个家伙，居然把我们和日方商谈的东西都发表了，其实这只是初稿，尚非定稿。”我说：“陶希圣一向鬼鬼祟祟，我一向讨厌他，您和周先生偏偏当他是心腹之人，这次上当不小吧。”汪苦笑而退。

李士群当时由日本梅机关的塚本少佐陪同，他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带了裘公墨〔牧〕等人，在那儿搞特务活动，他是不出面的。

那次日本方面从东京、北京、南京、上海等处，大约来了廿多名，在餐厅吃饭时，日人多于我们的人。我熟识的是影佐少

将、须贺少将、谷萩大佐、晴气中佐、犬养健、伊藤芳男、清水董三等人，其余即使当时通过姓名，马上就忘记了。

### 三十三、“国府”还都筹备委员会

在上述青岛分赃会议之后，汪精卫一回上海，即发表组织一个国府还都筹委会，来准备“还都”事项。该会主委为褚民谊，委员是陈群、任援道、苏成德、罗君强，我还兼任了布置组长。不久，我带了几个助理人员前往南京，点收日方“交还”的中央党部、考试院、财政部、经委会、中央研究院、国货大楼等处。日方代表为“总军”参谋滨田中佐。每交一处，双方签证，还照了相片。已经由伪维新政府使用的房屋，不必由日方点收，日方还要占用的如外交部、铁道部、中央大学等处，则暂不移交。房屋接收后，由我出名宴请日方人员一次。三月下旬还都时，布置组把各机关所需用的木器家具、汽车等分配出去，我眼病甚重，许多事托人代办。该会另有一个总务组，购置一切，发点洋财，那是由褚民谊的亲信戴策负责的。其他还有别的什么组，我都没有搞清楚。

### 三十四、中央政治委员会<sup>①</sup>的把戏

汪精卫是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来共同树立新政权的。一九四〇年三月下旬，即在南京东亚俱乐部（即前国际联欢社），在日军保护下举行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其参加人员如下：

国民党方面：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李圣五、丁默村、褚民谊、缪斌、叶蓬、杨揆一、鲍文樾、肖叔萱；  
临时政府方面：王克敏、朱深、殷同、王揖唐；

<sup>①</sup> 应为“中央政治会议”。

维新政府方面：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任援道；  
 民社党方面：诸青来；  
 青年党方面：赵毓松；  
 无党无派人士：赵正平、赵尊岳、岑德广、杨毓珣；  
 蒙疆政府方面：代表二人（未到）<sup>①</sup>。

会议通过对日媾和，并推举汪精卫为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意思是说，正式主席还是在重庆的林森），授权汪主席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成立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会议秘书长为褚民谊，秘书为陈春圃、罗君强、张仲寰等。

### 三十五、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成立

在开过中央政治会议以后，接着就在原地召开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分为当然委员（国府主席、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委员（国民党人员），延聘委员（其他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三种，姓名如下：

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林柏生、李士群、李圣五、褚民谊、缪斌、叶蓬、杨揆一、鲍文樾、肖叔萱、刘郁芬、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朱深、汪时璟、齐燮元、殷同、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诸青来、赵毓松、杨毓珣、赵正平、赵尊岳、傅式说、岑德广、江亢虎、蒙古代表二人（未到）<sup>②</sup>。

① 参加此项会议的人员，汪伪国民党方面除汪精卫以外，为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伪临时政府方面有齐燮元；伪维新政府方面有高冠吾；国家社会党方面有李祖虞；青年党方面还有张英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为卓特巴扎布、陈玉铭。

② 上列名单中没有王荫泰、汪时璟、杨毓珣三人，另有四人，为焦莹、陈君慧、陈耀祖、高冠吾。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为卓特巴扎布。

秘书长周佛海兼，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从一九四三年第四届起，陈春圃、罗君强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中政会委员任期原定一年，从第四届起，未再改选）。

从一九四四年起，先后任中政会秘书长的有赵尊岳、丁默村、岑德广等，任副秘书长的有郭秀峰。

当时中政委会根据汪精卫的提名，通过了国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各部、会负责人，军委委员长，华北政委长及督办等入选名单，并决定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还都”的国民政府（伪维新政府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江湾成立的，梁鸿志、陈群等一定要坚持举行两周年紀念会，并在鼓楼附近树立纪念碑文才解散，汪精卫只好答应；又因三月二十九日是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不很吉利，所以宁肯让政权中断一天，在三月三十日开张）。

中政会是伪政权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具有对外宣战媾和，通过立法原则及法案，通过特任官以上的任免事项，通过国家预算决算，决定设置或裁撤重要国家机关等项权力。常设一个秘书厅，承主席之命，办理日常工作，并召集开会等。

中政会内部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专委名称及负责人：

- 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梅思平；
- 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 群；
- 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之硕；
- 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揆一；
- 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正平；
- 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君慧；
-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圣五。①

① 各专门委员会除上述外，还有经济专门委员会。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鲍文樾，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焦莹，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徐良，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李祖虞，陈君慧为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专门委员会开会时，只讨论中政会交议事项，或本委员会建议事项。它是不对外的。

中政会原定每星期开会一次，在一九四二年汪伪政府继日本对美英宣战之后，汪精卫利用机会，从中政会中间抽出十多人，成立一个“最高国防委员会”，<sup>①</sup>来代替中政会的职权（美其名曰战时机构），把梁鸿志、江亢虎、赵毓松、诸青来、赵尊岳、赵正平等入，都排除在国防委员会之外。以后中政会每半月至一个月开会一次，只是听听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而已。

国防委员会秘书厅与中政会秘书厅是同一组织。

### 三十六、傀儡班三月三十日开锣

由于梁鸿志占住蒋政权的国民政府房舍不让，就任他作为新设监察院的办公地址，新张之喜的傀儡国民政府，只好设立在鸡鸣寺下戴季陶的旧考试院内。汪精卫在此宣誓就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同时就职的还有下列各院部会长官：

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麟，行政院长汪精卫（兼）、副院长褚民谊（很快即换了周佛海），秘书长陈春圃，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农矿部长赵毓松，宣传部长林柏生，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陆军部<sup>②</sup>长鲍文樾，海军部长汪精卫（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兼），水利委员长杨寿楣，侨务委员长陈济成，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赈务委员长岑德广，立法院长陈公博、副院长缪斌，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兼公务员惩戒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长梁鸿志，审计部长夏

<sup>①</sup> 应为伪“最高国防会议”，成立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是日，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

<sup>②</sup> 应为“军政部”。

奇峰，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兼铨叙部长），考选委员长焦莹，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兼）、副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办公厅主任杨揆一<sup>①</sup>，政治训练部长陈公博（兼），军事训练部长肖叔萱，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兼）。

行政院的机构和人事，曾有很大的变动，最初一次的变动在一九四二年初，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以原工商部长梅思平为实业部长，原农矿部长赵毓松调司法行政部长，原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调教育部长，原教育部长赵正平调国立上海大学校长。交通、铁道两部合并为交通部，调社会部长丁默村为交通部长，原交通部长诸青来调立法院副院长，原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调考试院副院长（原考试副院长江亢虎升任院长，原考试院院长王揖唐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部后改建设部，调侨务委员长陈君慧任部长，海军部长改由任援道担任。一九四四年，任调任江苏省省长，由凌霄继任海军部长。警政部是一九四二年撤销的<sup>②</sup>。外交部长褚民谊调任驻日大使后，由徐良继任外交部长，以后又由李圣五兼任外交部长。陆军部长鲍文樾调参谋总长后，由叶蓬任陆军部长，最后一任的陆军部长是肖叔萱。社会部改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任委员长，后再改社会福利部，仍由丁默村任部长；一九四五年丁调浙江省省长后，由彭年升充部长。司法行政部长赵毓松调考试院铨叙部长后，由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调任司法行政部长（以后由张一鹏、陈恩普、吴颂皋继任）。一九四三年李士群死，内政部长陈群调江苏省省长，实业部长梅思平调内政部长，建设部长陈君慧调实业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调建设部长，一九四四年陈春圃调广东省省长后，由浙江省省长傅式说调建设部长；陈春圃调职后，由周隆庠继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济成一度由侨务委员会调任边疆委员长，后调驻“满

① 杨揆一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伪参谋本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

② 应为一九四一年八月。

洲国”大使。水利、边疆、侨务三个委员会，均设为“局”，水利局隶建设部，边疆局隶内政部，侨务局隶外交部。

一九四四年秋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长等职，陈所遗之立法院长一职，由监察院长梁鸿志调任，立法院副院长仍为诸青来。监察院长由副院长顾忠琛升任，顾忠琛死，由徐苏中继任，副院长为张国元。考试院长江亢虎调国府委员，调江苏省长陈群为考试院长。铨叙部长赵毓松调国府委员，由沈尔乔继任铨叙部长，国府文官长由周隆庠兼任。参军长唐蟒辞职，由卢英继任。

汪伪有一些“国府委员”，我记得有国府委员名义的人如下：

张永福、陈中孚、蔡培、陈济成、罗君强、陈春圃、江亢虎、赵正平、赵毓松、恩克巴图、张英华、张国元、唐蟒、褚民谊、周作人。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在就职典礼并摄影纪念之后，还接受了日本庆贺使团的祝贺，然后是大开筵宴。

### 三十七、日本的庆贺特使团

日本政府为了对傀儡表示荣宠，在伪府成立的一天<sup>①</sup>，特由东京派来一个庆贺的使节团，由曾经当过内阁首相的阿部信行大将率领前来。全团二十多人，文官的领班是外务省条约局长某某太郎<sup>②</sup>，武官的领班就是影佐祯昭少将，真是像煞有介事地热闹了一阵，汪精卫自然是受宠若惊。以后阿部信行大将还担任了驻汪伪的首任大使。一九四〇年冬，我随同周佛海访日时，阿部曾大请客一次。宴后，影佐和周佛海发起组织“阿部同志会”，说每年要在东京、南京集会一次，来纪念阿部大将的“功勋”。我

① 应为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② 应为松本俊一。



也签了一个名，但以后未见这个同志会的音讯了。伪政府成立不久，汪精卫特派一个答礼使节团，由陈公博率领前往日本，作了一次礼仪上的访问，用表“儿皇帝”之谢忱。<sup>①</sup>

### 三十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的“附件”

周佛海和板垣征四郎在东京谈判时，板垣认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不宜再用。板垣说，我们还要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如果前后方用同样旗帜，势必会妨害战事的进行。周佛海坚持此旗非用不可。最后板垣主张在原旗上面再加一小黄色三角，写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和重庆有别，这样目标也不会弄错了。汪方勉强同意。

在汪伪政权成立这一天，南京城里到处挂的这种带有小杏黄旗的“国旗”，实在有点刺目。伪中央党部的人员，那一天在党部屋顶上挂了一面不带“附件”的青天白日党旗，日本宪兵经过看见，驰入党部质问，一定要当场卸下这面党旗。党部职员打电话问我，我急派日语秘书李正兆，前往中央党部和日本宪兵交涉，对他说明：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中日双方协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才有黄色小旗，你们不要误会，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上司再说。日本宪兵这才悻悻而去，并威胁说，如果规定不是这样，我们将对这面旗子开枪射击的。刚刚参加过成立典礼，碰到如此倒霉的交涉，真是气闷之至。这个讨厌的小黄旗，在一年多以后，才交涉取消掉<sup>②</sup>。

### 三十九、陈公博想以政统军

陈公博一九四〇年决定来参加汪伪政权的时候，他对周佛海

<sup>①</sup> 该使节团以陈公博为专使，褚民谊为副使，陈群、林柏生、陈君慧为使节。陈公博等人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离上海去日本，六月四日结束在日本的活动回到南京。

<sup>②</sup> 取消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

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的部长来干。周佛海说军队政治工作是你、我的老本行，你愿意出来主持很好，我推荐罗君强来替你帮忙，他也是很内行的。陈公博回答说，罗很能干，我们大家替他考虑一个独立的职务，让他担任，我看不必以副部长一席使他屈就，我自己不是正式军人出身（陈常常夸耀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在广东革命军中当过上尉参谋），想找两位军官来担任副部长，比较适当。其实陈当时有“以政统军”的野心，不想让我去参加他的秘密。因为他自兼政治训练部长，两个副部长一个是富双英，确是军人；一个是刘仰山，并非军人。以后他办了政工训练班，训练班毕业的人，派不到部队里去，军官们又常常保荐政工人员，弄得他事与愿违，一筹莫展，终于连政治训练部也取消了事。

“还都”之后，汪精卫感觉周佛海权势极隆，不想让他再管军事，由于陈、周名义上是军委副委员长，汪总是对伪军头目说，有事可找公博商量，就是暗示不要去找周佛海。但周是伪府“财神”，军阀们哪有不找他的道理？周与任援道拉得很紧，往返甚密，并搞了一支税警武装。伪军大头目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项致庄、李长江等，都和周很接近，这是汪、陈极伤脑筋的。

#### 四十、褚民谊大遭悔气

日军在进占武汉之后，陆续把蒋介石在长江中沉没的小舰艇打捞起来，汪伪成立前，日本海军决计把这批舰艇交给汪方，作为礼物，希望汪伪成立一个海军部。汪内定以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褚得意忘形，马上叫裁缝制了一套金碧辉煌的海军上将制服试穿，让人品评。事为陈公博、周佛海所闻，连忙去见汪精卫，说老褚自己没有主意，他最好的四大金刚之二周邦俊、王永康，都是上海的大流氓头，如果褚当了海军部长，被坏人利用舰艇走

私，那将是贻人笑柄的。汪说，我只是对他提了一提，并未正式考虑成熟，所以也未曾向你们商谈，老褚如此招摇，不知羞耻，我决不能给他当海军部长，好在对日外交都是事先接洽，就让他去搞外交部吧，海军部长决定暂时由我自兼。陈、周唯唯而退。

汪事后觉得有点对不起亲戚<sup>①</sup>，又经陈璧君进言，就多给了褚民谊一个行政院副院长名义。周佛海因此对褚不满，竟然写信盛气凌人地骂褚，说他不配当副院长。汪精卫无奈，只好让褚民谊辞去副院长兼职，以周佛海接充副院长。褚民谊对亲信发牢骚说，这两个月我悔气极了。

#### 四十一、军事委员会的演变

汪伪的军事委员会，大体是模仿蒋介石式的，六年间有过一些演变，简述如次：

汪自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副委员长。汪死陈继，副委员长只只有周佛海一人，未另补人。

初期设办公厅，另有第一、第二、第三三厅，都是幕僚性质，办公厅主任一直由杨揆一担任<sup>②</sup>。

参谋总长先后由刘郁芬、胡毓坤担任。胡、刘相继死去<sup>③</sup>，就把办公厅等单位撤销，而以杨揆一任参谋总长。杨调湖北省长后，鲍文樾任参谋总长，担任过参谋次长的有张衡〔恒〕、黄自强等人。

初期设立军事训练部，部长肖叔荳；政治训练部部长由陈公博兼，年余后这两部又都撤销了。

① 褚民谊之妻陈舜贞，与陈璧君结为义姐妹。

② 一九四二年八月，“办公厅”改称“总务厅”，伪厅长由黄自强兼任。此后任该项伪职的有张恒等。

③ 刘郁芬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病死，鲍文樾继任伪参谋总长。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胡毓坤继鲍文樾，任伪参谋总长，直至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胡毓坤被判处死刑。

经理总监部是由第三厅演变来的，一直由何炳贤当总监。

陆军、海军两部，既各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又为军委会组成单位。陆军部长先后由鲍文樾、叶蓬担任。海军部长最初由汪精卫自兼，以后汪想要任援道把他的几师“绥靖军”（改了陆军师旅番号）交出，取消任的总司令名义，特意把海军部长让给任作交换条件。那知任当了海军部长，他所统率的陆军部队还是不放手，汪亦无可如何。

军事参议院是一个安插闲散军官的饭桶机关，院长一直由任援道担任，最后才由杨揆一担任了一个短时期。以后汪对任不满，又再弄一个和军事参议院性质相同的参赞武官公署，先后以郝鹏举、郑大章任参赞武官长。这样，真是少将、中将满街走了。

一九四二年李士群所兼的行政院警政部长，连同机关，被周佛海商通影佐，建议汪精卫把它撤销了。李大闹情绪，汪精卫怕李捣乱，过了几个月，又在军委会设置一个类似警政部的调查统计部，让李士群当部长，来敷衍他。马啸天想当该部次长，没有当着，也大发牢骚，汪精卫又在调查统计部内设一个政治警察总署，来安抚马啸天。一九四三年李士群死后，汪急将调查统计部撤销，另设一个“政治部”<sup>①</sup>，既管军队政训，又管特务工作，把调查统计部缩编为“政治保卫局”，由新任部长黄自强来领导。一九四五年，陈公博于军委会取消政治部，特设一个“政治保卫总监部”<sup>②</sup>，自任总监，而以周学昌、丁默村、万里浪为副监，胡均鹤为秘书长。

蒋介石是以变相的鸦片专卖来筹措费用，其收入相当于国家正式预算中军事特别费的四至五倍，他又用各种特别法令来用军法审理禁烟、禁毒案件。蒋曾拟自兼禁烟总监，自觉不妥，就仅设了一个“禁烟总会”，隶属于军委会。陈公博师其故智，一九

① 该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成立。

② 该部于一九四五年二月成立。

四五年从内政部梅思平手里夺得鸦片专卖权后，居然自兼了蒋介石还有点顾虑的“禁烟总监”。

#### 四十二、梅机关与军事顾问部

日本陆军特务大头目土肥原贤二大将（战后在东京国际法庭被绞毙的甲级战犯），在华进行特务活动时，分设了“松”、“竹”、“梅”、“兰”四个机关，各有其工作对象及地区。梅机关长影佐祯昭，因为找到了汪精卫这一伙而特别吃香，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扩大为军事顾问部，首次〔席〕军事最高顾问就是影佐少将，以后继任的是松井久太郎中将、柴山兼四郎中将、矢崎勘什中将、浅海濂少将。我所记得的梅机关人员如次：军事顾问官：川本少将、谷萩少将、冈田少将（兼经济顾问）、滨田大佐、金子大佐、中山大佐、原田少将、渡少将、樱庭少将、原口大佐、福田大佐、晴气中佐、冢本少佐、永田中佐、竹本少佐、寺川中佐、石原大佐。军事顾问辅佐：堀真男少尉（因他派在税警学校当教官，我才认识他）、中岛信一大尉、澁谷少尉、吉冈大尉。嘱托：① 冈田清兄弟两人（有一人忘记名字了）、清水董三、犬养健、伊藤芳男。

军事顾问部对汪伪军各部队及各省市，均派有军事顾问。派在各省市的军事顾问官，必兼该地“联络部”部长及“登”②部队的参谋，三位一体，便于联系。

军事顾问部不仅掌握汪伪方面军事计划方案、法令、规章的拟定，还要注意到汪伪各部队一排一班的驻地。汪伪对日搞了一笔军事贷款，即以贷款购置汪伪军队方面的武器。武器的分配，他们管的很严密，而且常常以废旧品充数。

汪精卫有时到广州、北京、武汉、东京、长春等地方去，军

① 即顾问之意。

② 登部队为日本第十三军的代号。

事最高顾问必定同行。日军赠送汪精卫一架座机（不好修理时可另更换），汪命名“海鹈号”，其机务人员完全是日本军人，也是由军顾部管理的。陈璧君在南京、广州间飞来飞去，日本方面屡表责难，说他们同行人员有利用专机搞鸦片、黄金、军票<sup>①</sup>等的走私行为（周隆庠曾亲自告诉我，他曾替一位好友从广州带日本军票五千元来上海）。可能是日籍飞机师告密的。

### 四十三、经济掠夺与经济顾问部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军事掠夺的手段，所以它在汪伪特设了一个经济顾问部。三任经济最高顾问都是日本政界重要人物：一、石渡庄太郎（曾任日本大藏大臣，归国后任宫内省大臣）；二、青木一男（归国后任大东亚省大臣）；小仓正恒（财阀代表），它在财经有关各部及各省市府，均派有经济顾问。它对于金融、财政、生产、物资、商业统制等项，都抓得很紧，管得很细。他们比那些抗战前英国籍的总税务司，法国籍的总邮务长等“客卿”，还要难弄得更多哩。

我在蚌埠任伪安徽省长时（一九四四年），省府的经济顾问是东京帝大毕业的原田。安徽是日军和抗战后方搞所谓“物资交流”的重点，原田因为搞这种买卖而得到许多奖赏，他才没有和我们多找麻烦。但我要的香烟、火柴、白糖、煤油等等，都要经过顾问的联系和安排，真是头疼之至！一九四五年我和周佛海到了伪上海市政府<sup>②</sup>，经济顾问是一个年已七十多岁的退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周嫌他太老油条化了，就运动把和他要好的军事顾问兼经济顾问的冈田西次少将，调来兼任市府经济顾问，狼狈为奸，事情就好办了。

① 军票是“军用手票”的简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在长江以南占领区使用的一种钞票。

② 一九四五年一月，周佛海兼任伪上海特别市长，罗君强任伪市府秘书长。

#### 四十四、剥削总部——中央储备银行

汪政权成立之后，就着手搞一家“国家银行”，名叫中央储备银行<sup>①</sup>，以示和重庆政权的中央银行有所区别。周佛海原想拉财阀巨头金城银行的“总理”周作民，来负责筹备以至主持其事。周作民出身日本帝国大学，是银行资本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抗战前任中日贸易协进会的中国会长（日本会长是儿玉谦次），和日本关系良好，特别和土肥原贤二的私交甚笃。周作民既为远在重庆的张群通声气、做情报，又和汪精卫、周佛海善意周旋。但他怕暗杀，不敢出来担当中储的重责。他通过日本今井武夫少将，把金城的大连分行的经理钱大槲，介绍给汪、周，作自己的替身。汪、周既无法拒绝，又觉得钱某分量不够，只好请他当一个副总裁，总裁一职就由周佛海自兼。该行的理事会，由周佛海、钱大槲、陈之硕、陈君慧、顾宝衡、张素民、柳汝祥（业务局长）、易次乾（发行局长）、吴企云（调查处长）、杨树屏（稽核处长）、夏宗德（外汇局长）等组成。周为理事长，钱为副理事长。

该行设监事会。监事五人：罗君强、陈春圃、何炳贤、戴鹤庐（以后为俞绍瀛）、邵式军。事先周佛海对我说，我已通知邵式军在第一次开会时，提名你当监事会主席，你不要推辞，你只要“占住茅厕不拉屎”就行了。我一连当了三届中储行的监事会的主席，不知道监事会的办公室是个甚么样儿。一共开过五、六次监事会议，完全靠他们所送来表报，通过他们的一切预算、决算及特别开支，发表货币的发行数字。我对于该行之贪污黑暗，从未调查揭发。据说总裁、副总裁公馆里娘姨们的草纸、肥皂，都是行里庶务科供应的。上海分行是将中国银行在外滩未完全盖好的大厦修好利用的。光是清洁夫一项，人数将近一个连队，岂不骇人听闻？

<sup>①</sup> 伪“中央储备银行”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开业，发行伪钞“中储券”。

该行名义上是借日本中央银行的一万万“自由日元”(即是可以随时换成外汇的老头票)作资金的,泛发伪钞。该行高级人员更利用发放“生产贷款”的机会,打折扣,要暗息,分红利,以一切非法手段营私自肥。某次,钱大榭及其亲信人员贪污了一笔大款,某处长向周佛海告密,周大怒向钱质问,过了不久,钱、周之间搞好了条件,弄了一笔大款,每一局处长各分肥数十万元,从此相安无事。钱大榭还不全部给人现款,拿一部分去开一银行,发股票给各局、处长。以后日寇投降,银行股票又成了废纸了。

该行在苏、浙、皖、沪、宁五省市及九江、汉口、广州等地,遍设分、支行及办事处数十处,人员众多,待遇特优。许多人都找关系,去到该行搞名差事,拿乾薪。

该行发行伪储备票,最初规定在中国只能自印角票,一元以上的要在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刷。周佛海先和他的小舅子杨愷华(财部总务司长)、财部钱币司司长梅哲之三人合股开一印刷厂,承印角票发一笔财。以后日本印刷工厂被炸,钞票由该行设厂自印,并委托颐中烟草公司的印刷厂承印,对工人横加剥削,而领导人及其上级则荷包装满了。

该行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开业,日军方面即通过正金银行开一透支户,每月按他们前后方所需要的现钞,如数向中储借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中国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直到以后日本败象已呈,他们感到手里黄金也会保不住了,才从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用飞机运来六、七吨金砖,作为偿还前项贷款之用。该行又利用这些黄金,发行黄金(期货)兑换卷,作为收买棉纱布的代价。这种黄金兑换卷,又成了投机市场买空卖空的工具,真是害人不浅哩!

中储银行有专设的顾问室,首席顾问是南洋铁道会社搞经济工作出身的木村博士。下设顾问数名。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关于日



方所订政策的实施如何，及中储行的发展是否对日本不利。他们待遇比其他经济顾问好些，有时混水摸鱼。据杨惺华说，木村本人就由周佛海默许在中央信托公司做过大批押款，博取暴利。他们对于中储行的贪污情况，是熟视无睹的。

中储行还有一种“陋规”，是极其混帐的，各局、处长每逢年节及总裁、副总裁的“寿诞”，必送重礼。而这种费用，是在交际费内正式报销的。我亲见钱大榭愚园路公馆里特设的吸烟室内，红木茶几镶上赤金枱面，全套大烟盘烟具、小茶壶、果盆，全是赤金的。钱外出总是穿西装，而在吸烟室里特备几件晨衣式的丝质长袍，吸烟时把全身包裹起来。据钱说，这样躺着既舒适，不会把笔挺的西装弄得不成样子，又可避免毛料衣服吸收着大烟味儿带到外面去。他每次吸完大烟，还要洗洗口、刷刷牙，身上喷点香水才外出。一只大柜上层放着一大套天津泥人张所特制的“春宫”，有时拿出来请客人欣赏。其妾权势极大，每次看京剧，总是包几排最好的座位请客，家里经常大宴宾客。这个女人每天早上起床后，在房间让理发师做头发，一面在小客厅里请有名的演员说一段书，或者唱一段弹词，以资取乐。总之，钱大榭可以说是中储行荒淫无耻的总代表。上行下效，该行的风气可想而知了。

#### 四十五、混乱币制制造混乱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舍不得把“老头票”流向中国，特别发行一种只在战地通用，而不许在本国流通的军用手票，即简称“军票”。币值据说和老头票相等。中储开行后，即“贷借”大批中储券，去支应军需，军需票陆续收回，但并未停止使用。一九四二年以前，重庆政权发行的旧法币，仍在上海一带流通，被汪政权在一九四二年限制收兑一次（两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凭空使老百姓造成一次损失。像特务头子李士群，以江苏省长名

义，打电报说限期太促，周佛海只好答应他个人延期一星期收兑。李即派特务到各公司、商家，以一对二勒收。门市进帐的旧法币，积成三千万元之数，以旧换新，净赚了一千五百万元，这是特例。中储行再把收来的旧币，交给日人，带到蒋管区去收买物资，还是一块作一块用的。汪伪末期，币值日落，重庆的旧法币关金券，又成了走私投机的对象，有些人甚至把关金券塞在肛门里，通过检查，带到宁沪一带，来博取微利，这是何等惨酷的现象。

伪维新政府时期，在日本支持下设过一家华兴银行，发行过一种华新券。该行董事长是梁鸿志，总裁是日人鹭尾。中储行成立后，华兴银行并不取消华兴券，也不收回，又不作为通货，只是每天挂牌和军票比价多少，和中储券比价多少，成了银钱业投机倒把的商品。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

华北临时政府时期，开了一家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叫“联银券”。联银券是和日军的军票等价交换的。汪伪时期，联银照旧存在，联银券仍在华北范围（当时是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北京、天津、青岛等省市，汪伪末期，河南省才划分到南京方面管辖）。

中储券和日本军票的比价，是五块五角左右（有时偶然有极小的上落），与联银券的比价，和军票相同。周佛海告诉我，财政部有一笔“国税”收入存在联银，预决算都是一块抵一块，没有差价的。凡是中储行批准寄到华北的汇款，这里付中储券，那边照数取联银券。南京的官吏确实有家在华北，可以请求这种汇款，但数目是要经过批准的。

在日寇投降后，发现一大批存在乡间的密室里的崭新的中储券，这是日本宪兵队购买物资的剩余的款项。经过核对，券上号码根本和中储发行的不一样，可见日军自印的中储券为数恐亦不少。

在一个汪伪政权的范围内，同时公开流通的钞票，计有日本老头票、日本军票、联银券、中储券、华兴券五种，币值又不是相等，流通的区域又有人为的限制；不公开而实际存在的钞票，则有老法币和关金券两种。如此混乱复杂的币制，在金融方面，起了大大的扰乱作用。

前已述及一九四二年汪伪政府以中储券一对二勒收了重庆法币，人民的损失重大。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重庆政权回到东南之后，行政院长宋子文又将中储券作二百对一，用老法币兑换，逾期作废，这样造成人民的损失，更是惊人的。据周佛海计算，他说如果以中储所交出的黄金、白银、美钞及自由日元的当时价值而论，中储券七八十元换一元老法币是正确的。即令如此换法，人民的损失还是大得可怕。蒋、汪两方以混乱的币制来置人民于绝境，真是“厥罪惟均”了。

#### 四十六、同床异梦的华北政委会

汪伪政权成立，华北临时政府讨价还价，王克敏和他的一伙，是打赢了这一回合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很久才取消，伪华北治安军则始终是带五色帽章。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只把原来的“部”改为总署，其机构及人事如下：王克敏先后当两次委员长，王揖唐当一任，朱深死在任上<sup>①</sup>，王荫泰是最后一名委员长<sup>②</sup>。内务总署督办朱深，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经济总署督办殷同，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由齐燮元兼。从这张名单来看，一个普通内阁应有的组织，大约只缺外交、司法两门了。政委会的督办，由南京的中政会通过任命，委员长是选任官，与五院院长

① 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朱深继王揖唐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七月病死，由王克敏继任该职。

②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王荫泰继王克敏，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同级，其余官吏均由政委会自由任命。中储券不许流通到华北各省市，两方的物资，因为彼此有细如牛毛的商业统制法令，等于不能交流，甚至报纸亦不能互相邮寄。南京有一个中央电讯社，北京也另有一家官办通讯社。南京有一个行政院宣传部，华北也有一个宣传局，对峙的形势十分显然。

#### 四十七、依样葫芦的全国经济委员会

蒋介石曾经搞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实际是宋子文想要把持美国棉麦借款才成立的），汪精卫也来画一个依样的葫芦。全经会直属“国府”，汪自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分兼副委员长。委员名额甚多，许多省、市的厅长、局长，下台没事干的，照例给他一个委员名义。李士群死后，他的老婆叶吉卿感到出入车站不方便，请求汪精卫给他一官半职，汪即发表她为全经会委员。她有了这张简任职官证，出入火车站时就可以不和老百姓走同一轧票口，而且可以受到交通部驻站招待员的接待。

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秘书处、公路处、调查处及若干委员会，前后任秘书长的是陈君慧和邹竞〔敬〕芳。实在无事可干，就把经济顾问部的招待事宜交给该会去办。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着急地要搞占领区的农业生产，来做长期掠夺的打算，就在全经会里增设一个农业实验处，由邹竞〔敬〕芳兼处长，日方派那须皓博士来主持技术工作，在苏浙皖三省拣几处农业最丰富的县，来作农业改进实验县。当我正要交卸安徽省长职务的时候，他们选定了安徽的当涂县作为实验县，我除了招待过一次那须皓博士外，只把委任状印信转交给原任县长张回朗，就离开了。大约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 四十八、特工的公开机构——警政部

汪伪政权在上海筹备时期，特工权力高于一切。特工人员中

财迷、官迷甚多，很想搞个公开名义的机关，大家来做做官。在这一要求下，就决定在行政院下面设一警政部。为了避免丁、李之争，由特务委员会主委周佛海兼部长，李士群为政务次长，邓祖禹为常务次长，杨树屏为秘书主任，苏成德为政治警察署长，杨杰为特种警察署长，陈光中为总务司长，石林森、余朴都是司长，全部人员百分之九十是特工出身的。各省警务处也归其指导监督，这样就便于把特工人员插入到普通民政警察里去，而特委会特工总部及各地的特工区、站，依然原封不动地不公开地存在着。吴士宝也当了警政部的高级专员。到了一九四一年，周佛海接受了我的劝告，辞去警政部长兼职，推荐李士群升任部长。<sup>①</sup>但向汪精卫保荐亲信杨树屏（周之旧部属），汪已同意，李士群又暗中唆使苏成德写信给汪，反对杨树屏任次长，迫使汪精卫把已经提向行政院会议的任命案撤回，周只得另派杨以他职，但以苏成德亦不得升任次长为条件。周、李交恶，这是一个重大的起因。不久，李士群在日寇支持下包揽“清乡”，从而夺得江苏省的地盘（原任省府主席高冠吾调安徽省），权势盛极一时，周佛海就找影佐少将，密商对李稍加抑制的办法，结果不征求李的同意，即进言汪精卫把警政部撤销了。

#### 四十九、“清乡委员会”与“清乡”

一九四〇年秋初，驻在上海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军（即“登”部队），通过军顾部向汪伪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汪伪配合日军，把一些出产丰富的地区“治安”搞得更好一些，目的在肃清各地区内的敌对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势力，以利于日军的经济榨取。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商谈，周再向几个好友吸收意见。梅思平主张从南京附近几个县试办一年，并推荐我来主办此事，

<sup>①</sup>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由于周佛海与李士群争夺权力的矛盾，周佛海辞去伪警政部长兼职，李士群继任伪警政部长。

说我有地方行政经验而又懂点军事的。我说“肃清”两个字很刺眼，中国历史上把这类工作叫做“清乡”，不如用“清乡”这个老名词为妥。

周、陈向汪复命，主张办“清乡”，并推荐我为“清乡督办”，设署办公。汪精卫即找我见面，并把我带到楼上一房间，室内尽是装满档案的大木柜，他打开一个柜门，取出一份日文《肃清方案》及译件，对我说，这是一份极其机密的文件，请你马上阅看。在我看完文件后，汪引我到客室对我说，“清乡”的事，佛海兄向你说过了吗？我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过了几天，影佐少将向汪方提出，“肃清”改为“清乡”很好，这是一件重大工作，必须设置一个较大的委员会，请汪阁下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周两阁下兼任副委员长，各有关部、会长官兼任委员；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一位秘书长代行会务；我们日本军将把第一期“清乡”的江苏数县包围起来，清乡委员会即在此范围内工作；需要政治与军事齐头并进，特工力量尤应全部利用。所以委员兼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长一席，似以由李士群阁下担任为适宜。原来李士群和梅机关的暗气中佐，已经密商搞好了整个一套东西，只是请影佐端出来给汪方而已。汪精卫无可异议，陈、周目瞪口呆，而无可如何，清乡委员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起来。我亦委员之一，除参加第一次的成立会外，未再预闻其事。

李士群利用这个机会，他也来“挟天子以令诸侯”。清乡委员会组织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几乎象一个政府。苏州办事处是分组办事的，同时还设了党务办事处，处长也是李士群兼任。其工作单位如次：参谋团主任唐生明，封锁管理处团长张北生，田赋管理处处长谢某，税务查缉处处长谢某，清乡专员张北生。此外还有经济、文化、教育、社运、宣传等委员会，把中委或部长级的人员拉去当主任委员，如陈君慧、彭年、冯节、戴英夫等都是。其第一期清乡县份是无锡、江阴、常熟等县，伪军任援道部

有两个师参加；清乡警察总队二千多人，总队长宗志强；和平义勇总队五百余人，总队长马啸天；税警第一、第二两个支队，也被拉去协助“清乡”，特工方面还为了江苏的“清乡”，而设一个“特工江苏实验区”，以胡均鹤任区长。最凶狠残酷的是“谍报队”，由每十个日本宪兵和十个特工人员编成一组，深入乡村，有就地杀人之特权。梅机关为了支持“清乡工作”，还派了廿多个青年人员到苏州“帮忙”，结果和特工人员摩擦很多，意见不一致，工作无法进行，不久即被召回去了。

“清乡”是分期分区来搞的。江苏搞了起来之后，李士群又以清委会名义，设一办事处于嘉兴，来办嘉兴、嘉善两县的“清乡”。清委会副秘书长汪曼云任办事处长，这又引起了浙江省长傅式说的争执，结果浙江也设了清乡分会，由傅式说负责举办“清乡”。一九四三年上海也设了清乡分会<sup>①</sup>，由陈公博兼主委，在南汇、奉贤、申江（即上海）三县办“清乡”。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浙江省余姚县办“清乡”，这是由驻在宁波的浙东行政长官沈尔乔主办的。安徽省开办最迟，指定“清乡”地区为芜湖、当涂两县，我将离任才开始进行，那已在一九四五年初了。

“清乡”即实行严格的“人”与“物”的管理与统制，先用查户口，办保甲等办法，把这个包围圈里的居民登记组织起来，发“良民证”，然后用竹杆等物围成“封锁线”，在封锁线上设“检问所”，检查居民与物资的出入；并把封锁线内的敌对分子或赶、或杀、或关，使线内个个都是“顺民”。圈内的一切物资，当然由日军予取予求，不会碰到阻碍了。当时江南民间有一句话“清乡就是清箱”。伪江苏省监察使陈则民把这句话转告给汪精卫，汪告知李士群，李大怒，声言要杀死造谣惑众破坏“清乡”的陈则民，使陈某在李士群未死以前，吓得不敢回苏州家里去住。

清乡委员会还在苏州办过“清乡干部学校”，第一任教育长

<sup>①</sup> 应为一九四二年八月。

是傅也文，第二任是汪曼云。一九四三年九月李士群死，清乡委员会立即撤销<sup>①</sup>，仅于行政院下面设一幕僚性的“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各省市政府各设一小规模的清乡事务局。这时“清乡”已成尾声，只有一个张北生，以苏北行营参谋长而兼南通区清乡专员，作风不改当年，人民受其祸害。

“清乡”期间，李士群怂恿汪精卫在金华设置所谓苏浙皖赣四省边区行营，想在那儿招兵买马来打天下，以特务傅也文为书记长，罗子实为参谋长，陈恭澍为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毫无所成。

“清乡”期间，李士群在梅机关操纵下，还设了一个东南贸易公司，也是对后方来搞物资交流的。董事长汪曼云，总经理尤菊荪，实际是由梅机关的中岛信一大尉在那儿作主的。

### 五十、褚民谊也包办中日文化协会

蒋、汪合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期，褚民谊当秘书长。这位唱昆曲、打太极拳、踢毽子、赶马车的专家，花了一大笔公款，在香铺营盖了一所公谊联欢社。一九四〇年，褚民谊当了汪伪外交部长，发起成立中日文化协会，日方自然乐于赞同，褚就利用公谊联欢社旧址来作会所。那儿常开展览会，日人拿油画、木刻等来展览，总是向汪方“要人”推销作品，一幅总要军票几百元，简直成了我的负担。

该会把汪伪大官分派了常务理事、理事等职，褚自任理事长，搞过几次中日双方的座谈会，讲的都是门面话，最多的则是在大礼堂演戏，褚民谊、丁默村和彭年的老婆池某，周佛海女儿慧海等，也在那儿粉墨登场。有时日本有要客来，该会也举行宴会招待。例如南京大屠杀的总刽子手、日军第一任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伪装和尚姿态来华访问，以及大谷光瑞到南京时，该会

<sup>①</sup> 撤销时间是在李士群死前的五月二十日。



都曾设宴欢迎。该会曾出过《译丛》杂志数期，是褚民谊委托张资平主编的。褚民谊还建了一个小京戏班子。褚出任伪驻日大使时，带班前往东京，宴会迎宾作乐。这一个协会，好像就是褚的私产，我为理事之一，对于该会是否收纳个人会员，尚不知也。中日文化协会中国的会长是汪精卫，日本名誉会长是阿部信行大将。

### 五十一、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及分会

一九四〇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函汪精卫，说是东京方面已由石原莞尔中将(日中少壮军人的领袖之一)，发起组织了“东亚联盟本部”，希望中国方面也能成立相应的团体，以便共同致力于东亚和平事业。汪精卫即据以召开一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成立大会<sup>①</sup>，在会上宣布了理监事一百多人的名单，都是“中央委员”或“部长”级以上的人员(我是理事之一)。成立一个秘书处，进行日常会务，秘书长周佛海兼，副秘书长周学昌、周隆庠。我们戏呼该处为“周家祠堂”，实际佛海、隆庠都从不过问会务，一切都是周学昌包办。学昌还利用这一团体向日方勾结，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在该会成立不久，日本有几位参加东亚联盟的众议员组织团体，来南京访问，我在《申报》上发表《欢迎日本众议院来华诸君》一文，把该联盟的四大纲领：政治独立、经济提携、文化交流、军事同盟等项，加以吹捧。

东亚联盟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设有分会，南京分会负责人周学昌，上海是陈孚木(后改刘仰山)，武汉是黄大中，广州是林汝珩。周学昌最起劲，他还出名主编《新动向》旬刊，作为分会机关刊物。经常有一个小矮子日本人叫木村的向他联系，他到日本访问想直接找上石原的关系，不料东条英机上台当了首相

<sup>①</sup> 该会成立时间为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

之后，他和石原是老对头，就把东亚联盟并入他自己搞的“大政翼赞会”之内，最后且把石原中将软禁起来。周学昌见风转舵，急投东条，东条亦予以接待。有一名日本老特务辻政信大佐，抗战前曾到中国西北各省窥探，陈立夫命周学昌（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陪辻大佐往新疆一行，两人有了交情。辻大佐原是石原“忠实”信徒，至此乃转向东条，东条派他来南京任日军总部中国课课长，周、辻得叙旧谊，甚为相投。周当南京市市长，公馆派对他很不满，某次汪精卫内定将以周隆庠掌南京市，周求救于辻大佐，辻竟运动日方当局，不同意更换南京市市长，使周学昌能够干到日寇投降时为止。

自从东条把日本的东亚联盟解销之后，中国的“东联”已成无主游魂，毫无活动，仅为周学昌的一个个人工具而已。

## 五十二、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与共和党

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派在中国的一个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他虽然只是一个副领事的地位，其活动力是颇大的。他在上海设有“岩井公馆”。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号召联合各党各派树立新政权，岩井忽发野心，想组一个新党来分一杯羹。他搞的是一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抓的两个头儿，一个叫陈孚木，一个叫做袁殊。

陈孚木，广东人，国民党的一个小政客，以前依附陈铭枢。陈铭枢当蒋方交通部长时，陈孚木任招商轮船局总办，贪污了几十万元，被蒋介石通缉，逃往英国住了几年，讨了一个英国老婆回来，不能回重庆，就来当汉奸。

袁殊即袁学易、袁霄逸，化名严军光。湖北人。青年时期参加过中共，以牛兰案牵进，在汉口被捕，后得释放，来上海当新闻记者。抗战中拉上了日本关系，一九三九年76号把他当作军统人员逮捕，丁默村要杀他，李士群要放他，结果临时把他移押苏

州<sup>①</sup>。有一天，影佐拿几篇文章如兴亚建国运动宣言等给周佛海看，周说，这人是一个人才。影佐说，人才可惜被你们关在牢里。周问是谁，影佐说严军光，就是袁殊。周大笑，即予保释。袁殊即和陈孚木把兴建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大干起来。

汪精卫认为各党各派，以重庆原有的老党老派为限，另组新党，是不能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的，岩井的阴谋落了空。袁殊是会搞点宣传文字的，就在他办的《兴建月刊》上批判汪伪政府，特别对宣传部的攻击。汪大怒，力向日方交涉，仅以收回已发的月刊作答复。袁殊在该组织内设过青年训练班，以后这些人出路困难，袁除了自行设法安插外，通过岩井找上上海警察局特高处长日人五岛茂少佐，位置一些在警局内。经过长期的交涉，日方同意把兴建本部解销，但以袁殊、陈孚木两人担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为交换条件。

袁殊是非常活动的分子，他和李士群、周佛海和我，都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有过一些帮助，岩井英一是他介绍我认识的。一九四四年岩井调赴广州的时候，殷殷以袁殊相托，袁殊在三个江苏省长任内，一直连任教育厅长，一九四五年他感到苏州联络部长金子大佐对他的压力时，他情愿到上海市府当一名挂名参事，还在我的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文化问题研究所》。袁殊所办《新中国报》（日刊），我看比《中华日报》要办得好些。

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一九三九年从北京、天津找来一批汉奸来做地方工作。他们的组织名称沿用“共和党”三字，以示与国民党对抗之意。他们有所谓武汉参议会，好象是一个立法机关，议长石星川，湖北省长何佩瑒，汉口市长张仁蠡。驻汉的日本军叫做“吕”部队。汪伪初期，他们还是支持石星川等干下去，态度比华北的日军还要强硬，叶蓬一度前往湖北，想搞点军事，无

<sup>①</sup> 据袁殊同志谈，他一直被关押在上海“76号”，后经岩井保释。

功而还。经过长期的交涉，日方才答应把“共和党”和武汉参议会府取销，但须保留何、张的省、市长地位，接受汪方任命，并以石星川、何佩瑢担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为交换条件。不久何佩瑢又被日方毒毙，汪方即乘机派杨揆一去当湖北省长<sup>①</sup>；藉口减少行政经费，将汉口市由特别市改为省属市，张仁鑫也就见机而去了<sup>②</sup>。

### 五十三、新民会、大民会、安清总会、洪门协会

日军侵华战争发动之初，反共反蒋是他们的口号，但在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伪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日本人又在华北搞出一个“新民会”<sup>③</sup>来。此会由华北政府首脑为会长，由日本的安藤（纪三郎）中将来任指导部长，有专职的副会长，先后为缪斌及张燕卿。它的全国协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政府负责人还要向它作工作报告，协议会出席人员，对于“政府”施政报告，还可以加以批评或质询。这个会似政党非政党，似议会非议会，有点莫明其妙。但由于有了它，华北方面总不让汪记国民党的组织在那边发展，汪精卫多次交涉，想把新民会并入国民党，迄未实现。以后王荫泰、陈公博互相唱和“华北中央化”，终未能把“新民会”取销。

北方有了“新民会”之后，在伪维新政府时期，南京方面也搞出一个类似的“大民会”来，出面的人是一个叫做高朔的。一九四〇年高朔病死，温宗尧与夏奇峰一度争夺领导地位，由于某日本中将（该会顾问）支持，夏奇峰得为该会负责人。实际该会既无事做，又无群众，汪方就与日方交涉，将该会解销，依例以

- 
- ① 何佩瑢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死去，六月二十八日，汪伪国民政府任命杨揆一为伪湖北省主席。
- ②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伪行政院改汉口特别市为普通市，以石星川为市长，张仁鑫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市长。
- ③ 该会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夏奇峰担任汪党中央委员为交换条件。夏奇峰曾为上海报纸驻欧洲通讯记者，回国后加入青帮团体，为所谓“仁社”弟兄之一，所以能在流氓组织里混混。

“安清道义总会”，是日本人搞出来的青门组织，汉奸的社会部也予以立案的。他的三个总负责人是张英华（北洋政府里当过总长）、张德钦（留英学生，上海律师，汪伪浙江省财政厅长，青门“大”字辈的冒充者）、常玉清（满族，上海流氓头，曾在日本人支持下搞黄道会）。

洪门协会是丁默村和日本特务搞出来的洪帮组织。洪帮本来是一些亡命之徒的秘密结社。这样大张旗鼓一来，就完全失去他们原来搞秘密团体的意义。丁默村原来想拉徐朗西出来主持，徐不从，结果弄出李芳（湖北人，曾任驻苏联的领事）、陈亚夫等来当常委，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

汪伪特务对青、洪两帮，也都是想把持利用。李士群拜过季云卿做老头子，吴士宝收徒数千。洪门方面，汪特在南京中央饭店利用江正卿的关系，自立山门，称为“乾坤正气山”。李士群当山主，马啸天是副山主。

特工中知识分子，也有拜老头子的风气，例如汪曼云是杜月笙的门生，戴英夫是杨虎的徒弟，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 五十四、陈璧君坐镇广州

广东是汪精卫的家乡，广州是国民党人常常搞西南独立政权的据点，汪精卫是十分重视它，把它当作“禁脔”的。汪伪初期，广东还有一个日军所支持的地方政权，有一个称总司令的彭东原，下有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是独立性质的。汪方通过影佐，终于把彭东原的政府解销了。成立一个广东省政府，命陈公博兼省府主席（陈当时是南京的立法院长），无非利用陈公博这个名字多少为广东所知道，想藉此号召号召。汪精卫另以中政

会主席名义写一“手谕”（并未报告会议），派陈委员璧君<sup>①</sup>指导西南党政军事宜。陈璧君就持此坐镇广州（每两个月在广州，两个月在南京），成了伪广东省政府的太上皇。

陈公博对此兼职主席，十分不感兴趣，适逢不久傅筱庵被军统杀死，他就兼任了“美缺”上海市长。陈公博走后，陈璧君推荐她的弟弟陈耀祖当广东省主席，她就可以实行指导省政了。所有广州省一级的官吏，经常被召到陈委员公馆去考询工作，面授机宜。“中央”派到广东的财务或其它人员，也要先征求陈委员的同意。

当时要替汪、陈修一所公馆，适逢广州木料奇缺，似乎省府就征发了许多副做棺材的木头来派用场，闹成了大笑柄。我记得国民党苏州法院对陈璧君的起诉书，曾经指明她亲自指导汪特华南特工区长廖公劭工作，可见陈委员是无所不管的。

汪精卫于一九四四年在日本名古屋医院病情恶化之际，陈耀祖在广州被军统特务暗杀了<sup>②</sup>。陈公博、周佛海打电报给在日本的陈璧君，认为此事不宜再去刺激病危的人，请提继任人选，陈璧君即复电，以其侄陈春圃调粤继任省长。后来汪精卫病死，陈春圃坚决不肯再干，陈璧君又推荐其妹夫褚民谊去当省长<sup>③</sup>，迄日降时为止。

一九四五年春，我在上海市府，陈璧君在她福履理路新公馆里，等天好后飞广州，打电话约我谈话。我去了，她对我说，我看上海市上所画“汪先生”的照片，像个小白脸，这很不好，我拿一幅比较像他的照片给你，希望你们照这个画。我答应照办。她还送了一本秘电本给我，约我以后通电。她最后说：“我现在回广州去看看，让公博、佛海在这边干干，如果三个月后他们干

① 陈璧君时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② 陈耀祖死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

③ 陈春圃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任伪广东省省长，翌年四月二十六日由褚民谊继任。

得不好，我再回来‘革命’。”我一时几乎不知所对，我只好说，想必他们会干得很好的，赶快辞出。

### 五十五、汪伪与国内资产阶级

汪伪政权是只能够代表国内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傀儡登台之后，就向日军收回了大批在战争中所占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轻工业工厂，通过初期的工商部和以后的实业部，发还给原主。当然，经营部门是有油可揩的。还特许设置某些公司，例如华中盐业公司、裕华盐业公司、华中蚕丝公司等，来垄断某些生活物资，以攫取非常的暴利。同时，向复业的棉纺棉布、面粉、火柴、香烟等企业，征收重税，进行剥削。特别是在香港沦陷之后，一些大资产阶级被日人逼来上海，汪伪尽力把这批人拉入伪政权，或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予以网罗；或在中央储备银行特设一个参事会来安插；或者请他们当上海市府的谘询委员，说成是“人民代表”。关于所谓商业统制的工作，也是利用这些人来搞。汪伪在各省、各县，地主武装如保安队、自卫队等遍地都是，地主恶霸充当县长、警察局长、区长，保安队副、大队长的，占大多数。财政、实业等部滥发牌照，使交易所营业蒸蒸日上，钱庄银行如雨后春笋似的乱开，投机倒把，扰乱市场，无论是城市居民或乡村农民，都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绝境。

### 五十六、没有母亲先有儿子的武汉军分校

怀有“雄心壮志”而投伪的叶蓬，一到上海就和汪精卫、周佛海等情感上有了问题。他所办江湾军训团结业之后，只是解决了学员队的问题，学生队尚未满期，叶蓬本人除了当一名中政会委员外，各军事机关没有他的一份。他是湖北人，想回湖北去，就自请回湖北去办军官学校。但当时汪伪的中央军校尚未成立，叶蓬只好带了修业未满期的学生队到武昌去先办一个军官分校，

这就成了一个没有母亲先有儿子的局面。汪精卫事后觉得有点对不起他，特派陈璧君前往视察一次，以资抚慰。该分校学生两年结业之后，分发、见习，又成了大问题。叶蓬又派分校的政训处长何仲英（原来我在江湾时的副处长），带领毕业学生数十名托我安插，我把他们放在我办的税警学校内再加训练，然后就变为我的青年干部了。

### 五十七、对渝工作委员会——政治工作局

汪精卫对于李士群特工势力的坐大，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根据林柏生的献计，决仿照蒋介石的老例，再来一个特工系统。大约在一九四二年间，他就成立一个“对渝工作委员会”，并未在中政会、中常会提出通过，当然是汪精卫私设的。对渝工作委员会是由林柏生、黄自强、苏成德三人领导。苏成德本来是和李士群合作的，那时他已反李拥汪联林，同时他又亲近周佛海、罗君强。林柏生因和苏是留学苏联的同学。他既反李，就利用他这个职业特务来建立新特工，因此苏成德还当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政治工作局局长。苏成德把他的秘密组织告诉了我，请我予以支持，因为他害怕李士群的报复打击。他还要我借点武器给他，作训练人员之用。我说，只要你能坚持反对李士群，我可以全力支持你，凭我们已有的交谊，你我也应该互信。我借了二十支二十发快慢机的意制驳壳枪和子弹二千粒给苏，苏大悦。他们这个组织由于经费少，编制小，大约只做了些情报工作，后来李士群一死，对象既失，更松劲了。

### 五十八、丁默村的“社运”花样

丁默村既不得志于特工总部，就专心来搞“社运”汪伪初期，他以中央党部社会部长而兼行政院社会部长，所谓社运，即是工运商运农运青运学运妇运等项，所有工商农青学妇以及教育界、文化



界、新闻界的团体，丁都派人四出组织起来，从而吸收情报，搞点小组。就是汪伪中央一级的各机关中，丁也发展细胞，造成自己的系统。公馆派的林柏生等对此最为反感。丁默村感到应付困难，一九四一年他建议把行政院社会部改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sup>①</sup>，由周佛海兼委员长，拉进行政院有关各部的次长一人为委员，以周学昌为秘书长，丁本人则以常务委员资格，替周主持会务。实际只是以周的名义，拉进各部人员，减少阻力。机构扩大了，人员经费增加了，各省、市设社运分会，上海另设办事处，有专用无线电台。总之是弄得更加庞大了，活动的方面更广阔了，这更引起想抓群众的林柏生们所不满。

一九四二年，周佛海也不想做这个傀儡了，和丁共事多年的亲信，又鼓动部下向丁算帐，丁内外交困知难而退。就再把社运会改为“社会福利部”，自任部长<sup>②</sup>。据说要把它办成日本内阁“厚生省”的样子。丁还想伸其触角于农村，还办了一个中国农村青年服务团，以陈端志为团长，招训青年，也搞点实习农场。但受训期满的青年，当时只愿在城市里当小官儿，无一愿往农村吃苦的。

### 五十九、汪、周、梅、罗送子为质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等家属同来上海，感到儿女求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国内入学怕特务暗杀，怕匪徒绑票，怕走向共产党。有此三怕，影佐建议，欢迎我们的子弟到日本去读书。我们感觉日本的读书环境较好，费用也不比国内贵多少，汉奸们就纷纷作送子女到东京念书的打算。最先出国的为汪精卫的女儿汪文彬，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梅思平的儿子梅孝曾和我的儿子罗伯

<sup>①</sup> 该组织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

<sup>②</sup>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伪行政机构改组，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事务委员会合并为社会福利部，以丁默村为部长。

伟。以后陆续去的，有周佛海的女儿，丁默村的三弟，戴英夫的女儿，赵正平的媳妇、儿子，陈群的子侄，好几个多年在日本长住。我虽然感到这样地送子弟赴日就学，有点“送子为质”的味道，为了安全，也就只好如此。日本军部对汪、周、梅、罗四家小辈，指定在同盟社社长家里和王子制纸会社专诚招待，陆军大臣、宫内大臣又请茶会招待他们，这样反使他们不安。周、梅两家的很快就回国了，我的儿子伯伟一九四二年也结伴走回重庆去了。

### 六十、周佛海大办私人报纸

周佛海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需要有一些机关报，来为个人做宣传工作。一九三九年他就建议汪精卫，准备到南京去办一家象样的报纸，汪同意。周开了一张董事名单请汪批准，汪还指定周为董事长，我为社长（周又荐金雄白为副社长）。董事会从来没有开过会，社务完全由我主持。关于物资准备、人事组织，交金雄白一手包办，因为我是上海老记者了。汪拨了十多万元作开办费，我用这笔钱在南京设一新中印刷公司，承印我们的报纸，并对外营业。又开一光艺照像馆，作为报纸的摄影部，也对外营业。

我们的报纸取名《中报》，对人公开说它是中国人办的报、“中央”办的报纸，实际我是看到《申报》在上海资格最老，一般人对他印象很深，“申”字去掉一横就是“中”字，命名《中报》，有心影射。这无非承袭王麻子、汪麻子的故智，想为报纸打开销路而已。《中报》出版后，因能注意版面工作，而且宁、沪之间，自设电台通电，把当时美、英、法三国通讯社在上海发行的电讯稿子，择要登出。由于租界发行的非汉奸系统的报纸，在汪伪区域禁止发卖邮递，这样，《中报》的销路就自然好起来了。这是林柏生的宣传部所不高兴的，日本陆军报道部也对我们

常有烦言，金雄白卖足气力，而有我这样一位大社长君临其上，他内心是很不舒服的。他再三向周佛海建议，要在上海另办一家大报，宣传效力要大得多，我亦从旁鼓吹，周就同意在上海再办一家大报纸。我主张取名《平报》，我还是把“中”字的一竖上头缩短，两旁两小竖斜着一点，简直玩测字游戏，使人猜到《平报》、《中报》是一家的。

《中报》是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与伪府同日开张，《平报》创刊于一九四一年秋（日期已忘记）。周佛海认为金雄白在政治上分量嫌轻，恐被日方轻视，坚主仍由我任社长，金居副席。开幕前招待日方的大宴会，由我主持。日方知道我是代表周佛海办报纸的，乐于周旋。我为不使朋友失望，在很短时间后即辞去《平报》社长名义，由我专任《中报》社长，金雄白专任《平报》社长，春色平分，各得其所。以后金雄白拉上重庆关系，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即自动将《平报》停刊。日寇投降后，即交给吴绍澍接收，吴在原址办一《正言报》，后为蒋介石封闭了。

一九三九年我们在上海买到英国文化流氓克明的《社会晚报》的租界巡捕房注册证，想要出晚报。朱朴向周佛海讨了去干，我亦同意，以后该晚报改为《时代晚报》，弄得无精打彩，朱朴无意经营，又要求我来接办。我把它并入南京《中报》社内，照常发行一个时期，然后停刊。

金雄白在《中报》闹情绪时期，我怕他突然拆台（因为编辑部及经理部人员全部是他找来的），就先将老资格的经理盛国成调为编委会的简任秘书，派人掌握财务、印刷、发行各项业务，又另办一家四开小报（《京报》），派葛伟昶为社长，我自任“董事长”（无董事会），从北京找一些编报内行，如张慎之、王代昌等南来，准备届时接办《中报》，这样一来，金雄白也不敢调皮了。金走后，《京报》、《中报》合在一起办公，《京报》改为晚刊。这两家报纸，日降后都被重庆《中央日报》接收

去了。

金雄白搞南京兴业银行，发了点财之后，在上海再办一家四开小报，名曰《海报》，金白云：“海”者上海之海，海派之海，亦周佛海之海也。委托汤修梅主持其事。社会上当然把它作为周系报纸。这种小报是很赚钱的，因为它在上海流氓社会中生财有道。

汪伪时期的印报纸张，是由一个所谓报业经理处来统筹配售的，各报用纸量要由宣传部批准，并经日本报道部同意，才能领得。林柏生就从这一点上来限制周系报纸的用纸数量。我商请周佛海设法冲破这一难关。周通过日军总司令部中国课长永井大佐，下一公文给日本陆军报道部，规定周佛海方面各日报每月用纸量（按实需数量略多一些），嘱其照拨。这一仗我们又打胜了。

丁默村曾接盘了抗战前《文汇报》的房屋，派人筹备多时，结果全部赠给了周佛海，我们就是利用《文汇报》原地来办《平报》的。

当时有一个湖南人钱时民办一四开小报，叫《国报》，每月向周佛海拿钱，捧周捧罗，无甚意义。我以后建议于周，叫他停办了。汪伪时期，李士群以特工经费，搬来杭州《东南日报》的印刷机，办了一家《国民新闻》。李死后，该报社长黄敬斋请周佛海任该报董事长，请我当常务董事，如《平报》例，这只是拉点人事关系而已。

袁殊在岩井英一支持下所办的《新中国报》，在李士群死后，袁亦援例请周佛海为该报董事长，我为常董。一九四五年该报经济发生困难，我曾替他设法向上海市复兴银行押借一万万元。

周佛海系统拥有这么几家报纸，成为政治资本的一部份。

### 六十一、几个汉奸预备团体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开过汪党大会之后，即紧锣密鼓地准备傀

傀儡班子。“首长”找到一些了，不能不拉些人来当干部，特别是中级干部。所以，就在上海搞了几个汉奸预备团体，首屈一指的是亚尔培路44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佛海，副所长傅式说。周佛海是掌握财经大权的巨奸，该所拉人较容易，如张素民、陈之硕、刘星辰、阮毓琪〔麒〕、柳汝祥、易次乾、蔡侃、许建屏等，以后均在伪财部或中储银行居于重要地位。

我受命搞的一个叫“学艺研究社”，入社要填如下的志愿书：“我信奉三民主义，拥护汪精卫先生的和平建国的主张，加入本社……。”该社由我主持，不用任何名义。加入该社，而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的，由社酌给津贴。加入者有金雄白、胡泽吾、杨树屏、龚祁涛、唐建侯、孙济武、蔡羹舜、顾仲韬、陈云卿、刘勃、李正兆、彭望轼等数十人。梅思平用行政研究会名义找人，蔡培、袁愈佺、顾宝衡、沈尔乔等属之；林柏生利用中宣部找人，冯节等属之；李圣五是研究国际法的，以前又当过蒋方外交部司长，他搞的外交学会，拉来的人为薛典曾等。由香港转来的日本问题研究会，还设了一个外事训练班，原由高宗武负责，高逃后，汪精卫派周隆庠去结束，实际负责者是陈次溥。汪伪政权次长、司长级的人员，经过76号而得官的很不少，例如陈济成就是经过丁默村的拉进而为特任官，那是特例也。

## 六十二、丁李斗争影响苏成德

一九三九年李士群逼迫丁默村放弃特工领导权，狼狈离开76号，唱大花脸的是苏成德。苏成德当特工南京区长，把丁之亲信副区长□□□都挤走了，丁之限苏，不下于李。一九四〇年五月某夕，苏成德在南京大世界内某舞厅唱演，丁默村的弟弟丁时俊也在座。苏酒后胡调，指挥乐队奏这支曲那支曲，同在舞厅喝酒的两个为日军做间谍工作的白俄，不耐烦了，顺手使劲掷去一只啤酒瓶，正中小丁脑袋。车送鼓楼医院，当夜即伤重死去。丁

默村藉题报复，一定说丁时俊之死是苏成德的阴谋，苏授意那两个白俄把他干掉的。在场的许多人都对我说，苏当时未和两白俄打任何交道，丁时俊是自己走向苏成德的柜子上去的，那白俄怒击苏成德未中，而误伤了小丁，说苏阴谋杀人是不对的。

第二天晚上，李士群夫妇正到周佛海家里讨救兵，我走进去，周说：士群和默村的问题不妨趁此和解，现在丁遭此变故，必然悲伤，你可前往丁家，表示慰问，丁必感动，过去的痕迹就可望消除了。李已同意前往丁家，李妻说，不如请罗先生陪了士群同去，有一个中间人总要好些。佛海赞同，我只好偕李前往丁寓。夜半三人见面，谈了半小时，丁态度稍和缓，但对苏成德不能释然，最少要撤职听候查办。我们回到周寓，再度商量。我说，如果苏成德本人同意，我和李兄可以同苏再到丁家，向丁赔罪认不是，当然不是承认杀死了人，只说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在场而没有能够好好照顾他，出此惨案十分难过，特去赔罪。同时苏可到日本去玩几个月，让默村消消气。周、李同意，打电话把苏找来，强而后可。以后照我的方案办事，丁默村也没有再闹了，苏成德对我是十分感激的。

### 六十三、军统特务打人汉奸组织

一九三九年冬，我的朋友易次乾对我说，他的好友徐朗西要找我谈谈。我和周佛海商议之后，决定由我到徐家去拜访他，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著名人物，想拉他入伙。徐见我之后，表示对周佛海深致敬佩，他介绍山西人史春生（蒋方江苏五属税警局长），率部投向周佛海，周自然欢迎。他又介绍他的三个“学生”，江西人程克祥，湖南人彭寿，台湾人彭盛木和我认识，并说程、彭在伪满洲国郑孝胥手下工作数年，郑死后才回上海；彭盛木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日语很好。这三人和我谈了几次，都加入了“学艺研究社”，他们还提了一些怎样应付日本人的建议，

周佛海看了也认为很对。

彭盛木当日语翻译，周认为是头等的，周就用彭为自己的翻译，带他参加周和影佐等的会谈。彭寿自告奋勇说，他对汉口情况熟悉，愿意赴汉做一次调查工作。周佛海得到汪精卫同意，派他为国民党特派员，前往武汉跑了一转。程克祥自称曾在伪维新政府宣传局工作，对南京较熟，我就派他为“还都”筹备委员会布置组的干事。在伪府成立后，彭寿任报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程克祥任边疆委员会藏事处长（后由我介绍他当过社运会的总务处长），彭盛木任财政部参事，都是简任官员。

他们对工作表现得很“积极”，程、彭长于社交，他们利用易次乾来对我接近，又利用杨惺华来搭周佛海的关系。杨欢喜跳舞，程、彭每晚奉陪，在上海、南京赶来赶去。杨惺华就和程、彭（寿）拜为结盟兄弟，日夕不离。一九四一年76号在上海破获了一处军统交通电台，抄到了他们向军统送情报的手稿，根据口供，把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分别逮捕，李士群急令马啸天诱至南京颐和路21号软禁。原来一程两彭是军统老特务，在东北就干过很长的时间。李士群想藉此兴大狱邀功，做了一份几十页的“专报”送交汪精卫。汪看了交周佛海，周再给我看。我看了大吃一惊，原来这三个家伙都是戴笠派来打入汪伪工作的，我真如梦初醒。周佛海当时所重视的是面子问题，首先要马啸天把杨惺华放出，一切由他负责。以后再三和李士群交涉，先把彭盛木释放，杨惺华代他作保。彭仍回任财部参事，程克祥、彭寿两人则关了好几个月，由杨惺华、徐朗西还加上铺保保释。这样就使程、彭通过杨惺华，为周佛海、戴笠的互相勾结创造条件。

#### 六十四、周佛海亲人被戴笠扣押

周佛海当汉奸不久，戴笠就派人从湖南沅陵，把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并从湖南湘潭，把周佛海的岳丈杨卓茂（杨惺

华之父)、杨妾、杨女共六人,解到贵州息烽关押起来。又把周的大儿子周幼海(在胡宗南部当排长),拘禁于西安军统看守所。

周的亲人们被扣之后,戴笠通过在香港的杜月笙带信于周,说这些人虽然被扣,事实仍予优待,希望大家留点将来见面的地步,并由杜转来周母等人在息烽的照片。杜月笙之外甥万墨林被76号逮捕拷打,吴士宝要敲他一笔竹杠时,杜月笙曾托交通银行秘书李北涛找周佛海说情,送过周妻珍贵饰物。万又向76号花了一笔钱即得释出。这次周家即托李北涛为周家送礼,托他多多关照。一九四五年七月<sup>①</sup>,周佛海的母亲病重,移到贵阳中央医院治疗无效死去,戴笠为他料理后事,到灵前磕头,为她建墓立碑,并电告周佛海。周接电即向陈公博辞职,陈复电给假一月治丧(上海市长职务由我代行)。周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当时渝方私人电报不通,周这样一做,等于公开了他和重庆的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姿态。杨卓茂等大小五口,一直押到一九四六年夏天,才放回湖南。

周子周幼海由西北飞到重庆来到磁器口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父子见面。周幼海认为自己冤柱坐牢六年多,专门打听他父亲的家产,深恨杨淑慧待他祖母太不好了,希望多得点金条来填补损失,不料杨仅给他十多两黄金,两件首饰。幼海又因女护士马××问题,和他父亲争风吃醋,顿起杀心。某次竟向看守我们的警卫队的枪架上去夺下卡宾枪一枝,想把父母打死。由于他没有学过卡宾枪子弹的填装方法,就为警卫队长踢倒,夺回枪枝,没有出事。当军统科长侯志川赶来劝解,带他往山下去予以隔离时,他边走边骂周佛海是大汉奸,闹成笑柄。幼海在当年秋天回湘后,再归蒋军,在徐州附近被俘,经教育后释放。一九四七年我看见他骂父亲的长信,这就是周佛海当汉奸的结果。

<sup>①</sup> 应为六月。



### 六十五、周佛海与戴笠的勾结

程克祥、彭寿的特务面貌既被揭露，又获得保释之后，索性通过杨惺华向周佛海进攻。周已看出汪伪组织前途并不美妙，自己亲人又有几个被戴笠扣押，觉得脚踏两边船也是一个好办法，就决定与戴笠谋妥协。程、彭出狱之后，由杨惺华征得周佛海同意，派程、彭为中央信托公司专员，以资掩护。程在一九四二年冬回到重庆，为周、戴之间进行更深的勾结，从重庆带回电务人员及电台一部，周、杨从此为戴笠担任程、彭所需要的活动费。

一九四三年春，程克祥、杨惺华忽同持周佛海手条，到税警总团司令部见我，希望能在税警驻地范围内架设秘密电台一座。我当时佯为应允照办，并坐上汽车带了程、杨走遍税警在南市几个驻地，程克祥说在旧大同大学对面的仓库内设台最便（即今蓬莱公园的一部分）。我因和戴笠有恶感，又觉得这样的电台可能把整个的税警武装拖垮，以后一直不给他们答复。周佛海也不便再问我，程、杨就把电台设在祁齐路杨惺华家三楼上，对重庆通电，被上海宪兵队的侦察测向器探得方向，便衣已在杨家弄堂寻找电台所在房屋，程、杨只得撤除电台，移到虹桥路徐朗西的花园内，临时架设通电，周佛海找到上海日军陆军部（号称对重庆工作的特务机关）部长川本芬太郎少将（原军事顾问与周感情向来很好），向他说明真相，川本即发给一张证明书给周，说明日本军如果要向这个电台有所查询，请先向本部接洽。有了这张护符，他们就把电台设在愚园路136弄59号周佛海的旧公馆里。当然，川本自会密告日本宪兵队的，所以一直平安无事了。

程克祥归上海时，戴笠还派了一个他的军校六期同学，湖北人周镐到周佛海处担任“联络参谋”。周佛海介绍周镐任江苏省伪无锡区行政专员。“周少将”在南京都是汽车出入的。周佛海再介绍周镐到伪军孙良诚、项志庄、鹿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各

部联络，便利军统和他们的勾结。

在一九四四年一月，我离开税警总团，调任伪安徽省长以后，税警方面也用进了几个军统份子为高级干部，为以后戴笠接收税警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杨惺华在周佛海支持下，一再把伪财政部及伪中储行警卫队加以扩充，最后达一千数百人，日寇投降后，由戴笠接收改编为一个团。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程克祥秘密把他收为军统份子，周佛海、杨惺华都在日寇投降后才发觉此事。

四川人罗梦芑，虽已加入汪特，实际还是军统份子，由周佛海介绍为浙江省宁波区行政专员。

#### 六十六、汪、陈、周相继访问日、“满”

汪精卫当了南京傀儡头子之后，先后三次赴日，第一次是以“元首”资格赴日访问的，第二次是以行政院长资格出席东条英机所召集的大东亚各国首相会议。汪每次都带了问题去的，目的在于对现状有所“改进”。敌人摸透他的弱点，当面说话面情软，所以每次都只是对细节问题略加敷衍，其余总是用这种藉口那种藉口把它拖过去了。第三次是赴日治病，以后就死在那边<sup>①</sup>。

陈公博被派担任赴日答礼使节团团长。汪精卫对人说，公博不喜欢和日本打交道，特意教他去磨练磨练。

周佛海曾三次访日<sup>②</sup>，第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冬，为建立伪中储行向日本中央银行借款一亿“自由日元”作为资金，并与近卫做一次亲密接触；第二次是在东条担任首相后，特往洽谈一切，并为中日“和平条约”商谈要纲。那一次还由日皇裕仁接见，谈半小时，是影佐替他布置的。第三次是藉探视汪精卫的病，窥探一

① 应为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六月，第二次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三次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第四次是一九四四年三月赴日治病，于同年十一月十日在名古屋医院死去。

② 周佛海自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先后八次去日本。

下日本的国情国势，为重庆提供重要的情报。

汪精卫曾访问“满洲国”一次<sup>①</sup>，和溥仪打打交道，事实上有点被强迫的情势，非去一趟不可。陈公博也被邀访“满”一次，那是对伪满内阁总理大臣张作相<sup>②</sup>访宁的答访。在影佐祯昭调任苏“满”边境炮兵司令官约一年以后，影佐带密信来，希望与周佛海谈谈天下大势，周就以考查实业名义，访问伪满<sup>③</sup>和影佐谈两日，并拜见了溥仪，赠送“三五”牌香烟，受到溥仪的优渥招待。在日本所谓建国2600周年纪念时，汪伪派褚民谊带了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前往祝贺，还带了一个体育代表团同去。在伪满建国十周年的纪念大会时，汪伪由中央和华北合组一个代表团前往祝贺，团长为驻“满”大使陈济成，副团长为潘毓桂。潘私见溥仪时，叩头如仪。

### 六十七、汪党访日代表团

一九四一年冬，汪党决定派一个三人组成的代表团访日，我和陈群（当时的内政部长）及樊仲云（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三人，都是代表。到日后参加过在东京举行的兴亚国民运动大会，当“来宾”，访问过“大政翼赞会”，与军部代表臆胁大佐，谈过大亚洲主义问题，拜访过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参加过日本外交协会的座谈会，和一部分新闻杂志编辑所组织的座谈会。我们刚刚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英、美宣战的那天晚上，离开东京的。

### 六十八、中央党务训练团

汪伪中央党务训练团共办过三期，每期均只数十人受训。第一期由周学昌任教育长，凭他那老党棍子的一套，也未能耍出什

① 一九四一年五月，汪精卫去伪满洲国“访问”。

② 史无此事。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为汉奸张景惠。

③ 周佛海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去伪满洲国访问。

么花样来。第二、第三两期，是陈春圃以组织部长兼教育长的，副教育长是戴英夫，陈赴粤时，由戴英夫代理教育长。戴曾邀我为该团受训人员讲话一次，我藉机发了一次牢骚。我说不到下面不知我们基础之空虚，人家骂国民党只是党官的衙门，以我所知的安徽情况而论，省党部或者像个衙门，县的一级恐怕连衙门也衙不成，区党部、区分部可能概未组织，这能算是一个党么？现在中国事实上有四个政权。讲组织纪律工作等项，不能否认延安第一；论办事的精神和效率，我们不如华北；论人力、物力的调配运用，我们不如重庆。我们对于自己的前途，不能不做长远的考虑。

### 六十九、汪伪军校与将校训练团

汪精卫接受了伪维新政府的绥靖军官学校，在这个基础上于励志社原址开办一所“中央陆军学校”，自兼校长。并设校务委员会，由何炳贤任秘书长（实际上由他代行校长职权），以刘启雄（黄埔二期生）为教育长，鲍文需为总队长（黄埔六期生）。办过两期，质量并不理想。汪精卫的第二个儿子汪文悌，就是二期毕业，他在受训时，一记耳光打走了本队的大队长，毕业后派到广东去当营长，还带了几个同学去做保镖。

汪精卫摹仿蒋介石方式，在南京光华门办了一个将校训练团，自兼团长，由郝鹏举任教育长。目的是使高级将领都成为自己的门生，结果是这些人聚在一起，互相拉拢，进行封建结拜，便于以后互相依赖。汪又使自己的亲信庶务科长陈皋，入团受训数星期，即算取得军人资格，毕业后即派为中央宪兵司令，岂非儿戏？

### 七十、新国民运动促进会

日本方面感到汪精卫个人无威信，而汪伪方面，对“大东亚战争”亦无所响应配合，他们通过林柏生去耸恿汪精卫，对大东

亚共荣圈的事业发出点热气来。林柏生正想捧汪精卫做个法西斯式的领袖，就多方促使汪精卫发起所谓新国民运动，在南京搞了一个新国民运动促进总会，自任会长，以林柏生为秘书长。这个会所倡导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道德风尚。该会还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林柏生为教育长，戴英夫为副教育长，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竭力把汪精卫捧成“领袖”。上海也设了分会。

### 七十一、日本式青少年训练

新国民运动搞起来了之后，林柏生就完全摹仿日本，来一套青少年训练，同时也是为对抗重庆的三青团组织和童子军训练而设。林担任青少年训练总监，刘仰山任副监，大学、中学、小学学生均需入青少年团受训。一切集会时均有所谓“国民呼”，那就是喊几句口号，拥护汪精卫为领袖。并以各省市长为青少年团司令，教育厅（局）长为副司令，另设一个专职的副司令。

我曾在南京被林柏生邀请参观青少年团全国大检阅一次，因为这是日本人玩的把戏，所以华北学校也有代表队来参加。我看青年们既不整齐，也不严肃，少年们也不怎样活泼可爱，一切都有点被动机械的样子。我深深感到奴化教育下的青少年，自然会被他们弄得毫无生气的。林柏生、刘仰山一九四四年在上海<sup>①</sup>曾带领学生去打赌场、打烟馆，并焚毁鸦片，结果在行政院议席上，内政部长梅思平和林柏生大吵一顿。梅说，烟馆、烟行都是缴纳过国税的，政府有责任予以保障。林说，这是青少年们自动自发地为社会除害，我不能阻止。梅说，下次再乱搅，我就下命令让警察出来干涉。林柏生在搞青少年运动前，还亲到日本，向他们学习过一个时期。

### 七十二、公务员集训的夏令营

<sup>①</sup> 应为南京。

新运总会，除了大搞青少年运动之外，在一九四三年夏季，还办了两期公务员集训的夏令营，在南京办的营长为林柏生，在上海办的营长为陈春圃。原想抽调各机关中的优秀中下级人员受训，形成一种新的人事团体，而各机关则多以不相干的人员派往敷衍。上海营设在中西女学，我被邀前往讲话一次，教育长是戴英夫。我邀请他们全体到我办的税警学校参观一次，这些人员回去后绝少联系。林柏生这一着棋子又是失败的。

### 七十三、汪公馆内的特约记者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的投降运动在香港搞起来之后，成舍我在香港办的《立报》上，常常载有汪方的小消息，虽然不甚重要，内容却都是事实，弄得大家疑神疑鬼，猜这猜那，始终不明真象。汪精卫到了南京之后，《立报》上还是常有这类新闻，后来汪特从香港寄到南京山西<sup>①</sup>某小店转交的汇单上，找出线索，查得收款人是汪公馆的一个茶房，拘押讯问。该人自称是他干的，因为生活费太低，不够维持，才想法子捞点外快，别无政治背景。这位“特约记者”身份暴露以后，陈璧君才反省到她平时对待“佣人”过于刻薄，几乎发生了大问题，于是，对全家男女佣人普遍加点工资，对于当特约记者的茶房，也予开释，另给工作了事。

### 七十四、汪精卫杀死三刺客

汪精卫在南京被刺，身中两弹，在河内又几乎死于军统特务的乱枪之下，他对谋刺他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凡以这类案情被捕的人，必杀方休。一九三九年军统派一个湖南湘潭人戴星炳（原来和改组派有过关系）到上海，伪投降汪方。他想利用见汪次数较多之后，下毒药把汪毒毙。汪特76号一面优渥地招待他，一面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加以注意，发现破绽后向戴诘问，戴恐受刑，即承认他是戴笠派来行刺的，汪即下令将戴星炳枪毙于中山北路。

留美学生陈三才，是上海北极冰箱公司的经理，据说和孔祥熙有关。他用过白俄保镖，后来这个白俄在76号工作，陈三才曾劝该白俄利用机会把汪精卫杀了，可以立大功，受重赏。白俄据此报告76号讨赏，陈即被捕，解往南京拘押数月，周佛海、李士群都认为陈三才罪不至死，汪夫妇终于坚决主张把陈三才枪毙了。另有一个广东大力士黄某，号称在南洋某地双手扼杀一只老虎，步行游历全国到南京。他还会拍电影，林柏生予以延纳，并介绍他去见汪精卫，后来发现他原是一个重庆来的特务，准备在单独进见汪精卫时用手捏死他。结果也杀死了事。

### 七十五、唐生明奉戴笠命投伪

湖南老军人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即唐老四，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号称汪精卫的学生。一九四一年<sup>①</sup>大张旗鼓地从桂林带着家眷，包乘飞机到香港，转上海来投汪。唐生明和戴笠私交极好，许多人知道，他当时又是常德警备司令<sup>②</sup>，这样出来当然可疑。汪精卫一门心思想通过唐生明去拉唐生智，竟予接纳，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清乡”委员会成立后，汪派唐生明为清乡参谋团主任，指挥军事。唐生明利用清乡军官训练班，想把我的税警部队拉过去，被拉军官马某向我报告，我即转告周佛海，周对唐责备，唐道歉了事。汪特发现唐生明和戴笠秘密通电情况，唐带来一位女秘书张小姐，想利用彭年丧妻的机会，嫁给彭年，凭借彭部长夫人的身份，多和汪方重要人员的家庭交往，乘机进行谋杀。唐生明至此，只得承认他是戴笠派他来工作的，汪精卫大惊，即命李士群

① 应为一九四〇年九月。

② 应为常沅警备司令。

看管。李士群又做人情，请把唐生明交给他，一切由他负责，李、唐拜为结盟弟兄。李又以唐为江苏省保安副司令，在李士群死后，唐更进一步和“登”部队参谋人员勾结，即以戴笠的代理人自居。一九四五年唐生明请周佛海和我到他家吃湖南菜，他自己对我说，人家和重庆通电，要自设电台，太麻烦了，我和戴雨农通电，翻为密码交给“登”部队指定电台发出，更为便捷。唐一度想当湖南省长兼长沙绥靖主任，未能成为事实。日寇投降后戴笠来上海金神父路<sup>①</sup>18号唐寓，即戴笠行馆之一。

<sup>①</sup> 即今上海瑞金二路。



## 千里哀鸿说“清乡”

汪曼云

说明：《千里哀鸿说清乡》，是汉奸汪曼云所写的回忆材料。

汪曼云，字秀峰。浙江杭州人。原为国民党C、C分子。抗战前曾任上海浦东中学校长，上海律师协会及全国律师协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沦陷后，汪曼云任国民党上海地下党部执行委员，同时兼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中央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先后投敌，在上海为日寇土肥原特务机关搜集情报，进行破坏抗战、残害抗日人士的罪恶活动时，汪曼云暗中与之勾结。一九三九年八月，汪精卫汉奸集团在上海招降纳叛，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组织伪政权活动时，汪曼云公开降日投汪，被指定为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伪中央党部社会部副部长。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袍笏登场，成立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充当日寇的儿皇帝。汪曼云先后充任伪农矿部及司法行政部次长、伪行政院政务委员及伪国民政府参赞。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寇为确保对我沦陷区的占领，首先开始在华北地区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七月一日开始又在长江以南的吴县、昆山、常熟、太仓等县进行“清乡”，接着，逐步扩及江苏其他地区、浙江省及上海市地区，以及安徽的芜湖、蚌埠，湖北的武昌，广东的东莞等沦陷区。日伪采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由日军对“清乡”区进行疯狂“扫荡”之后，即由汪伪“清乡委员会”派遣伪军及各种汉奸组织，进入“清乡”区，进行人口调查、组织保甲、实行连保制度、清查物资等，妄图彻底摧毁我抗日政权及组织，以至阻止我抗日力量的再度深入。汪曼云在日伪的这一罪恶活动中，一直充任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并一度任太湖东南第

一期清乡区督察专员、清乡干部学校秘书长等。伪清乡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撤销，在伪行政院内另行成立“清乡事务局”时，汪曼云又任该局局长，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最终灭亡止。

在日伪推行血腥的“清乡”中，汪曼云不遗余力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镇压人民，破坏抗战，充当帮凶走卒，背叛国家和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在党的教育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汪曼云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有所悔悟，写出了《千里哀鸿说清乡》一文，记述了从伪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到日寇投降期间，日伪在实行“清乡”中的种种罪恶活动及其组织演变情况。所揭露的事实，虽然并非日伪在“清乡”中的全部罪恶，而汪曼云对自己的罪行也不无开脱之处，但仍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伪政权所推行的反动“清乡”活动，以可供参考的资料，广大读者也必将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及汪精卫汉奸集团卖国罪行的了解。本文系由上海市监狱办公室提供，编者在整理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个别文字作了润色，个别标题作了改动。注释为整理者所加。

蔡德金

## 序 言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日寇在沦陷地区把南北两个傀儡政权——南京伪维新政府、北平伪华北临时政府——举行合流。由大汉奸头子汪精卫来组织所谓“国民政府”，并自任伪代主席兼伪行政院长，“还都”南京。公开认贼作父，出卖国家民族，居然沐猴而冠，实属恬不知耻！

翌年五月一日，汪逆仰承了日寇的意旨，开始筹组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同年七月一日，算是筹备就绪，汪逆以伪行政院长与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两重身份来兼任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在苏州成立了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即在江苏的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县，配合了日寇的军事扫荡，推行“清乡工作”。从此，沦陷区的人民便陷入水深火热的非人生

活，而这个血腥的“清乡”罪恶活动，以地区而言，由苏、浙、皖三省扩展到湖北、广东；以时间言，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起，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止，为时四年有余，人民受其荼毒者何止千万，真是哀鸿千里，惨不忍闻！

当时我（笔者）在这个“清乡”机构的上层组织中担任伪职是始终其事的一个，因此我有责任把我过去在这方面所经历的，亲眼所睹或亲耳所闻的，作实事求是的报导。

### 一、所谓“清乡计划”

自大傀儡汪精卫“还都”南京，南北两个傀儡政权：南京伪维新政府，北平伪华北临时政府虽同时取消，却成立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因此它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虽似貌合，仍实神离，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各干各的。汪伪政府实际所能管辖的区域，只是伪维新政府所属的苏、浙、皖三省的沦陷地区而已。而这些地区，虽名义已改属于伪国民政府，而各地区的伪政权，却仍掌握在伪维新政府的人员手里，并格于敌伪双方在事前的约定，一时无法更动，因此，汪逆的伪国民政府只好关了南京城门做皇帝，“政令”不能出都门一步。这与一九三九年汪精卫未到南京前，在上海组织弄堂政府时的情况，可说是五十步与百步，差不了多少。

再者，在上述三省的沦陷地区，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都英勇地拿起武器，武装了自己，在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的大军深入，阻遏敌人对沦陷区的扩展，从而使它在沦陷区的军事占领，仅有城市和交通线上的点线，无法深入到里面，因此也粉碎了日寇“以战养战”与“速战速决”的战略战策。日寇之所以用汪精卫这只走狗来组织伪政权，目的也在借此搞垮人民的抗战，以摆脱它的困境。不意汪伪政府的建立，不但没有起了这个作用，相反地在政

治经济上加深了敌人的困难，使敌人在战争泥淖里愈陷愈深。它为了作垂死的挣扎，就在一九四一年通过汪伪的军事顾问部、汪逆的最高军事顾问日酋影佐祯昭少将（原系日寇参谋本部的中国课长，时兼日寇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的关系，向汪逆建议，准备在沦陷地区展开“清乡”罪恶活动。汪逆这个大傀儡，对他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本来就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的，于是便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在南京马台街开始筹备，于同年七月一日算是筹备就绪，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同时在江苏省苏州地区实施“清乡”。江南沦陷地区的人民，就首先受到敌伪“清乡”的迫害。

## 二、一脉相承的帝国主义与反动派

据说日寇提出的“清乡计划”，出自汪伪军事顾问部的军事顾问、日寇晴气中佐（后来首任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是日本少壮军人头子之一）的手笔。他是汪逆手下的特务大头子李士群的靠山，汪伪的特务机构“上海76号”就是受他指挥的。他在一次对伪清乡委员会全体伪员讲话时，特别强调“清乡”两字的来源，说在满清时曾国藩、李鸿章攻陷天京，消灭了太平天国后，为了“绥靖”地方，就在江南地区推行了一种军事与政权相结合的运动，这就是“清乡”。因为当时天京陷落，天王自杀，忠王被执，太平天国虽已“覆没”，而天下仍然混乱，因此曾、李推行“清乡”效果很好，使社会秩序重趋安定，人民才得安居乐业。蒋介石的“剿共”，虽名称有殊，而它的意义与曾、李的“清乡”并无二致，且在方法技术上，揆诸曾、李，显然又有进一步发展，所以今后在实施工作中，不仅要效法曾、李，更要“师承”蒋介石。

日寇晴气的这番话说明原来他的“清乡计划”，是中国几个老牌汉奸这一套的翻版，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的所谓

“确立治安”与“安定民生”，实质上是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以实现它的“三光政策”。这正说明帝国主义与汉奸彼此之间，都是一脉相承的。

### 三、汪精卫的一张空头支票

当日首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通知汪精卫要举办“清乡”，并要他考虑人选后，汪逆便把这项罪恶活动，属意于当时汪伪边疆委员会的委员长罗逆君强，拟叫他来推动。所以，有一天在南京颐和路汪的住所里开过伪行政院的例会后，汪便对罗逆这样说：“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餐终日，无所事事（因为那时汪伪政府的辖区，谈不到有什么“边疆”，这个机构等于虚设，而虚设这个机构的目的，意在粉饰“还都”，也就是说蒋介石政府有什么，我也有而已），无异太子太保，所以我想给你一些实际的‘工作’，你看怎样？”

汪逆的意思似在探询罗逆的意见。罗马上领会到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立即回答说：“好，我敬候先生（当时凡属汪伪政权的汉奸伪官，都称呼汪逆为‘先生’，而不名称‘官衔’，这是沿袭了过去国民党人对孙中山先生的称呼，因此汪逆也欢迎人家也这样呼他）的命令。”汪逆在当时虽没说明要给他一个什么实际“工作”，而谁听了都会知道：这就是“清乡”。因为在那时日寇要举办清乡，在敌伪间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是什么秘闻隐事了。

罗君强是富于神精质的人，而且官瘾极大，于是，便迫不及待邀同才从内地逃过来投汪伪的周学昌<sup>①</sup>，每天晚上在他颐和路的家里，关了房门草拟什么“清乡计划”与“清乡督办公署组织条例”等等。不仅如此，从此，罗逆看到了熟人，竟厚颜无耻地

<sup>①</sup> 周学昌，原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一九四〇年春，以往战区视察名义，由香港潜赴上海，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时任伪南京特别市市长。

自称“本督办”起来。也不管这印把子拿到拿不到，姑先过过这个督办瘾再说，认为反正汪精卫既已许给了他，也逃不了。于是便预约周学昌做他未来的秘书长，借以安安心周学昌的心。

可是，汪精卫是个十足道地的傀儡，是没有灵魂的，什么事情他都当不了家。何况这个计划出自他的主子、日本鬼子的手里，还能由你作主吗？这不知是汪逆不理解呢？还是故作糊涂？竟擅自轻许给了罗君强。在他以为这是汪伪国民政府内部的人事问题，他是有权作主的，但当他把心目中内定的人选，向他的顶头上司、亦即汪伪国民政府的太上皇，主席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提出征询意见时，不意却给日寇打了回票，顶了回去，提出由汪伪特务组织上海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担任。名单既由影佐提出，汪精卫当然完全照办。汪逆对罗君强的许诺，便成一张空头支票。

#### 四、李士群耍的一记曹孟德手法

在敌伪时期这群汉奸里，李士群是一个凶狠毒辣的大特务头子。他在政治上野心很大，欲壑难填，狡猾成性。但在抗日战争前毕竟是个名不见经传蒋家中统里的一个小特务，现在要把这样一项重要活动，交由他来担当推动，不论是日寇或是他自己，总感到资望不够，不足号召，窒碍必多。于是由日寇影佐向汪逆亲打交道，要汪逆对这件罪恶活动亲自出马。这样一来，可以把“清乡”渲染一下，装扮成为汪伪政府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措施”，实际则由李士群去推行。李士群就可以把清乡的一切措施，以汪精卫的名义行之，使大小汉奸不敢违拗。这样李士群手里就有一柄开山斧，由于“清乡”是由汪逆亲自出面，使各方面不敢攻击，无异又使李士群手里又有了一块挡箭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法，确使李士群去推行“清乡”罪恶活动时，减少了许多阻力。

当时汪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的伪委员长一职，由汪逆以伪行政院院长与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两重身份来兼任。因此，伪清乡委员会不仅与伪行政院及伪军事委员会为平行机关，且在“清乡”地区，它还代行了伪行政院与伪军事委员会的职权。两个伪副委员长，一是伪行政院副院长周逆佛海，一为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陈逆公博。所有有关部会的首长都是委员。李士群以伪警政部长兼委员和秘书长。我当时是伪农矿部的政务次长兼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

伪清乡委员会本身组织，除秘书处外，设一、二、三、四四个处，一个会计长办公室及四个设计委员会。其职权与人事分述如下：

1. 秘书处：管理秘书业务，主任秘书曹滂，原系伪参谋本部的高参。
2. 第一处：管总务，处长陈光中，原系伪警政部总务司长。
3. 第二处：管政治〔务〕，处长余百鲁，原系伪特工总部招待所主任。
4. 第三处：管保安队与清乡警察，处长唐生明，原系伪军委会委员。
5. 第四处：管社会福利，处长彭年，原系伪社会部次长。
6. 会计长办公室：管会计、出纳、审计，会计长何廷祯，原系伪行政院组长〔秘书〕。
7. 地方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蔡洪田，原系伪江苏省民政厅长。
8. 教育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仲寰，原系伪江苏省教育厅长。
9. 经济设计委员会，主任陈君慧，原系伪行政院参事厅厅长。

10. 民众运动【训练】设计委员会，主任戴英夫，原系伪教育部次长。

各处、室、会的人员，不论是头头，或是秘书、参议、专员、视察，乃至科长、科员等，为了樽节开支，都是向南京伪组织的各部、会去调用的，反正各部会的业务，都无法开展，都是拿钱没事做的冗员。因此，伪清乡委员会向各部调用的伪员竟在一千以上，成为当时汪伪组织在南京各机关中人事最庞大的一个机关了。

### 五、敌伪签订的〈清乡协定〉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汪伪清乡委员会开始筹备之初，日寇与汪逆双方签订了一个所谓〈清乡协定〉。这个协定的初稿，是日寇送来的，汪逆对它似乎没有什么变更或修改。原定双方签订之人，一为日寇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一即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不知为了什么，临时都没有亲自参加，改派了代表。日寇板垣派了他的副参谋长，亦即汪逆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汪逆则派伪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李士群为代表。签订这个卖国协定的场所，是在伪军事顾问部，当时出席签订这个仪式的除双方代表外，日寇方面有伪军事顾问晴气中佐、小笠原少佐、联络员有吉中尉、译员大西，汪伪方面则为汪曼云与外事秘书杨志为。

协定的条文与译本，都是日寇方面准备的，事前早已缮就，可影佐还虚伪地问李士群：“对协定内容要有修改的没有？”汪逆本人却没有意见，李士群当然不会有，于是双方在缮就正本上签字。

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规定所谓“清乡工作”，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相互配合，共同推行。三分军事由日寇负责，七分政治则由汪伪政府担任。又规定：凡属划为“清乡”的地区，



该地区的行政、赋税、乃至教育、建设……等等，不论原属中央或地方的，概需由原来的行政机构划出，交清乡机构接管，须俟该地区的“清乡”完成方能拨归原属机关。这样，不仅意味着日寇给汪逆地盘中又收回了一部分的权利（日寇对“清乡”地区的控制要比一般沦陷地区为紧），又无异在汪伪行政院之外，又设一个行政院。无怪在“清乡”实施后，汪伪行政院的成员如周佛海、丁默村和地方政府的高冠吾等，都要大叫嚷，说是“清乡”愈扩大，行政院的范围愈缩小了，从而也可以看出敌伪之间与伪官之间，由于“清乡”所产生的重重矛盾。

## 六、苦难深重的沦陷区人民

伪清乡委员会是根据敌伪双方签订的《清乡协定》，推行七分政治的一个机构，它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在南京马台街开始筹备的，同年七月一日算是筹备完成。同时，在苏州十梓街信孚里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以伪秘书长李士群兼办事处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因须留在南京会内办公，仅领名义，并未到差，并把伪清乡委员会原有的各处、会、室，除秘书处酌留十几个秘书留会办公外，都一律改组为组，或小组委员会，原任处长或会计长与主任委员，概改为小组组长或小组主任、主任委员，连同全部工作人员，一律调往苏州，改隶于伪驻苏办事处，受它的领导指挥。于是全部的“清乡工作”的重心，由南京转移到苏州。本来应由伪清乡委员会拟订颁发的计划、条例、法规等等，现在都变为由下而上，概由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拟具后，呈准颁发，伪清乡委员会只是替伪驻苏办事处完成“法律”手续而已。

自成立了伪驻苏办事处，伪清乡委员会顿时就变成了一个门庭冷落、空洞无物的大衙门。于是，把会址搬到了鸡鸣寺下伪国民政府的宝章阁里。这样一来，伪清乡委员会顿时由南京人数最

多的机关，变为最少的机关了。可是它对沦陷地区人民的危害，与对抗日战争的破坏，却还是最大的机构。

根据敌伪签订的《清乡协定》，伪江苏省政府应把首次划为“清乡区”的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县部分的行政、赋税、建设、教育、卫生等，分别交由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所属的伪清乡委员会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接管，并在它的下面分设了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伪特区公署。由伪驻苏办事处原任伪江苏省警务处长的张北生，为伪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分别呈荐谢叔锐、严明、王昆山、沈靖华等，分任上列四个特别区公署的署长。每个伪署长还得兼任各该区的伪保安大队长、赋税管理所主任、封锁管理所所长等伪职。当然一个人忙不过来，这些兼职的业务，概由副职在负实际责任。至所谓清乡督察专员，他的职权等于一般的行政督察专员，可是还得大一些，因为他可以制定单行法规（惟须呈准颁行），这是一般行政督察专员所没有的。关于各个伪特别区公署署长，也无异旧制的伪县长。虽然他的辖区有些还不到一个县，可是他的权力，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还有那么多的兼职，这是当时一般行政制度上所没有的。

在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之外，它还呈准了汪精卫，用伪清乡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许许多多的机构，如伪清乡委员会封锁管理处（处长由伪特工总部苏州站站长谢雪荪兼）、伪清乡委员会赋税管理处（兼处长余百鲁）、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原系伪宣传部副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党务办事处（主任袁殊兼）、伪清乡委员会参谋团（主任唐生明兼）、伪清乡委员会警察总队（总队长马啸天兼，马原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等。这些组织在名义上，几乎与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相埒，实际上它们都是受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领导指挥的，而这些组织机构大部分都各自办了训练班，五光十色，无奇不有。

这些都是伪驻苏办事处成立初期的现象。

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虽然设置在一条弄堂里，可是在苏州俨然除伪江苏省政府之外，又是一个伪江苏省政府，而气焰过之。

### 七、日寇对“清乡”的控制

在汪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成立的时候，日寇在苏州也设立了所谓“清乡指挥部”，派由一个少将级的主其事。伪军事顾问部也设置了“出張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名义上他是协助驻苏办事处与“指挥部”作联系工作，实际就是牵着李士群鼻子在跑。此外，导演汪精卫这个傀儡政府的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这个机关的机关长，便是日酋影佐祯昭。据说他是日本著名的特务大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学生。他与汪逆接触之初，是一个大佐级的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课长，迨汪逆在南京组织伪府时，他已晋升为少将，且为汪逆的最高军事顾问，亦即汪伪政府的“太上主席”），也在苏州设立了“出張所”，派有专人——日酋广濑嘱托，与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取得经常的联系。至于各个伪特别区公署，则由日寇的江苏联络部（原称特务机关，自梅机关改为日寇军事顾问部后，所有它在各省市的特务机关，一律改为联络部，受日寇军事顾问部的领导指挥，在日寇侵华的特务组织中，形成了对傀儡政府控制的一整套特务系统）派有联络官，常驻在署里。名义上与日寇联络，实际就是太上署长。

人事如此，行政上怎么样呢？不说别的，即以敌伪双方签订的所谓〈清乡协定〉来说，根据这个协定，“三分军事”由日寇负责，“七分政治”由汪伪政府担任，那么推行“七分政治”的计划，按理应由汪伪政府来控制，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三分军事”固由日寇来计划，即所谓“七分政治”，也由不得你来拟

订，却也由他来越俎代庖。而如何与军事配合并不告诉你，只是制订了一份所谓进度表，要你某日到某日干什么，而“清乡”的傀儡组织干了这些，究竟与他的军事是怎样配合的，还是莫名其妙。所以自伪清乡委员会成立，以迄日寇无条件投降，不论是在伪清乡委员会时期，或“清乡”各伪省市府自行办理时期，所有所谓“清乡计划”，原本都是日文，均系日寇所拟定。

### 八、多如牛毛的“清乡法规”

“确立治安，安定民生”，是敌伪时期日寇与汉奸在“清乡”地区用以欺骗老百姓的两句口号，实际却用比牛毛还要多的各种“清乡法规”使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动辄获罪，简直无法喘气。例如封锁条例、清查户口法则、联保切结办法、检问细则、物资移动须知与赋税征收规定等等，究竟有多少，我也说不清楚。即是这几项，已使民无噍类矣。这些法规一部分是在伪清乡委员会筹备期间制定者外，其余大多都是由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成立后，拟订了报会“核准颁布”的。

这些多如牛毛的“清乡法规”，在形式上固都由李士群用伪驻苏办事处名义呈准颁布的，而实际却都来自日寇。到了一九四三年，伪清乡委员会因“清乡”失败而撤消，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该省市府自行办理后，才把这许多的“清乡法规”，除封锁、检问、物资移动与联保切结等七种外，其余全部废止。可是各个地区仍有不同的单行“法规”，不用解释，这还是日本鬼子在作祟。

### 九、名目众多的“训练班”

自伪清乡委员会开始筹备，尤其是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成立以后，各种各样的训练班，正像雨后春笋一时并起。如余百鲁的税务人员训练班，何廷祯的会计人员训练班，谢雪芬的封锁检问人员训练班，袁殊的党务人员训练班与政工人员训练班，唐

生明的军事人员训练班等。即几个小组设计委员会也不甘落后，也来开办两个训练班。其中办得时间最长的是唐生明的军事训练班，直到李士群做了伪江苏省政府主席兼伪江苏省保安司令时（唐生明为副司令），这个军事训练班就改隶于伪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变成了一个经常军事训练的机构。它训练的对象，一部分为“招抚”而来的蒋家的散兵游勇，与挂名的游击部队；另一部分则为日寇由中条山送来的俘虏。至于这些俘虏经过训练，后来怎样处理呢？我不清楚。据马啸天说，在伪清乡委员会筹备伊始时，他曾在南京办过一个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马也是“76号”的特务头子，时任伪警政部特种警察署长，后兼伪清乡委员会和平义勇总队队长），没有结束，便由另一汪伪特务头子胡均鹤接收去了，调往苏州继续训练。

当时为什么要办这么多的训练班？实际是为了植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主要的还是为了当时的“清乡”经费有两百万元之巨。这在汪伪政府支出中，是最庞大的一个数目。如何把它来“消化”，人人都在动脑筋，认为办训练班是个办法，可以巧立许多名目，什么开办费、经常费、钟点费、制服费、津贴费、结业费等等，只要你立得出名目，拿进的就是钱。好在那时的“清乡”经费与特务经费一样，都是不受审计的，办训练班成了一个捞钱的不二法门。于是一人发明，人人效尤，各色各样的训练班，便挤满了苏州城，因此带动了苏州的舞榭酒肆、赌场、妓院，一时都呈畸形的发展。

### 十、划地为牢的“封锁线”

敌伪时期的沦陷区，要是你进入“清乡”地区的话，首先就会使你看到一条逶迤数十百里竹篱笆，这就是日寇、汉奸把这一地区的老百姓，囚禁在里面，划地为牢的“封锁线”。这一圈竹篱笆，划分了里为“清乡区”，外为单纯的沦陷区，并沿着竹篱

篾的水陆交通要道，分设了大小检问所。凡要出入“清乡”区，不论人或物资，概须通过大小检问所，出示“身份证”和“移动证”，经过检问人员的盘问检查，认为无行迹可疑，才得放行。至于你带的东西，什么东西可拿，什么东西不可带，虽有规定，还得要看检问人员的喜怒与你纳贿的多寡而定，不然你带的东西，会被借故没收，甚至连人也会被扣押起来。

这封锁线虽是一圈竹篱笆，可是日寇把它视为铜墙铁壁。这并不说它建设得固若金城汤池，坚不可破；而是由于“封锁条例”规定，凡是破坏或是私越“封锁线”者，都是格杀勿论的。有不少的无辜老百姓为了生活，跑单帮、抄近路越了“封锁线”，确给日寇不知残杀了多少人。因此，平时紧紧连靠在一起的乡村，平时是相互串门惯了的邻居，由于“清乡”，一旦在他们两邻之间，作了一道“封锁线”，那要再去串门，虽近在贴邻，也非绕着一个大圈子通过检问所不可。要是近段连小检问所都没有，那绕上了一个一、二十里的大圈子，也并不为奇。古人所谓“咫尺天涯”，用在那时，确是名符其实，一点不假。要是你想贪图便利，把竹篱笆拆掉一、两根的话，一经发觉，就会罹杀身之祸。

据说“封锁线”的建立过程是这样的：先由日寇把划定的“清乡”地区，在日寇的武装保护下，开入“政工团”，对“清乡”当地的老百姓作一番欺骗的宣传，然后强迫当地居民按户摊派“封锁费用”（用以购买毛竹等封锁器材）。经过初步的户口调查与“政工团”的活动，便由日寇进行军事“扫荡”，然后迫使当地居民服义务劳役来建筑篱笆，这就是所谓“封锁线”了。接着，建立基层的行政机构——乡镇公所，调查户口、编组保甲、办理联保切结（即一人犯罪，五家连坐），强制人民设立瞭望台与瞭望哨，以加强封锁的效果。要是某一段的“封锁线”遭到了破坏，那就近的老百姓立刻就会大祸临头，遭到日寇的重点

扫荡，所以“清乡”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命，天天都是在生死边缘上的。

平时“清乡”部队（伪“清乡”警队和当地的保安队）在日寇的率领下，常借名搜查“坏人”下乡骚扰，按村挨户，翻箱倒柜，为所欲为。把老百姓的东西拿了就走，算不了一回事，所以当时大家把“清乡”叫做“清箱”，可见其掠夺行为比强盗还凶。

但是竹篱笆的“封锁线”，把它说成是“铜墙铁壁”，本来就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有时也会不攻自破。因为这些所谓“铜墙铁壁”的“封锁线”，不时给愤怒的人民在反清乡的运动中不知毁掉了多少，所以在安徽芜湖地区进行“清乡”的罪恶活动的时候，便不再采用竹篱笆，而以利用地形来作“封锁”了。

沿着“封锁线”所设立的大小“检问所”，是出入清乡地区的吞吐口。一条封锁线该设几个检问所，没有一定，以日寇的需要而定。

### 十一、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

一九四三年秋，伪清乡委员会由于“清乡”失败已宣告撤销，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伪省市府自行办理。我原系伪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这时又是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为了驾轻就熟，因此就任命我兼任伪行政院的清乡事务局局长。

本来，在伪清乡委员会时期，某一个地区的“清乡”告一段落的时候，日寇就牵着汪精卫的鼻子去“出巡”，借以给那些从事“清乡”的中小汉奸一些鼓励。自伪清乡委员会撤销后，这件丑恶罪行活动，就改由我去扮演，当然不能也叫“出巡”，而名之曰“巡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伪军事顾问部的通知，要我到浙江崇德去“视察清乡”。我的妻子与孩子知道我要到浙江去，要我顺便带他们到杭州去玩，我同意了。但和我一起去的

还有伪军事顾问部日寇顾问，且须直接径到现场。如今带了家属一起去，不但不成体统，抑且太不便利。因此我先一日把家属送到了杭州，翌晨我再乘由杭州开沪的早快车去硖石，再在硖石搭乘由沪开杭的早快车，与沪来的日寇顾问会齐，同到长安，转赴崇德的石门。

当我带同我的副官在硖石候车的时候，正遇由沪开杭的一班慢车到达。反正闲着无事，便在车站外面的一个“大检问所”，看看他们究竟怎样进行“检查”的。这是个“大检问所”，共有男女检问员三十个人左右，检问所的建筑是一个大草棚，沿着马路的一边，设有两长条的板桌，板桌的前面，用竹杆拦着行人道，下车旅客沿着行人道挨次前进，将行李放在长桌上受“检查”。旅客首先应将他在“清乡”地区的居民证给检问人员看，要是没有“清乡”地区的居民证，把你原有的“市民证”或“良民证”交出来，换给你一张“清乡”地区的临时“居民证”，等到你离开“清乡”地区时，再把原证换还。要是检问人员认为你行迹可疑，他就有权把你扣留交保。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获释，那非满足他们勒索不可。要是检查你的居民证没有问题，这才进一步检查你携带的东西，或者进行人身搜查。

那时我看到旅客们，都像老子出门的那样，未进入“大检问所”，手里早已暗暗地捏好了钞票，当他们把行李从桌上推向“检问员”的时候，“检问员”半公开式地顺手接过了你手里的钞票，也不遑点点数目，随手投进了自己的大衣袋。然后把你的行李，在形式上翻了一翻，便在行李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字，就算过去了。女的旅客则由女的“检问员”检问，等到这一班客车的旅客“检查”完毕，只见每个检问员的大衣袋，都像河豚鱼的肚，胀得鼓鼓的了。

这时，我面前正站着一个人手持手杖，指东划西，嘴里又不时在哼着山歌小调的一个家伙，他却并没动手检查，似乎象是他们



的小头头。我因看到旅客业已走完，便问他是不是这个检查所的主任？他看我的态度与语气有些不对头，便推说他是来玩的。我根本不理他的假话，进一步问他：你们收的是什么钱？我这样一问，他还没有答复，几个“检问员”听了我的话，知道苗头不对，于是大家都向草棚后面的一间隔着小间里奔去。这个小间好象是他们的办公室，门口还站有一个日寇宪兵（尚有六、七个宪兵则坐在检问所对马路的一个草棚里）。他们是想凭借有日寇宪兵替他们看门，到小间里去把钱出笼，这样一来我变了无的放矢。于是我便叫副官追进去，果然给那个站岗的宪兵一声吆喝，把他拦住了。我的外事秘书，没和我同在一起，这时没有人作翻译，而我又讲不来日语，在这尴尬的场合下，我也只好赶了过去，出示我的伪官证。大概他们也知道，南京有人要到这一带（虽不知道会来硖石）来，才允许我们也进入了这个小间，同时我把所有的“检问员”除女的外（因有几个已紧张得在哭出来了，我怕她们哭哭啼啼，闹得太不像样，所以除外），都叫了进来。我还是问他们收的是什么钱？大家面面相觑；不出一声。那时他们虽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可看到日寇看了我的证件就没把我拦住，必然和他们的工作有关。我怕火车就要来，时间不许我多讲话，我便干脆叫他们把装在袋子里的钱都掏出来。大概挖他们的腰包，还有些不服气，便有一个人问我：你是哪一位？我说：你不必问我是哪一个，你们拿老百姓的钱，是谁都没有出过收条，可是我拿你们的钱是会出收条给你们的，于是我就叫他们把交出来的钱点明数目。正在这个时候，看到一个人跑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看到了我，就叫我“局长”！我仔细一看并不认识，便问你怎样认识我的？他说他的兄弟是我长浦东中学时的学生，他送兄弟到学校时曾看到过我，不想今日在这里见到。我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在这里海宁县政府（县治设在硖石）做秘书。又说：“听说局长今天到崇德去，怎的会到

这里来？”我说：到了崇德就看不到这里的情况了。他说：他们（指检问人员）收的这种钱明知不该，也没有办法不收。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看对面坐的这些日本兵，平时吃的、用的、花的，乃至玩“花姑娘”的钱，都要向“检问人员”伸手。他们收入有限，钱从哪里来？不给又是不行，于是只好向老百姓头上动脑筋了。我说：那么就请你把这些情况，写在纸上，把钱的总数也写上，还叫所有的“检问人员”签了名。交出来的钱，装了一网袋，一共是八千多块钱。我叫副官用他的卡片写了一张收据给他，便离开了“检问所”。

上海来的火车停靠了月台，伪军事顾问金子大佐已派他的辅佐官有吉大尉，和我的外事秘书张豪来找我了。进了火车里的包房，里面除金子外，还有日寇上海登部队派来的两个大佐级的高级参谋，是一起来视察的。我的副官便把那袋钞票向车桌上一放，日寇金子便说，噢！这么多的钱？我便风趣地说：“清乡清来的”。于是我把经过情形以及写在纸上的那些话，叫张豪翻译给他们听。我说这仅是一班车的数目。当时这条沪杭线上每天有八班车子对开，这时大米价每石恐怕也只有四、五十块钱，那每天该有多少石的米从这些旅客的老百姓身上给这些汉奸勒索了去，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目。无怪那时的老百姓都在说着：“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了。

本来当时汪伪政府的一些伪官，也曾主张在“清乡”地区内，以“清乡”区与“清乡”区的接连地带，不设“检问所”，可是日寇负责“清乡”地区军事的登部队坚决反对，当然无法实现。现在日寇登部队的高级参谋，目睹了这种情况，同时也牵涉到了日寇宪兵部队，自也不无有些窘态，因此这两个登部队的高级参谋，当场向我表示：对“检问所”的设置问题，也认为应该重行考虑了。

车抵长安，便是“杭州清乡地区”了。由伪浙江省教育厅长

兼杭州地区的清乡督察专员徐季敦来接我们，并陪同我们到崇德的石门现址去“视察”后，当天徐逆还陪同我们去杭州。在火车上又遇到了伪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张鹃声（原系伪浙江省社运会主任），他是专程从嘉兴到杭州来见我的。我知道硖石归他管理。于是我就把这一网袋的钞票并签了名的那张纸，都交给了他。张逆与我原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老同事，因此暗暗地对我说：各区的大小“检问所”隶属于浙江省封锁管理处处长傅式说省长自兼，别说大小“检问所”的主任他要卖钱，即“检问员”也由他亲自一个个地卖出去的，所以这件事我也只好请他自己去办了，至于办的结果怎样？我可以报告你的。我既知道了这个底细，在杭州看到了傅式说，反而不好意思提到硖石的事了。据说，傅式说得到张鹃声的报告后，当然深恨这些“检问所”做得太无顾忌了，十分气愤，当天便派员去彻查。可是到了硖石，已找不到一个检问员，早都逃避一空，旅客出入竟无人顾问。而这个“检问所”，也由日寇登部队把它撤销了。

上面所说，只不过就“检问所的检问人员”对人民的敲诈勒索一端而言，至于在“检问所”前不时可以看到：日寇宪兵把那些为了生活跑单帮的老百姓，或是曝晒在夏天的烈日下，或是赤身露体罚跑在严寒的风雪中。而一些为生活所迫跑单帮的妇女，亦常遭那些检问人员的奸污。至命令那些男女单帮在规定的贿赂外，要你买一些他所指明的东西而不给钱，那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听说南通天生港“大检问所”的检问人员就有一百多名，想见其人数出入之众。无怪这个“检问所”的伪主任张逆道生（又名立本）出入包车，后面还要跟上几个骑脚踏车的保镖，其日常用品，连裤带都用黄金打的，也可见他们对人民压榨之凶与生活的如何荒淫无耻了。所以那时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的妹夫，薄筒任官不为，而言宁愿降格以求去做一个“检问所”主任，不是没

有原因的了。

## 十二、永不兴隆的“永兴隆”

在敌伪时期，苏、浙、皖三省与京、沪两市的军事，固为日寇登部队所控制，即上述地区经济物资的移动，也掌握在它手里。日寇登部队为了管理物资的移动，特在上海设了一个登部队的第七出張所，凡上述地区一应物资的出入移动，都得事先向它申请许可，经核准后，方得移动。至“清乡”地区的物资出入，自然也在它控制范围之内，但应先向当地的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登记，经核准后，再送第七出張所批准，发给移动证。虽手续多了一重，可是“清乡”地区物资移动的审核权，第一关就属于“清乡”机构的督察专员公署。大家认为这是大权在握，发财是可以指日而待的，这种机会岂肯失之交臂？于是李士群便电邀我去苏州，共作商量。决定先由李逆向他后台老板——日寇晴气中佐进行游说，推说，为使“清乡地区”的市面要比非“清乡区”繁荣，我们想集资组织一个公司，以便“清乡”地区的物资得到充沛的供应，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同时可以藉此解决我们个人的经济问题。事经晴气同意，大家都认为这已千稳万妥，万无一失了。于是纠集我们组织了一个“永兴隆公司”，资本号称二百万，由李逆自任伪董事长，我与唐生明、陈光中为伪常务董事，李的内侄叶耀先任总经理，岳光烈为副。我介绍了我的姻表弟杨乐安为协理。总公司设在苏州观前街我姻表弟任经理的大丰银号里。当时在常熟、昆山、太仓乃至无锡、常州等地，都设有分公司。生意未做，一摊子组织人事已形成了庞然大物。

为了以广招徕，在苏州狮子林的“贵宾官邸”，对苏州的工商业者与新闻记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并大吹大擂地介绍：“清乡”地区任何物资的移动，我们“永兴隆”可以得到优先与便利，希望各行业与永兴隆合作，以充沛供应“清乡地区”

的物资需要。意思除了永兴隆自己办货外，还接受各业的委托，代运物资。这个因发财思想冲昏了头脑的夸大宣传，在苏州的工商业中，固引起了不少投机倒把者的注意，可是对苏、沪两地的日本商人，却给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那时的物资移动，都操纵在日本商人手里，中国商人要搬运物资，自己要去申请批准，一百起中也难得碰到一起，于是花钱去托日本商人出面。这样，不仅他们可以从中取利，且对中国商人手里的物资也易于控制或打击。第七出張所之设立，固为了掠夺沦陷区的物资，但也为保护日本商人的利益。现在永兴隆这样一宣传，无异抢掉了他们的饭碗，于是纷纷向日寇登部队反映，还说什么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第七出張所无异做了“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专代核准的物资移动的工具。日寇的登部队，就以此质询日寇驻苏的“清乡指挥部与军事顾问部”，及梅机关在苏州的出張所等。日寇晴气对登部队的压力，自然挡不住的，于是李士群与我们全部退出，准“永兴隆”以一个纯粹的商人组织而存在。李士群和我们只能把这董事长与董事等的名义辞掉，仍由叶耀先、岳光烈与杨乐安继续干下去，因为“大利”当前，谁也不死心。

我虽是“驻苏办事处的副处长”，但仅是遥领的名义，日常我总是在南京。有一天我又接到李士群来电，要我立刻去苏州。我到了苏州，才知道“永兴隆”又出了纰漏了。原来为了“永兴隆”不知替那一个纱厂运了五千担棉花，固为了那个纱厂正在停工待料，急于要用，宁愿多出些钱，务要如期送到，而第七出張所的许可证又迟迟未下。“永兴隆”的人由于利令智昏，以为沿途“检问所”都是自己人，只要派个熟人，沿途打个招呼，也未尝不是办不到的事。好在“永兴隆”的老板便是李士群他们，这在所有的“检问人员”中，又是公开的秘密，还能拦住不放吗？于是便派人押送起运。偏偏碰到驻在“大检问所”的一个日寇宪兵，他或许根本不知道“永兴隆”是什么一回事。因为没有第七

出張所的移动许可证,便“命令”把棉花连人全部扣留,“检问所”的人员虽知这是李士群他们的东西,但这是日本宪兵的主张,既不能告知,也只好“唯命是从”。事情通过了第七出張所,闹到了登部队,当然又很快地转到日寇晴气那里。晴气严厉地向李逆士群提出了两个办法:一、要李士群把“永兴隆”与各地的分公司立刻关闭停业,即为维持李的“面子”,由他负责,把扣留的人释放,棉花发还;否则也就是第二个办法,除棉花没收外,还得要把“永兴隆”的负责人加以逮捕,他也不要管这件事了。

李士群找我去,就是为了要商决这件事。我觉得所谓两个办法根本只有一个,且事情又是自己做得太冒失,也很难找出理由来。于是大家认为与其把粪坑掏得更臭,而于事还是无补,倒不如知难而退,免得臭气外溢更不好看。于是决定接受第一个办法,把苏州与各地的总分支公司于当天一律关闭。“永兴隆”为了修缮房屋,置办生财,宣传广告,联络交际等等,已所费不赀,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原因只是大家财迷心窍,而所谓“永兴隆”也者,从此永不兴隆了。

### 十三、此山是我开,留下买路财

汪伪政府建立初期,市面上的通货还是旧法币,直到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才发行了中储券(又名储备票,或C. R. B)。最初它与旧法币掉换率为一对一,后来又改为两块旧法币才能掉换一块“中储券”了。因此有许多银行在一对一与两作一的转变中,对存户不知侵吞了多少钱。可是,这时在江苏省“清乡”地区内的货币,用的还是旧法币,拒用“中储券”。

当时的伪财政部长兼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是周佛海,我与李士群原本也是拜把子的弟兄(共十二人,计为周佛海、梅思平,沈尔乔、朱朴之、王敏中、李士群、蔡洪田、罗君强、戴英夫、金雄白、周学昌和我),而且李逆的警政部长,在大家拜了

把弟兄后，由周佛海让给李的。揆诸常情，周佛海的事对李士群来说，帮忙都未恐不周，怎的在他主持的伪中储券发行的时候，在李士群主持的“清乡”地区，反而遭到挡驾呢？关于这一点，周佛海虽把伪警政部长让给了李士群，可是周为了把原任伪警政部的主任秘书、周的私人杨树屏，介绍给李为常务次长，却遭到李的拒绝，彼此心里都成了一个大疙瘩。同时，李士群认为这“清乡”地区是他开辟的地盘，也就是旧小说里所说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那句江湖老话。你周佛海要到我“清乡”区来疏通，也得逢关纳税。因此，他便对周佛海说：“清乡”地区还有旧法币四百万未掉换，如二作一来换，老百姓吃亏太大，对我们“清乡”来说印象太坏，所以“清乡”地区的旧法币不能以二作一来掉换，仍须以一作一。而他可以用二作一来收进，一转手间，不就多了两百万元？周佛海为了要推行“中储券”，只好咬紧牙关，送了四百万元“中储券”去，拿回了四百万元旧法币。无异给李士群敲了一记两百万“中储券”的竹杠，可都不敢哼一声，免得徒损自己的“威望”。

李士群敲的这记竹杠，在内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然不好意思一个人独吞，曾通知我，要我收四万元旧法币给他。我还未曾着手，而他却不知怎地叫叶耀先送来了四万元“中储券”，还叫我旧法币不必再收给他了。这究竟怎么算的？当然不好问，我反正老实收下了。据叶耀先告诉我：分配多下来的钱，李士群自己都作了“特工经费”。其实，谁也不会去问这笔肮脏帐，叶的这句话，反而落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 十四、占山为王的李士群

汪伪江苏省政府的民政厅长蔡洪田，是我们十二个拜把子弟兄中的一个，李士群既在江苏“清乡”，为了就地取材，除签请汪精卫任蔡为伪清乡委员会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外，还叫我

向蔡征求同意，要蔡兼任伪苏州地区的清乡督察专员。蔡深知李的出身是C。C里的一个小特务，委实瞧他不起，当然更不愿受李的指挥，屈居他的下面了。因此，李去找张北生来干，因为张也是伪江苏省政府成员之一——伪警务处长，但李对蔡总不免有些不痛快。恰巧在这个时候，伪民政厅的科长王春元，正在向扬州的伪江都县长潘宏器敲竹杠，挟要五万元钱，否则以撤换相威胁。

王之敢于这样做，以潘系维新政府旧人，后面决无奥援。没想到潘宏器的儿子是陈璧君家里的丫姑爷，于是便由潘的媳妇向陈璧君跟前哭诉，陈又转告汪精卫。汪于是大为震怒，认为这不是“科长”敲诈，而是厅长贪污，否则科长决不敢如此胆大妄为，这时李士群正任伪警政部长，且又在苏州“清乡”，而况蔡又是伪清乡委员会的小组设计委员会主任。于是，便把这件案子交给了李士群去办，这对李士群的占山为王，攫取江苏省的伪主席起了促进的作用。

李士群到江苏去“清乡”，如“项庄舞剑”另有目的。他的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的机构，俨然另一伪江苏省政府，已不能掩盖其司马昭之心了。但觉得用“清乡”来蚕吞江苏伪政权，毕竟太慢，而伪省主席高冠吾又不甘知难而退，赖在那里不走。恰巧蔡洪田的案子落到了李的手里，李认为这是天赋神予，岂肯不就此大做文章？也不管把兄弟不把兄弟。于是，便把蔡来试刀，杀只鸡给猢猻看看，就将蔡洪田扣留起来。李原意拟把蔡关在苏州特工站，后来经我一再向李劝说：“这虽是汪先生交办的事，但我们与蔡终究还是把弟兄，能照顾的地方还得照顾一些，这样李士群总算接受了我的意见，才把蔡洪田扣留在苏州鹤园李士群自己住的地方。

蔡洪田被扣后，李士群便放出空气，说蔡的被扣是为了伪江苏省政府贪污，便把这笔帐轻轻地转到高冠吾头上，一面又把伪民政厅的第一科长王春元捕交法院。这些手法就是压迫高冠吾能



知难而退；一面再由李逆的靠山日寇晴气对高也略施压力，最后，终于把高冠吾撵走了。于是李士群便在“清乡”的掩护下，占山为王，攫取到了一个伪江苏省政府的主席。

高冠吾一走，蔡洪田的贪污案子的责任，全都推到了伪民政厅科长王春元头上。好在王已捕送法院侦讯，已不归他管的事了，蔡洪田也糊里糊涂地给恢复了“自由”。蔡的民政厅长，自己也没脸再做，只好丢掉。过了一个时期，我在蔡洪田的一再要求下（蔡与我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同事，他的投伪，是通过我的关系，这个民政厅长也是我介绍给高冠吾的。再说，又是拜把子的弟兄，因此我就无法推辞了），由我设法通知伪法院，叫人保了出来。一场暴风雨除了帮助李士群捞到了一个伪省主席外，究竟是科长敲诈还是厅长贪污，抑或县长诬告？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哄动了一时的贪污案，还不是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李士群既抢到了“江苏省政府”主席，于是把原任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辞去，汪精卫就要我去担任。李还把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的许多牛鬼蛇神都安插在江苏省政府里，如伪省政府秘书长唐惠民、民政厅长张北生、财政厅长余百鲁、建设厅长陈光中、警务厅长宗志强、保安副司令（司令由李士群自兼）唐生明，这些都是办事处的头头。只有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茅子明，仍是旧人，且这社运分会是丁默村的势力圈，所以没有更动，其它都是新人。委员中我只记得有个廖家楠，他是陈春圃介绍的，李士群以为是陈的人。为了敷衍陈春圃，李最初还主张叫廖当秘书长的，后来还是采取我的意见，起用了唐惠民。最后他还一度任廖为建设厅长，也说明李对陈春圃是极力想拉拢的。

## 十五、大傀儡汪精卫的所谓“出巡”

一九四一年初冬，<sup>①</sup>突然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是伪清乡委员

<sup>①</sup> 应为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

会委员长汪精卫要“出巡”清乡地区了。这时，苏州地区的第一期“清乡”犹未结束，汪的“出巡”显然不是视察“清乡成就”，而是装腔作势去对从事“清乡”罪恶活动的伪员打气的。我是伪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因此作了当然的随员，得以躬与其事。李士群为了对汪阿谀逢迎，在汪经过的街巷乡镇，都张贴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标语；同时还有许多“确立治安和安定民生”的标语。可是汪路过的地方，都由日寇荷枪实弹严密戒备，封锁交通，断绝行人，几处交通路口还架上机关枪。而那些勒令停课、停业，编成欢迎人群，用以点缀热闹的学生与居民，虽叫他们列成了队伍，排着行列，可是执行警戒的日寇，枪口都是对着他们，并强迫他们作着言不由衷、机械般的呼喊口号，这正说明了所谓“确保治安”、“安定民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汪每次“出巡”，都是穿的军装，挂的是特级上将的领章，可是毕竟不是军人身份，无异鲁迅先生笔下的假洋鬼子，有时就会露出尾巴！记得他这次的“出巡”，当他步出苏州车站，对向他“敬礼”的人还礼时，却不是举的右手，而是举的左手，岳光烈还把他摄入了照片，真是出足洋相。

所谓“巡视日程”，早由日寇“清乡指挥部”给安排好。即汽车的次序以及什么地方听取什么人的报告，到什么地方出席什么会议，乃至在什么地方休息，什么地方吃饭，都由日寇为之规定，汪则是按照这些规定，一一扮演而已。

汪这次到苏州，是以狮子林作为行辕，日寇便指在指柏堂上张挂了军用地图，由日寇的“清乡指挥官”堤少将，向汪指手划脚地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主任李士群，与伪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北生，也在这里作了报告。至各伪特别区公署，除都写有书面报告外，迨汪到达这个地区的时候，才向汪逆作口头的报告。

汪在狮子林听取了“报告”后，又由日寇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少将陪同，到苏州公园出席了算是为他举行的所谓“群众欢迎大会”。这些所谓群众，就是在街头被迫列队欢迎的人群，其中大部份是年幼体弱的小学生。

这个会是在细雨蒙蒙中举行的，李士群作了开场白，接着就是汪逆讲话。李就站到了汪的背后，不知还是由于小人“得志”，抑或在中午多喝了几杯酒，一时兴奋过度，得意忘形，竟然在汪逆背后，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引得台下的小学生都大笑起来。这一阵大笑把汪精卫弄得莫名其妙，非常狼狈。也由于这一阵大笑，引起了站在台下侧面的日寇影佐与晴气的注意，急忙叫人把李逆拉下了台，笑声才得中止。好久好久，我还在台上看到晴气那张气得发青的脸，还在台下对着李士群咕噜不休，直到宣布散会。

当晚，汪精卫就住宿在所谓“贵宾官邸”，第二天一早便由苏州乘汽车出平门，沿“竹篱笆”的封锁线和公路先到昆山，再换汽艇到达太仓的支塘镇。据说，这里原是解放区，市面还不错，就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听取了伪太仓特别区公署署长沈靖华的报告后，乘汽艇转回昆山，再乘汽车到常熟。沿途，随处都可以看到汪伪的“和平军”，手擎枪站在桥墩上警戒。

汪在到达每一个“特别区公署”的时候，总是要向伪署长提这么两个问题，即：一、在“清乡”前这个地区内的人口有多少？现在又是多少？二、“清乡”前后的赋税收入？据汪向我们说明，人口与税赋的是否增加，可以说明“治安”能否“确立”。这好像是他独得的秘诀，因此后来伪清乡委员会撤销，我兼任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长时，代表伪行政院出去“视察”的时候，也以此作为“治安”是否“确立”的依据。

## 十六、一件掩盖不了的丑恶

苏州地区第一期“清乡”还没有结束，第二期又接着开始了。本属第一期的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县，原本都不是完整的一个县，其划为“清乡”的地区，则由伪特别区公署来管辖，拦入封锁线内；其未划为“清乡”的一部分，则它的行政赋税、教育建设等等，仍由原来的伪县政府管辖。上面所说的第二期，只是把未划入的部分重又划入，圈进了“封锁线”，变成了整个的四个县区。至其原来的四个伪县政府，由于已失尽了地盘，自然也只有撤销了。

在扩办第二期“清乡”的同时，又在无锡、常州、江阴三县成立了锡武澄地区，分设了三个伪特别区公署：无锡伪署长曹湘，常州伪署长汤卓然，江阴伪署长张一声。但这个地区为了精简，不再另设“清乡督察专员公署”，而由苏州地区的“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兼管，受它的监督指挥。当然也隶属于伪驻苏办事处，并受它的领导。

江苏各县的“清乡”，从时间来说，以无锡为最长，直到一九四三年还在继续；以情况来说，也失败更惨，这是由于人民的反“清乡”进行得更为剧烈。后因伪清乡委员会与驻苏办事处，以及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先后撤销，所谓“清乡”工作由各该伪省、市政府自行办理后，伪江苏省政府为了加强这个县的“清乡”，还在当地设立了一个“指挥所”，由当时的伪省长陈群（李士群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为日寇宪兵毒毙后不久，各省省主席改为省长）自兼“指挥”，并由伪江苏省警务处长宗志强兼伪参谋长，常驻在无锡，就近“指挥”。这时无锡的伪县长，是当初伪无锡维持会会长杨寿楣的儿子，绰号魅徒四官的杨彦斌。

可是这个县的“清乡”曾经公开宣布过“清乡完成”，现在又要“清乡”，又怎样说法呢？连自己也无法说出名堂来，于是

由日寇巧立了一个名目，叫做：“刷新工作”。这倒是黑脸上抹白粉，原想掩丑，结果更出丑了。

### 十七、小鬼搬金钢，畑俊六到嘉兴

一九四二年春，在江苏结束了苏州与锡、武、澄三地区的“清乡”罪恶活动后，所谓“清乡”工作，便由江苏的吴江、松江，向浙江的嘉兴、嘉善推进，同年夏便在这太湖东南三角地区的嘉兴，成立了伪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下设伪清乡委员会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公署。因为这个地区地跨两省，这时李士群虽仍兼着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由于他在江苏“清乡”赶走了高冠吾，自己当了伪江苏省主席，实际上已变成了地区“清乡”的头头；尤其是他赶走了高冠吾这一手，使人人有了戒心。现在在“清乡”的掩护下，李士群要把他的势力从江苏推进到浙江，那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又非傻子，自必全力以拒。但要是由他来担任这个地区的“清乡”，也会为李士群所反对，因此处长人选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后还是日寇决定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把这个地区的“清乡”工作重心，完全放在伪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公署身上，伪驻嘉办事处，只作为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与伪清乡委员会之间的一个承转机关（因为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它的身份只比一般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稍高一点，可是它要与代行伪行政院职权的伪清乡委员会直接行文，显然还是不够，必须还得要有一个与伪省政府地位相同的办事处居间承转，才能适合，否则行文便是越级了）。这样就削弱了办事处的职权，减少了伪浙江省政府的威胁。由于伪嘉兴办事处的职权与驻苏办事处相同，因此处长人选的严重性也给冲淡了。为求消失苏、浙两省争夺“处长”的矛盾，结果由我来担任名义，可是我又不能常驻嘉兴办公，于是由李士群推荐了姜颂平、曹慎修两个人来做我的副处长，替我常驻在嘉兴，而我仍得

以留在南京会里办公。

这地区的“清乡”，仍控制在日寇晴气的手里。大概张北生在苏州地区时很得他的赏识，所以伪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一职，仍调他来兼任（时张本职为伪江苏省民政厅长，除伪专员公署外，还设有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保安司令部，伪司令为蔡进德，与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主任为张修明。除这三个机构外，即封锁检问也没另设机构，而由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负责。

在伪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公署之下，分设了三个伪特别区公署，计：伪松江特别区公署，署长唐克明（原系伪松江县长）；伪吴江特别区公署，署长杨彦斌（原系伪吴江县县长）；伪嘉兴、嘉善（即嘉兴嘉善两个部份地区合并的）特别区公署，署长万宝善（原系伪江苏省警务处科长），它的“区治”设在嘉善的两塘镇。三个特别区的地域，以它为最小，“区治”也最偏僻，交通也最不便。

至于伪驻嘉办事处本身组织与伪驻苏办事处相比，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慨，它只有三个科，第一科职掌总务，科长由伪秘书祝君迪兼任；第二科职掌政治，伪科长程杞瞻；第三科职掌保安队与警察，伪科长为来浩然。

我这个伪处长，虽仍挂名义，可在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看来，还当我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抢他地盘的对手，因此对我不但不合作，而且十分歧视，总觉去之为安。这不仅是他，即在当地的日寇最初也怀有很深的区域观念，帮着傅式说，不仅对我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故意给以难堪。因此我一到嘉兴就给当地的日本宪兵队长触了一鼻子的灰。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日寇是一个海盗民族，可是对繁文缛节却又特别认真，例如请客时，座位上下前后，排错了一点，就会当场闹成乱子；要是你到了这个地方，对地方驻的部队机关不去拜客的话，它就目为你瞧他不起，

那他就对你怀恨在心。所以我到了嘉兴后，便按照日寇的礼节，在日寇军事顾问金子大佐与他的辅佐官有吉大尉的陪同下，偕同了张北生一起去拜会了日寇驻嘉部队联络长（等于一个团长）菊池大佐，接着是日寇驻嘉兴的宪兵队。这队长的阶级是个大尉，原陪同我们的军事顾问金子，因为自己是个大佐，当然不愿去拜会一个军阶要比他小得多的大尉。于是推说上海有事，要赶回上海去，便叫他的辅佐官有吉大尉陪我们去。

我与张北生虽都穿的是便服，可是我是中将，他是少将级的伪官，去拜会一个尉官，太不像样。于是由张北生带我的卡〔名〕片去致意一下就算了。可是有吉却坚持劝我去，还说：“这里的治安是汤本（即日寇嘉兴宪兵队长）负责的，我们住在城里麻烦他的地方多，还是去一次好。”张北生又在旁附和，因此我也一起去了。谁知到了日寇的宪兵队，那个队长汤本，对我与张北生竟连理也不理，这样，连陪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辅佐官有吉大尉也下不了台，终于他和汤本争论了起来，最后闹成了不欢而散。

我受了这场没趣，回到了福音医院（伪办事处所在地）就对有吉说：“你们在这里清乡吧！我明天要回南京去了，再说我在南京原本也是走不开，这里的事情，我受不了，你们偏劳吧！”有吉看我平白无故受了这场奚落，沉不住气，便对我说：你别气，我请畑大将来嘉兴挨拶（日语就是拜客之意），我叫汤本替你看门。我只当他在我面前吹牛，因为日酋畑俊六，不仅是大将，而且是侵华的总司令，还有一个元帅的称号，他怎的会到嘉兴来拜客？第二天我便径自去上海，回南京了，有吉也随即到了南京。

没过几天，有吉在南京通知我，要我翌日和金子大佐以及他一起到嘉兴去。当晚也收到了李士群的电报，说是新任的最高军事顾问松井（太久郎），与驻苏州的日寇小林师团长，要到嘉兴去，要我赶去欢迎。迨我到达嘉兴时，李士群早已带了他伪江苏

省政府的全班乐队去那里了。他是以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资格来欢迎的。

松井与小林是第二天从上海来的。李士群把乐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派到车站去迎接；另一部分则派在福音医院伪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门口相迎，因为他们要去“驻嘉办事处”。在嘉兴这个地方，同时来了两个中将级的日酋还是第一遭，而况当时驻防在那里的菊池联队长就是小林的部下，因此日寇方面的戒备也显得格外地紧张。负责这警戒责任的，当然就是日寇宪兵队长汤本。

当松井、小林来到福音医院，进入伪驻嘉办事处的办公楼时，汤本原也跟我们这一起人的后面，自己也准备跟着进来，可是却给有吉挡在门外，不许他进来。也许这是有吉的辖区，汤本奈何他不得，只好站在办公楼的外面。有吉夺下的大口，算是兑现了一半。

日酋的所谓“挨拶”，只是你吹我捧的一套，松井、小林这次同来嘉兴究竟为了什么？我虽迎送如仪，还是个莫明其妙。据李士群的看法，或许他们是视察军事。这也不过猜测而已，不能据以为信的。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又和金子、有吉到了嘉兴。事前他们没有说明去嘉兴干什么，直到上了车才告诉我说是去欢迎畑俊六的。当时我还有些半信半疑，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大尉可以把一个侵华军总司令提来牵去。可是到了嘉兴，李士群也已到了那里了。照例还带来了那班乐队。畑酋虽没有到，事情是不会假的了，而况有吉还暗暗地告诉我：畑大将是向他搬来的。使我深讶他的神通，当然我也不便进一步去问他。直到事后，我和老牌汉奸谈起这件事，他说日本军队的实权，大都操纵在少壮派手里，所以军队里面的大尉到中佐，他们的实权最大，大佐以上的军人只有盖章的权利，至于大将根本也和“汪先生”一样，只是个傀儡而已。所以一个大尉牵着一个总司令跑，也算不了一件意外



的事。

畑俊六来的这天，到车站去迎接他的伪官，只有李士群和我同张北生，日寇方面去接他只有那个联队长菊池大佐与从南京赶到的金子大佐，有吉、汤本也在场。那天车站与沿途的警戒，仍是由汤本负责的。他经过上次给有吉挡驾后，对我们的态度已有了大的转变，看到了我们便马上行礼了，说明这些家伙，也是非常势利的。至于日本内部海、陆军之间，军人与外交官之间，乃至一般军人与宪兵之间，都是矛盾重重的，有吉与汤本之斗，便是一个例子。

随畑俊六的专车一同来的有松井、小林两个中将。当畑酋下车的时候，乐队便大吹大擂了一阵。畑酋下车后，略与接他的人为礼，嘴里还连说几声谢谢后，便坐上汽车直驶菊池部队，我们这伙人也跟到了那里。随后便分别接见了李士群与我和张北生。

这个接见的场所，是一间不大不小的会客室，畑酋一个人据案向外而坐，他的左右站了两个中将、两个大佐。在他案桌面前，放了一只藤椅，但由于这两个日寇中将都在站班，反使客人不好意思坐下去了，这就像在受审。至于谈话，只由他训话式的讲了几句，我还没有回答，那个引我进去的挂有值日带的副官，又把我引出来。我到了室外，才看到有吉和汤本，都站在室外的屋檐下，说明他们两个别说站班，即连进去的资格也是够不上，因此只好在外面看门了。

会见的时问，只有两、三分钟，便即结束。我们就离开了菊池部队，回到了伪驻嘉办事处。至于畑俊六什么时候离开嘉兴？我们不知道，也没再通知我们去送行。而畑俊六嘉兴之行，显然是有吉玩的把戏，但如何能使他成行，他来了又干什么？有吉在事前事后，都没有向我透露过，我也无从揣测了。

为了这次像犯人般的接见，我在情绪上是很波动的。事后，我曾对李士群说过这样的牢骚话：这样作为客人被招待，我宁愿

作为犯人去受审，倒来得干脆。李对我说，我们能被接见，已是不容易的了。

### 十八、突然夭折的太湖东南第一期的“清乡”

太湖东南第一期的“清乡”地区筹备工作，按照计划原定为六个月，实施时间则为一年。我们的筹备工作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开始的，要到翌年一月才能竣事，谁知在当年的九月中旬，便接到通知要我们赶编报告，准备汪精卫来“巡视”了。当时大家觉得很意外，我虽是个挂名的处长，并未在嘉兴参加实际工作，可是既顶了这个处长的名义，责任自不能不由我来负，现在筹备时间犹未及半，这报告怎样编法？却把我难住了。好在这些事还用不到我亲自动手。

事情为什么这样急转直下呢？我想主要由于伪浙江省政府剧烈反对。因为这时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傅式说，他不仅是个日本通，而且是汪逆与日寇发生关系早期的牵线人。因此日寇驻浙的部队，对傅逆既有私交，又有“公谊”，同时也有一种浓厚的区域观念，因此都支持傅式说，对共同排外起了统一阵线的作用。汤本对我的态度便是最明显的表示。我虽然不是伪江苏省政府的成员，可是名义上我和李士群是在江苏一起“清乡”的，在他们看来，我与李士群都是一丘之貉，无分轩轻的。更鉴于李士群在江苏赶走了高冠吾的教训，傅式说存有戒心。由于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才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我固没有傅式说想的那种念头，可是李士群确有过这样的阴谋打算，所以傅式说的顾虑和恐惧，并非无因。我记得张北生有一次在和我聊天中对我有过这样的表示：要是我主浙，他说他不想再干民政，而想换换口味，想干财政了。他还向我保证，在浙江决不会比余百鲁在江苏搞得那样差。可是他的表示叫我怎样回答？别说我自己没有这种打算，即或有这样的企图，李士群在

我去嘉兴之前，曾向我这样讲过：你到嘉兴去，一定能把事情搞好，不过将来的浙江，我想请你让给也文，因为他与傅式说明争暗斗，已不知打了多少次交道，我们应该帮帮也文，出出这一口的气。李士群嘴里的也文，就是他老婆叶吉卿的面首，是他特工总部主任办公室的书记长兼机要处长，这时他在杭州，任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的秘书长。因为这行营是在杭州，以为这是近水楼台，所以对浙江主席的伪职覬觐已久。由于我对这根肉骨头，并不寄予希望，李既向我具体提出，我自无可无不可，也便慷慨相让。没想到现在张北生向我当面提出要求，确使我受拒两难，可又不便把这个底细向张说明，只好含糊其词，敷衍过去。张对我的态度，自然不会满意。

在汪精卫“出巡”嘉兴前两天，我已赶到嘉兴，有关欢迎的筹备事项，倒也弄得煞有介事。好在欢迎费用二十万，有的是钱，物质上的缺陷，终可以弥补的。我所耽心的那个无从写起的工作报告，居然也编了厚厚的一册，且也印得相当考究。里面的材料从哪里来的，我也不去追问，当然免不了鬼话连篇。我就叫他们摘了几点要点，作为我口头报告的材料。

嘉兴也属浙江，伪浙江省政府主席义属地主，且又是接办驻嘉办事处来的，已于先一日率领各厅、处、局长与委员，浩浩荡荡到了嘉兴，把整个烟雨楼的铁道宾舍包了下来。他这次来嘉是满怀喜悦的，因为解除了他的心腹之患，所以逢人都笑容满面。

虽然汉奸们去迎接汉奸的大头子，是这一撮群丑的内部事件，可是谁能进站，谁不能进站，其权却操在日寇汤本的手里。事前，汤本为了对我表示好感，特来找我商量进入车站欢迎人员的名单，与欢迎队伍的排列次序。我对此既不感兴趣，且又憾于过去他对我那种傲慢的态度，我便推说：我对当地的情况不熟，要他去和张北生商量。结果，伪浙江省这许多欢迎人员除主席傅式说得进入车站欢迎外，其余人员却被列入欢迎的队伍，且还被

排列在日本居留民的队伍之后。这是第二天到了车站后，傅式说告诉了我才知道的。当时我也觉得太不像样，便问张北生，张说：今天的警戒，由日本宪兵队负责，这些都是他们规定的。傅式说本来就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也不用翻译，径找汤本交涉，不得要领。老天偏不作美，又下着雨，这些伪浙江省政府的厅长、委员们都穿着大礼服，可又没带雨具，只好直挺挺地淋在雨里，委实万分狼狈。于是这些人全部拥到车站与汤本大起交涉。正在彼此争持的时候，火车已进入了里扬旗，月台上军乐大作，一刹间汪逆的专车已在进入月台。于是这些人也不管汤本允许与否，全部冲进了月台，这一下倒使汤本无法阻拦，一场不解决的问题也终于解决了。

汪逆仍是穿的“特级上将”制服。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以伪上海保安司令名义，也穿了军服，挂了“中将”的领章，作为汪逆的随员一起来的<sup>①</sup>。因为这时上海也在“清乡”，他说他是想来学点关子的。

汪逆到了什么地方，当然少不了日本人。这时汪逆的最高军事顾问，已换了松井久太郎，当然也少不了他跟着一起来的。

汪下车后，在惨风凄雨中到了伪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先后听取了我与伪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的督察专员张北生的报告后，便又冒雨到当地的体育场出席了所谓“民众大会”。场地既广，人又稀少，雨声又大，又没有扩音设备，我声嘶力竭地作了一段开场白，接着便由汪逆来乱吠了一阵。这个节目只好草草终场，否则溜的还要多，情景更要凄惨了。

中午，由我在“行辕”为他举行宴会。为了怕人民把这些群丑毒死，筵席都是从苏州运来的。可是还不放心，当厨师下锅烧菜的时候，李士群不仅派了特务在旁监视，且烧好的菜都要先给

<sup>①</sup> 汪精卫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到嘉兴“视察清乡”的，随行人员除陈公博外，还有李士群、罗君强等。

李士群带去的化验师、76号特工总部化验室主任姚任年一一检验，然后再端去上席。为了谨慎起见，即上菜的人也由办事处的职员来干，不敢借手外人，以防出了乱子。席上用的酒是傅式说从绍兴民间搜索来的四坛三十年陈的女儿红。该酒虽是泥封依旧，可仍是经过检验的。

饭后即利用“行辕”的客室，由日寇在墙上张挂了军用地图，由日寇驻嘉的联队长菊池大佐，就地图上来东指西划，作了军事报告，一出“巡视”的丑剧，宣告结束。汪等一行人员，当天乘原车回到了上海。李士群与我也随同回沪，算是护送。从此，伪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与其所属的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公署等三个机构，与它下面的三个伪特别区公署，随着汪逆这次的“出巡”，立即办理结束。这个地区的筹备工作就此夭折，所谓实施更无从谈起了。至原属江苏的松江、吴江两县，则划归驻苏办事处；至于浙江的嘉兴、嘉善所组织的伪嘉善特别区公署，则由新成立的伪驻浙办事处飭由其所属的伪清乡委员会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接管，改称为伪“两嘉特别区公署”，继续进行它的罪恶活动。

### 十九、太湖东南第二期与杭州地区的“清乡”

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与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公署等机构结束后，接着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嘉兴福音医院原址，成立了伪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与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专员督察公署。由伪浙江省主席傅式说兼任驻浙办事处主任及封锁管理处处长，另以陈柏年为副处长，以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浙江分会主任张鹃声兼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以伪浙江省政府委员卜愈兼政治工作团团团长。这些机构也都隶属于伪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的。

太湖东南第二期的“清乡”地区，则为嘉兴、嘉善、海宁的

三个部分地区。除原有的县治组织外，设立了一个两嘉特别区公署与海宁特别区公署。

伪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的性质，与驻苏办事处相同，它也是直接指挥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进行罪恶活动的，只是下属机构，没有像驻苏办事处那么臃肿，既没有清乡警察总队，也无税务查缉处、参谋团与和平义勇总队等这些胥枝机构。后来清乡地区向西推进，把崇德、桐乡辟为杭州地区，在沪杭线上的长安镇，另设了伪杭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以浙江省教育厅长徐季敦兼任。伪清乡督察专员也受伪驻浙办事处领导指挥的。

太湖东南第二期与杭州地区的伪特别区公署署长，原则上都由原来的伪县长兼任的。这时，清乡与地方行政，在人事方面已渐渐地混合起来，为今后的清乡改由各该伪省市政府来接办创造了条件。

不过浙东的“清乡”，却不受伪驻浙办事处管辖，因为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政策可说都是“分而治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沦陷地区，也照样施用了这个方法，北平与南京如此，苏南、苏北也是这样，即浙东、浙西也不例外。因为那时的浙东，另设有伪浙东行政官长公署，它在钱塘江的对岸，又是另一天地的独立王国，与伪浙江省政府是分庭抗礼的。日本鬼子要把中国的沦陷地区搞成鱼鳞般地一片一片，主要是为了它分而治之，这是日寇的毒辣阴谋。一般行政都如此，“清乡”自更不例外。

这时的伪浙东行政官长是沈尔乔，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小头头，抗日战争前是杭州的律师。那时浙东的“清乡”地区，只有余姚县部分地区，因此便由原任的伪余姚县长劳××兼任了伪余姚特别区公署署长。因为余姚是伪浙东行政官长公署的辖区，因此伪清乡委员会就任命沈尔乔为伪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处长。它也并不另设机构，只是在伪浙东行政官长公署门口，多挂了一个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的招牌而已，事实上它也指挥不了

那个伪县长劳××，因为他是余姚伪维持会长出身，又是留日学生。他这个伪县长，既不受浙江省政府的任命，也不奉伪浙东行政官长的派遣。他自恃是一个老牌汉奸，他的伪余姚县长是在浙东敌寇卵翼下的又一个独立王国。反正谁都动不了他，因而也对谁不卖帐，只是“服从”日本鬼子。可是“清乡”关系到日本鬼子的切身利益，他对浙东办事处在表面上不得不稍加颜色，虚与委蛇。这倒并不是伪浙东办事处与沈尔乔的“威望”服人，主要他还是为了他的主子的利益。再说他在余姚还是我行我素，不像其他“清乡”地区有一条直线的系统。

据说，日寇之所以要在余姚“清乡”，主要是为了要掠夺这个地区的棉花和盐，也可见日寇之要举行“清乡”的另一目的是为了什么。

## 二十、所谓“清乡”一周年纪念

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以迄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正是敌伪双方在江苏沦陷地区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部分的县，推行日寇的三光政策——“清乡”滔天罪行的一周年。在这一年中，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是助纣为虐的主要帮凶。因此他在日寇的支持下，攫得了“江苏省主席”的伪职，虽然这时的苏北沦陷区并不包括在内，可在名义上还是统辖苏南、苏北的。因此这个以“C.C”小特务起家的李士群，居然以汪伪的特工总部主任而兼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及伪驻苏办事处主任，现在又兼了伪江苏省主席，不仅官运亨通，搜刮得也委实可观，踌躇满志，自以为是“富贵双全”了。也许由于他对“主子”的感恩图报，且以富贵来自“清乡”，于是乘在“清乡”一周年的时候，便大事渲染，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为了增加“声势”，又请汪精卫去开会，西去演说，充分表现了认贼作父，恬不知耻的汉奸嘴脸。

日寇为了配合这场丑剧的演出，驻在阊门外的日寇小林师团部，这天也举行了巷战演习。至于这天大规模宴会，白天晚上都有，一天所费实属不赀。可是这些都是“清乡”地区人民的血汗。像这样在苏州连续搞了两个周年纪念。

### 二十一、居心叵测的“清乡干部学校”

李士群在汉奸群里是一个妄自尊大的狂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路人侧目的，因此他在政治上的欲望，也一辈子不会满足。自从他在“清乡”中抢到了一个伪省主席后，觉得“清乡”这个东西，确是抢地盘的一个最好工具。同时觉得去抢人家的地盘须得有人，且借“清乡”的名义去抢，更得要有懂得“清乡”的人。虽然“清乡”不是一个专门的学问，要是把它能够说成专业化，给它披上一件“清乡专门人员”的外衣，跑到人家区域里，不更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吗？因此他便要把今后各地的清乡人员，由他一个人统包下来，成为他的“第五纵队”，一声要抢，随时可以发动。于是，他把过去各人办的训练班，一律不再继续，由他来统一筹划，开办一个“清乡干部学校”。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消除手下人的争权夺利，抢办训练班，各立门户，分散力量，不能团结，同时受训人员，便可以他为中心，一旦分发出去，都变成了他的子弟兵了。

在一年多的“清乡”罪恶活动中，李士群总结了一些经验，觉得以汪精卫为其开山斧又兼挡箭牌收效很著。于是想到要把自己训练出的人送到各地去，也只有再用汪精卫三字。好在你用了汪精卫的名字，汪逆也决不会来实际过问这种事的，受训的人，也可以用汪逆的名义来分配，于是决定把这个学校办在江苏，定名为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清乡干部学校”。钱虽由“江苏省政府”来出，可是学校是“清乡委员会”办的，因此应由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来兼校长，副校长一职，出钱的伪江苏省政府主席，



只好“当仁不让”了。这样一来，今后学员的出路，作为校长的汪精卫却不能不对他们负些责任了。这既做得漂亮而又实惠的特务手腕，已使汪精卫无法招架，何况还有“太上皇”对李的支持。

一九四二年初，李士群曾对我说，他现在有两件事，希望我择一帮他的忙，余下来的一件，他准备叫袁殊去干。一个是在锡、武、澄之后，开辟一个镇江地区的“清乡”；一个就是筹备这所“清乡干校”。我这时是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以伪官官阶来说，是个“特任官”，镇江地区的“清乡主任”，只是一个简任官，而且是相等于伪行政督察专员这一类的伪官，我有点不屑俯就。同时我好静怕烦，恶劳好逸，要我到现场去“清乡”，我也受不了。可是李既要我先拣，如此竭诚，当然不便全部推却，觉得筹备学校，也用不到我常驻在那里，尽可由我顶个名义，托人去办还是一样。于是我就接受了第二项，便在苏州狮子林原来的“贵宾招待所”，设置了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干部学校筹备处，由我任“筹备主任”，委由我的老部下秦亚修（我长浦东中学时的教导主任，敌伪时期经我介绍任农矿部的参事、林政司长、林政局长）为秘书兼科长，由他负责在那里搞，我只顶下这个名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安排秦亚修，所以筹备处我不知去过一次呢，还是两次？连我也不知。内部人事除我的内兄请他替我设计造校舍外，全部人马几乎全是秦带来的。

我本拟在常熟的窦山脚下或苏州郊外天平、灵岩之间大兴土木，自建校舍，可是校址尚未勘定，而李士群在杭州的另一特务组织“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裁撤了。为了安插从这个“行营”下来的秘书长傅也文起见，李就请我把这个筹备主任让给他，我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照办了。傅为了把自己争取得一个固定的单位，便因陋就简在苏州城内蔡家花园找到了一个停办的教会学校英华女中，略为修建，就招生上课了。正副校长当然是汪精卫和李士群，傅也文就做了教育长，也是李士群在那里的实际负责人。

这个学校的学生虽也在南京、上海、苏州三处登报招考，实际还是大都通过各个“清乡”单位或人事关系收进来的。即是这样，学生中还是有军统”、“中统”的分子，这在学生中间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学生的总共学习时间似乎为一年。迨到应往届毕业的时候，人数已不及一半，大都中途开了小差。所以到了第二期开学时，学生人数已远不如前，即穷极无聊、想通过这里来混口饭吃的人，也为之裹足了。主要原因由于第一届的毕业学员，还有很多人没派到事。

至于课程，只是把从前办过的几个训练班的主要课目都放了进去，集其大成而已。当然五花八门、花色繁多，即《清乡法规》一项，已够你搞得头晕脑胀了。

教育长傅也文，在李士群为日寇宪兵毒死后，伪省长（时伪主席改称伪省长）换了陈群，没了靠山，同时日寇的联络部长又对他不满，不时找他的岔儿，弄得不安于位，只好知难而退。继傅也文之后，是当时的伪江苏省政府清乡事务局长兼江苏省封锁管理处处长孙育才。孙兼这个教育长，可能出自金子的推荐，因为在苏州盛传，这个日寇金子俊治与孙有通家之好，他在孙的家里，可以单独出入闺闼，所以在汉奸群里，咸都把孙视为臭盘里的臭盘，败类中之败类。可在金子的心目中，孙育才就是他的好朋友。后来陈群下台，伪省长换了任援道，任在履任之前，当然早已听到孙育才在苏州的这些肮脏丑事，为使自已这副班底不要太不像样，曾向人表示坚决不再留孙。大家以为任援道以军人（任原系伪维新政府绥靖督办，汪伪的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伪海军部长）从政，当然可以硬一些。不意任逆犹未走马上任，日寇的江苏联络部长金子俊治，却移樽就教到南京来欢迎他了。金子明虽欢迎，实质是来与任援道开谈判的，谈判的条件就是要留孙育才，不但要留，并且还要调任孙为建设厅长。本来孙留任已感困难，现在

再要任把孙改为建厅，当然更不愿意。金子就摊开来对任说：“我们能否再度（在任逆任伪维新政府绥靖督办时，金子就是他的军事顾问，现在是第二次，所以称“再度”）合作，就看你能否卖我这个面子为先决条件。任一转念：拒绝了就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会因此丢“省长”。虽说自己手里带有兵，究竟还硬不起来，两者衡其轻重，只好当场屈服。看到金子对孙的卖力，可以肯定地说：不仅孙育才这个教育厅长出于金子向陈群介绍，即傅也文被迫去职，也是金子有目的施加压力的结果。

孙育才调任建设厅长以后，原任的“清乡”职务，当然全部去掉。伪清乡干校的教育长一职，任援道就叫他的宜兴同乡丁雨材去接充，这个伪职，丁一直做到日寇投降。

一九四三年五月，伪清乡委员会撤销，所有“清乡”工作，改由各该伪省市府自行办理后，这个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的清乡干部学校，也应该同归于尽，或者干脆由伪江苏省政府撤回自办。可是李士群为了要贯彻他的阴谋计划，仍把汪精卫拉住不放，伪清乡委员会虽然取消，可是伪行政院却设有清乡事务局，好象整个“清乡”工作由伪清乡委员会移交给行政院了，于是便把这伪清乡委员会清乡干部学校改头换面，改为伪“行政院清乡干部学校”，所以仍以汪精卫为校长。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了伪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这个伪行政院清乡干部学校校长一职，自也照例地由陈逆来承袭了下去。陈因憾于虽是校长，可对学校情况全不了解，不是办法，于是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以伪江苏省长、伪教育部长及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长为常务委员（我还兼该会的秘书长）。当然还指定了几个委员，想借以沟通一些学校情况。可是大家由于忙，这个校务委员会自成立后开过了一次还不知是两次的会，也就无疾而终了，所以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大家还是莫知西东的。

这里我还想补说一点毕业学生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李士群在生前把伪清乡干校的学生，是曾寄以幻想的，他确想把他们训练成为他们的第五纵队。谁知这批人还没有毕业，日寇因嫌李士群已是尾大不掉，由日寇的宪兵特务给他吃了牛肉饼，饼里放下了阿米巴菌，把他毒死了。迨这些家伙毕业，所谓“清乡”工作，已由“中央”改由各该伪省市府自行办理了。但他们毕业的学校经费，虽出自伪江苏省政府，名义总是属于伪中央的，于是伪清乡干校就把他们送往南京伪行政院，请它分发。伪行政院也无法拒绝，于是只好一纸“命令”，随令分发到各省市伪政府。可是各省市也知道这些家伙，都是特务头子李士群手下训练出来的一批牛鬼蛇神，虽然李士群已经暴死，但谁也不愿在自己家里放着这样不安全的东西，而“行政院”的命令，又不能不接受，于是好像同行公议般的大家敷衍了二、三个月，先后借故把这些人打发掉了。所以有些学生觉得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只博得二、三个月的工作，未免太不值得，只好另谋出路。有些则回到学校与伪江苏省政府纠缠。他们也觉得上面的门已堵塞，只有向下而各县各区去硬塞。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还是坚决主张继续办下去，所以第二期的招生更困难了，学生人数也更少了。而各省市伪政府为了进行“清乡”罪恶活动，所需的中下级干部，宁愿自己开班训练，决不向伪清乡干部学校伸手，这决非李士群生前所能料到的。

## 二十二、周佛海在“清乡”地区的一夜秘密

在敌伪时期的周佛海，是仅次于汪精卫的一个大汉奸。汪精卫虽一再捧陈（公博）抑周，在周佛海自己看来，他决不低于陈公博。至于汪逆的捧陈抑周，在伪清乡委员会有过这么一段经过：在伪清乡委员会里，周、陈两逆都是副委员长，虽然并不实际与闻会务，可是我们送给伪委员长汪逆的签呈或报告，按照公文书式，在最后写到“谨呈委员长汪”之外，总是附上一笔“副委员

长：周、陈”这几个字样。我们把周写在陈的前面，当然是有所根据的。我们认为：敌伪双方签订的《清乡协定》，规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由日寇负责，七分政治由汪伪政府担任，所以汪逆首先是以伪行政院长，而后才以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两重身份来兼伪清乡委员会的委员长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伪清乡委员会是去推行七分政治的一个机关，我们把原任伪行政院副院长而兼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周佛海，写在陈公博的前面，觉得并没有错。至于我们思想里，由于我们过去都是“C.C”，而现在又是拜把子弟兄，所以我们要把周捧在陈公博的前面。这个内心活动当然说不出来，更不好暴露，别人也无从知道的。自问也没错。可是汪精卫却大不为然，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士群和我，要我们今后上的签呈报告，对“副委员长”应该按照他原来开给我们的名次来排列。我把原件找出来一看，确是陈先周后。由此看来，汪的捧陈抑周，是处处留意的。

由于周佛海把自己看得仅次于汪精卫，又看到汪逆对日寇所主张进行的“清乡”吹捧卖力的劲儿，自己觉得虽是副委员长，也未便过于落后，失了主子的欢心。为了向日本主子献献殷勤，因也自告奋勇要视察“清乡”地区了。当然，这样又把在江苏“清乡”地区的大小汉奸忙乱起来。其视察日程与迎送仪式，虽没像汪精卫来时那般兴师动众，可也差不了多少。

汪精卫是个伪“元首”，所以即以委员长的身份来苏州，也名之曰“巡视”。周佛海毕竟不是伪“元首”，所以只能称之为“视察”，坐的汽车虽同为装甲的保险汽车，可在周的汽车前却没有伪元首的标志和旗帜。

周本来也有一个日本顾问，叫做冈田，那时还是个大佐，可是只管财政金融，与“清乡”无涉，所以没有跟了来。在“视察”时间的联络工作，概由日寇的江苏联络部长中山代之。

周佛海到了苏州<sup>①</sup>，当然也身不由己，由日寇和驻苏办事处为他排定“视察”日程，昏天黑地跟着乱钻一阵，也要他出席了所谓“欢迎大会”，对“清乡”作了无耻的狂吠乱捧；又先后听取了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主任李士群和伪苏州地区督察专员张北生及吴县特别区公署署长蔡锐等所作的工作报告，仍由日寇“清乡”指挥所的指挥日酋堤少将，在狮子林指柏厅张挂了军事地图，指手划脚地作了军事报告。当晚就在指柏厅上设宴招待。

这个堤少将，是日本北海道的鹿儿岛人，听说周逆过去留日时也在鹿儿岛呆过，自以为也是“他乡遇故知”了。加以多喝了几杯黄汤，一时兴发，叫人拿笔砚纸张来，老着脸皮，当众“挥毫”，把既不像字，又不像画的字，每人送了一张。我拿到了一份，上款写的是“汪贤台”，下款除题了堤少将三字外，还照他的“尊容”画上了一个鬼像。最突出的就是他的两片人丹胡须。可是，还深恐有人假冒，便把又短又胖的手掌，往砚台上一掀，拿出来在这只鬼脸像下面捺上了一张手印。送完以后，好像余兴犹浓，干脆就把上身衣服脱个精光，下体仅留了一块遮丑布，用笔在小肚子下，又照像画了它自己一张鬼像，而且画得维妙维肖，一看他的画就认识是他。于是叫人把抬子拉开，便在当中跳起舞来。后经他跟来的副官一再婉劝，才勉强穿上了衣服。当晚周佛海就宿在狮子林的“贵宾官邸”。

第二天从苏州出发到昆山，就在山麓的一所大厅里，听取了伪昆山特别区公署署长严明的报告，在那里吃了午饭，饭后游了山，继续向太仓进发。太仓的伪特别区公署署长沈靖华，原安排我们住在当地耆绅汪曾武（与汪精卫是留日法政同学，曾任汪伪江苏省政府的秘书长）的家里，当然拣最精致的一间房间，让周佛海睡。可在入睡之前，李士群却要我睡到周佛海的房里去。我就问：“那周呢”？李说：“另有地方了。”我想这或许是为了周的安全

<sup>①</sup> 到苏州的时间为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

问题，也就不再追问，便睡在周的房里去了。第二天才破晓，李士群才陪同周佛海回来了。于是会同大伙儿沿着公路续向常熟出发。

伪常熟特别区公署署长王昆山，虽非本地人，却是常熟的恶霸，做过常熟的伪警察局长。李士群用他来做“署长”，只是易于为非作歹。

在常熟又是一篇照例的文章后，周佛海的视察“清乡”就算结束。这两天来虽然食则盛宴，出则汽车，可是由于平日惯于“养尊处优”，又复嗜毒好色，加以仆仆风尘，已使他深感吃不消了，便径自回到了灯红酒绿的上海，又在小玲红那里，度他荒淫无耻的生活了。

这个小玲红，是黄金大戏院的坤角儿，因被邀到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去演堂会时，为这个老色鬼周佛海所“赏识”，乃由吴世宝（汪伪特工总部的警卫大队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杀人魔王）出头，把她硬拉给周佛海，作为周的外室。虽曰小公馆，可是仆从如云，气派不小。周佛海因为在南京的时间多，对这个家的家务，无法兼顾，于是就托上海市复兴银行的总经理孙曜东代为照料。孙得了这么一个好美差，认为这是攀龙附凤的好机会，当然全力以赴，马屁唯恐拍得不周。除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日常生活外，还请了两个教师，一个教她文化，一个教她钢琴。事为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所闻，就把对小玲红的一股酸气，完全弄到孙曜东的头上。于是叫一个名叫李一民的流氓，拿丹佬（人粪）给孙曜东吃。孙一时不备，嘴里给李塞满了黄昆山。这个流氓因此得杨淑慧之力，做了包打探。杨对孙曜东总算出了一口鸟气。可是在她看来，祸根毕竟还是小玲红，颇有“卿不死，孤不安”之意，于是要76号另一个杀人魔王林之江去暗杀小玲红。林受此委托，觉得讨好杨淑慧，还不如讨好周佛海对自己有利，于是便把杨淑慧托他的事，偷偷地告诉了周佛海。周就把小玲红连夜搬家，林

便以找不到对象回复了杨淑慧，小玲红得免遭毒手。

孙曜东为了小玲红吃了“丹佬”，尝了异味，周深觉过意不去，于是后来把孙放一个上海金子交易所的监理官，一面还叫孙替他做金子生意。由于黄金的价格做高做低权在孙手，不论自己做的是多头（买进）、空头（抛出），都没有不赚钱的道理。因此，孙不仅替周佛海赚来了很多的钱，他自己也发了财。据孙自己约计，最多时有过五千根条子，真是骇人听闻。孙有此多金，周佛海当然更可观了。由于孙替周捞了许多的黄金，即过去请孙曜东尝异味的杨淑慧，也把孙看得亲如家人了。

周来上海只能偷偷地耽搁一两天，便赶回南京。不久，便听到杨淑慧在逢人大骂“清乡”与李士群。原来，周佛海患有“寡人之疾”，这是李士群所深知的。周、李之间，虽有疙瘩，毕竟没有面红耳赤，表面上还维持着把弟兄的关系，因此周来“清乡”地区视察，李颇思投其所好，一献殷勤，以冲淡过去的愉快。可在苏州人事复杂，耳目众多，为使周佛海不虚此行，便派专人到沪，找了一个交际花之流的女人，暗暗地把她送到太仓。可是把她带到周的住所汪曾武的家里去，总觉得不甚雅观，只好要她在旁的地方“敬谨候教”。那晚要我临时搬到周佛海的房间里，而把周搬到另一秘密所在处，就是李士群为周佛海导演的一出“奇双会”。不意，周在客地春风一度，“视察”完毕，竟带着“赠品”回去，到了南京，害起花柳病来了。这事当然瞒不过杨淑慧，于是杨就见人大骂“清乡”，大骂李士群。一夜秘密就此揭开。原来周佛海去“视察”清乡，就是如此这般。

### 二十三、一场活见鬼的“视察”

大汉奸汪精卫，认贼作父，甘为元恶大憨，固由于它的本质，但汪逆的老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汪逆曾几度“出巡”，周佛海也到“清乡区”去跑了一趟，陈璧君的“视察”也算帮他丈夫



向日本主子丑表功。于是她也率领了一些女兵女将，如褚民谊的老婆、曾仲鸣的姨姨等，来到苏州，也说是来“视察清乡”，但并没大吹大擂。因此，这些从事“清乡”的大小汉奸，既不必向她作报告，也毋须为她召开群众大会，说穿了就是在苏州、常熟两地僭名玩了一次，回去的时候还带了大批土产与古董。这一点东西，李士群是决不会吝嗇的。

陈璧君对古玩鉴别力很强，她对每一件古董，都能说出一个道理来。如以玉器来说，这是汉玉，出自谁手，出土多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即老奸巨猾的古玩商，也不能不对她佩服。这也许是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也可想见她在这方面花钱委实不少了。可是她对每一件所爱的古玩只是还价，从没有一件成交的，好在这些没有成交的古玩，也没有一件不到她手里。因为是我陪她去的，过后我还不是叫人买下，马上叫人送去。钱虽不多，也看出了陈璧君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在一九四三年的清明前后，汪精卫叫人打电话给我，把我找去，对我说：“夫人要到杭州去‘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汪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去的。”我听了，就体会到：陈璧君是不愿意以“妻以夫贵”来炫耀自己，所以要用伪中监会常务委员的名义，以示她有独立人格的。因此我说：先生的意思我懂啦，不知还有那几位随员？汪说：我想请人鹤（伪内政部长陈群）、李李（伪陆军部长叶蓬）、春圃（陈璧君的堂内侄，伪行政院秘书长、元文（伪外次陈元文）、昌祖（陈的内侄伪航空署长陈昌祖）和褚夫人（褚民谊妻子）、曾夫人（曾仲鸣妻子）、林夫人（林柏生妻子）、曾委员（曾仲鸣胞姊，伪中央监察委员曾醒）她们一起去。我又问：那里起程？杭州方面是否需要我去联络？汪说：从上海起程，筑隐（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傅式说）那里，我叫人通知他。我说：交通方面由我来联络，其它事务我和春圃商量。于是我辞了出来，就电报打了

给李士群，因为他是伪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并要他电飭沪杭沿线的江苏各县，“欢迎”的标语应用“陈委员”，不得用“汪夫人”字样。一方面我向陈春圃询明了动身日期与上下车的车站，由伪清乡委员会向华中铁道定了一节往返沪杭的专车，并派定了一些在车上警卫与侍应的人，我的事情算是了啦。

汪精卫在上海的住所是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即王伯群娶了他大夏大学（王是大夏大学校长）的校花保志宁后，金屋藏娇的那幢大洋房<sup>①</sup>，所以那天选定在西站上车，取其近也。我因代表伪清乡委员会做主人，为了便于照料，不得不早一点到西站。接踵而来的是叶蓬、陈群。其余的人非亲即戚，至少也得是广东同乡，大概都在一一三六弄集合后，随着陈璧君一起来的。除汪精卫告诉我这些人之外，还有汪精卫的侄子、侄女，汪的女婿何文杰等，此外还有各人的副官保镖，人数颇为可观。

这天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应伪浙江省政府邀请，去杭州讲学，也在西站上车。陈璧君一眼瞥见了樊，便对我说：“汪先生，樊仲云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我只好回答了一个“噢”字。我觉得没有上车就给了我一个难题，这明明是要我不让樊仲云上专车，可是大家都是熟人，叫我怎样把他挡住呢？我正在犹豫为难，陈春圃又暗暗地来对我说：“夫人”叫我通知你：仲云不是跟“夫人”一起去的。我说：也对我说了，我正在为难哩！陈好像同情，又是感叹似的，随说了一句：你确实做难人了！并向我作一个会心的苦笑，走开了。陈璧君固不让樊仲云上她的专车，可是陈允文他们却与樊仲云谈得很有劲。这时车已靠站，当然大家先让陈璧君上车，这时，我对樊仲云不让他上这专车还没有想出办法，樊倒颇为知趣，想到前面的头等车厢里去，没想到陈允文却拉住了樊，还连说：上这里一样的。樊以陈允文这般殷勤招呼，感到盛情难却，便也跨上了专车。我既无从阻止，也没法拦住，只好

<sup>①</sup> 即今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

闷声不响，随众上车。陈春圃看到了，又对我作了一个苦笑。

这辆专车平时也是汪逆出门时乘坐的一辆特别的火车。它分三部分，一部分辟作两间半的包房，居中三分之一装成了一个沙发的客厅，余下的三分之一，是一般红绒软席的头等车厢，陈群、叶蓬、陈春圃和我这些男的随员，以及樊仲云都坐在这里。我还尚未坐定，陈璧君从包房里出来踱到客厅，看她的情绪还带有一些怒恼的样子，看到了我便说：汪先生，我们的车子、房间车厢，都给人家占了，那又何必包一节呢？买几张普通的车票，还不是一样？我听了也觉得奇怪，车厢里除樊仲云之外，怎么房里还有人？于是我又回身到几个房间的门外向里面一一去张望了一下。呵！呵！那个半间头的包房里，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正安坐在那里。这时车子早已开行，我就叫我的外事秘书把车长（日本人）叫来，我便在包房口的穿堂里质问他：“这节车厢是我们清乡委员会包的，你们怎的把普通的旅客也引进到我们车厢里来？”他说：没有呀！我就指着这半间包房说：“那么这个房间里的客人呢？”那时我真不好意思向一个外国人这样发问，可是不装糊涂又咋办呢？他似乎感到意外般地回答我：那是你们政府的考试院长呀！我只觉得我的脸上在发热，暗叫惭愧！可又只能硬着头皮挺下去。我说：“不错，我也认识！可是今天他不是和我们一起的。”我把话说清楚了，他也感到有些诚惶诚恐。他说：“这个我们没弄清楚，我以为你们是一起的，所以在北站上车的时候，就引他到这里。无奈这条线上的头等客车是没有包房的，他又是一位院长，既请他进了包房，自未便请他搬到普通的头等车厢里去。好在只有半个房间，你们又是自己人，且路线不长，一回儿就到，可否就这样吧？”他的话亦含有讽刺，可也讲得婉转，不这样做，不是粪缸愈掏愈臭？要不是陈璧君气度狭小，谁愿意来讲这些丑话？于是我只好把话转过来，说：“当然可以，我们只是要把事情说清楚而已。”他便连称谢谢而去。事后，我想他在日本人之间，决不会不把这

段丑事，当作奇闻奇事来谈的。同时，我只好加油添酱地去回复了陈璧君，告诉她江亢虎是在北站上车的，车长以为江院长也是“陈委员”的随员，且又是一位院长，所以才把他引进到这个半间头的小房间的。经我责问以后，才知道弄错了，可是江又是一位“院长”，不便请他再搬，好在这个小房间，我们也用不着，“夫人”就赏给了他吧！这时陈璧君即气量再小，也说不出一定要江亢虎搬出去。可是还表示一点不愿意，随对我说：“可是我们到杭州后，你对新闻记者必须说明这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来的。”我只能回答了一个“好”字。但我觉得江亢虎学问很博，可也够颟顸了，这节车子是谁坐的，应该使他知道，免得再出岔儿。

（敌伪时期特任以上的伪官，不仅乘火车有长期免票，且得不受检查，江亢虎就凭借这种关系，不时往返沪宁做头等车帮。有一次汪精卫也是为了“巡视”清乡地区，从南京车站附挂了一节专车出发，南京的日寇宪兵为了加强戒备，对乘这次列车的头、二、三等旅客，一律严加检查，恰巧江亢虎也搭乘这次列车来沪，虽以“院长之尊”，可在这次也不能免于检查。谁知不查则可，一查就当场出了大丑。原来，江亢虎带的两只大皮箱，里面装满了猪鬃，这是军用物资，当时是绝对禁运的。这要是普通的老百姓，不但东西要没收，人也要被扣的。大概日本宪兵为了江是伪院长，这天又是汪精卫的专车，又挂在这次列车上，扣押了江亢虎，无异撕破了汪逆的脸皮，于是叫随江来送行的人，把这两皮箱猪鬃带了回去，可也出尽了洋相。）于是我拉开了这个小房间的门进去看江，江就起来与我握手，问我：“哪里去？”我说：“杭州，你也……？”江说，是的。我随说：“你这次去杭州，机缘很巧，居然给你坐到包房。”江问：“怎么？”我说：沪杭路上的头等车，是没有包房的，这节车是我们“清乡委员会”包给“汪夫人”坐的。而你来得其时，车长以为你和我们是一起的，所以把你引到了这里来。江说：“那我沾光了。”我说：“那是你沾了汪夫人的光！”我因目

的已达，遂说了一声：“回头有空再谈吧！”就退了出来。

过了不久，那个日籍车长却拉了我的外事秘书来找我了，并对我说：“有个和尚要找‘江院长’，咋办？”我听了就有一点恼火。虽然我也听说江亢虎是惯吃十一方的（在旧社会里和尚是什么人的东西都要吃的，所以算是吃十方，而江亢虎连和尚的白食都要吃，所以说他是吃十一方），但在今天的场合里，在汪精卫老婆的专车上，弄个和尚也来侧身其间，总觉得不像个样子。可又不能不使江亢虎晓得，因此我在情绪上也有些冲动，拉开了江亢虎这间小房的玻璃门，便以质问的语气对江亢虎说：“老江，怎么会有个和尚来找你？”我的打算，希望他能从我的语气里来理解我的意思，把和尚拒见就算啦。我想江不会不理解我的意思。谁料他比我更为狡猾，便对我说：“是的，对不起，就叫他来吧！”这一下我没法招架了，又不好意思不让他进来，于是只好叫车长把那个和尚找来。原来他是常州清凉寺的当家，他是江亢虎约他同到杭州去的。我就对他说：这挂的是辆专车，你要来和江院长讲几句话是可以的，但过了嘉兴你应即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我是深怕他一直坐到杭州，那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汪精卫老婆的专车里，钻出一个和尚来，实在太不像话，所以这样关照他。他接受了，才放他进去。幸而这个情况，陈璧君和随行的女将们，谁也没有看见。

车到嘉兴已进入了浙江省境，伪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主任，亦即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傅式说，率领了浙江封锁管理处长陈柏年与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张鹏声上车来“欢迎”。陈璧君便在沙发客厅里接见了他们，我便乘机当着陈璧君对着傅式说讲：“江院长和樊次长并不是和‘陈委员’一起来的，我与杭州新闻记者无一相识，所以只好请你代为声明一下，以免报道错误。”这一来我算闭门推出窗前月，卸掉了责任。可是第二天的《杭州日报》刊登的“陈委员”莅杭新闻的随员名单里，江亢虎与樊仲云

的名字，还是赫然在目，而且江亢虎凭着“院长”这两字头衔列为“首名随员”。傅式说知道了，便关照别把报送给陈璧君看，陈虽要过两次，都给傅支吾过去了。

车过临平，还没有见那清凉寺的当家和尚从江亢虎的房间里出来，我又不好意思进去把他叫出来。于是我把这经过告诉了陈柏年，并对陈说：“我与江是熟人，不好讲话，你同江既不认识，且这里又是你们浙江的地方，为免得到杭州闹出笑话来，你该多负点责任，就请你进去，把那个和尚撵出去！”陈说：“出了事咋办？”我就干脆回答说：“我负责任”！陈立即拉开江的房门，指着那个和尚用命令般的口气说：“你立刻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陈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确使江亢虎下不了台，便怒冲冲地责问陈：“什么理由！”陈更声色俱厉地说：“不用理由！”这句答复，即凭江亢虎读书再多，也是有理说不清了。那个和尚一看双方的情形，深怕闹出事来，便也抱头鼠窜地回到前面自己的车厢去了。我想，这一下可以平安地到达杭州了。

车到杭州城站，事先已由伪浙江省政府社运分会与杭州市政府勒令民众团体、中小学生与附近居民到车站及其经过地段列队“欢迎”，因此车站上居然也表面挤满了人。迨火车靠站渐渐停下，陈璧君在军乐声中起身下车，移步准备出车厢门，接受“欢迎”，一尝她自我陶醉时，却突然止步，退了回来。大家也只好跟她停着。只听她气呼呼地回过头来对我说：“汪先生，我不下车了，我要原车回上海！”我听了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急忙向前一看，啊！又是江亢虎。原来他不知趣地走在陈璧君的前面了。这样一来，陈璧君来杭州的这一点风头岂非给他占了去？所以盛怒之下，高嚷不下车，要回上海了。

我一看时间迫切，不能再待，否则江亢虎就要下车了。于是便先把江叫住，随即赶过去把他拉回自己的包房，把他往房里一塞。江问：什么事？我说：我有话同你讲。当即我把房门堵住，才

回身对陈璧君说：“请吧！”这时她才又启步下车。或许江亢虎还在等我和他说话，可是我没有时间再理他，随着大伙儿乱哄哄地出了车站。

说来也可怜得很，一个“浙江省政府”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机构，只有两辆汽车，而且一辆还是杭州市长的，实际只有傅式说坐的一辆。这天为了迎接“贵宾”，想尽办法，从别处去借了几辆汽车。可在沦陷时期的杭州，能借得出小包车的委实太少，所以虽借到了几辆，还是人多车少，不敷应用。因此，当陈璧君等一行步出车站时，谁与谁坐在那一辆车子，还没有排定。傅式说自己也感到窘态毕露，但又不能老是站在那里等。倒是陈璧君找些话来对傅式说说：“我是来慰问大家的，没想到反而惊动了这么多的人，内心真是不安。”显然这是言不由衷。我为了帮助傅式说打开这尴尬的局面，便乘机对陈璧君说：“陈委员要不要走几步和大家见见面？”陈接纳了我的建议，总算替傅式说解了围。

我们才走过车站广场对面的茶馆，还没有到杭州第一舞台，后面车子的座位大概算是排好了，于是傅式说对陈璧君说：“前面的队伍还长哩！还是请‘委员’上车吧！”而陈璧君的几步路，原来也是装点门面，以示她能深入群众，与人民接近，现在走也走过，门面也已装过，再走下去也雅不愿意，听了傅的话，便停了脚步，钻进了汽车。

陈璧君坐的是一辆保险汽车，是汪精卫上次到杭州去时，汪伪特工总部替他预备的，后来就留在杭州区，以备李士群来杭时乘坐的。是一辆新型别克牌轿车。伪浙江省政府原替陈璧君预备的倒也是保险车子，平时是傅式说自己坐的，可是式样既旧，又是一辆老式福特，别说是坐，即给陈璧君看了，也会生气。现在杭州区既把这辆车开了来，当然是分配给陈璧君。至于谁能伴陈璧君，陈在火车里已告诉了傅式说，指定要褚民谊与曾仲鸣的老婆排在她的车子里。傅一下火车就通知了排汽车座位的人，并

把他自己的老婆章慕君也排在陈的车子里，以示奉陪。不过四个人坐在后面，不仅太挤，也太不像样，于是只好坐在前面司机的左首。陈当场就对傅式说夫妇说：“不必了，就请汪先生坐在我车子里吧！”于是我就代章慕君占坐了那个位子。

车子把我们送到了孝女路傅式说的家里。因为人多车少，当然都坐得挤无可挤的，有些人可能还是第二批车子来接来的。至陈璧君和我们带去的“副官”、保镖，势必坐不到汽车了。可是陈璧君的副官谢曜却恼了火，一到孝女路傅家便破口大骂：丢你拉妈屁的省主席，吊的省主席……”傅式说夫妇虽也亲自听到，也只好避开，置若罔闻了。事后有些人说傅的耐性比乌龟还强！

这天午饭吃得较迟，饭后傅式说就把陈璧君和我们这一起人全都安顿在里西湖的西冷饭店。这里已是在日寇警戒线之外，所以伪浙江省政府不得不临时加派了警察与保安部队，以资戒备。特工总部的杭州区，也在饭店里外加派了特务，把一个宁静的西湖，弄得杀气腾腾，紧张万分。大家就在那里稍事休息后，便又跟着陈璧君到了伪浙江省政府，在那里晃了一下，连坐都没坐，算是“视察”伪浙江省政府，也算向当地的主人拜客，便又一起到了孝女路，出席了傅式说特为她举行的“欢迎宴会”。

陈璧君是个华侨，出身于资产阶级，平日养尊处优，讲究吃喝玩乐。这次虽说是去“视察”，可是她在火车上便已向我提出：“汪先生，你是杭州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好好地介绍一些杭州的风味给我们尝试。”我说：“著名的吃食店虽有，地方太不行。”陈说：“我们又不是吃地方，只要好吃，摊子也行，我也深知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我说：“那我就好办了，我就请‘夫人’试试我们的杭州菜与杭州面。”事情谈过后，我像欠了一笔债，时刻地嘀咕在心上。不意当晚在宴会席上陈璧君就对傅式说说：“我这次来杭州只受‘省政府’今晚的一次招待，其他的一概谢绝，今后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来安排，不用主人为我们费心了。”



傅式说听了以为嫌他伺候不周，有些诚惶诚恐的样子。我把陈璧君在火车里说的话，告诉了他，他才稍稍宽心。其实，陈对傅式说这次对她的招待，以手面排场来说，确是不够满意的。

这晚的客人除我们上海去的一伙外，还请了在杭州的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秘书长傅也文（亦即汪伪特工总部的机要处长）、第一方面军第二军长徐朴诚，这两个人算是陪客了。

宴会散了后，陈璧君便带了这批女随员与女婿、内侄等，径回西冷饭店，而陈群、叶蓬、陈春圃与我及傅也文，却给徐朴诚拉到了他的家里去。

徐朴诚把我们拉到他家里去，不是无目的的，主要想通过陈春圃的关系，要请陈璧君吃顿饭。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南京伪将校训练团毕业的学员，这个“训练团”团长是汪精卫，也就是他的老师，那陈璧君就是他的“师娘”，现在师娘到了他的防地，他岂能不招待一番，否则有失“弟子”之理？这些肉麻的话，叫人听了毛骨直竖。他是不是真的怕失“弟子”之礼？当然不是，相反地却是要拿这次请客来抬高自己，使人知道，汪精卫老婆到杭来除伪省政府外，接受私人招待的，只有他一个，使人可以想像他与汪精卫的关系，从而更可以使他多了一重资本。徐朴诚向陈春圃提出了这个要求后，陈马上回绝说：“这个，我无法效劳，你方才不是亲自听到‘夫人’说过，除接受省政府的一次招待外，其它一概谢绝吗？叫我怎么再讲呢？”徐说：“不错，我也听见，但总要你替我想个办法。”陈给徐逼得没有办法，没想到竟向我身上一推说：“你托曼云想想办法看。”徐果然转身来缠住了我。

我看陈春圃虽把难题推到我身上来，可是态度却是真诚的。因此我说：“要预先说明请她，我没办法，要是事后请，或许可能有望，也说不定。”陈群便问：“怎么叫事后请？别卖关子，把事情说清楚。”我说：“这样讲，是我手里捏有一张王牌，本来明天晚上我准备陪同‘夫人’和各位到王顺兴去试试我们的杭州菜，朴诚

也是我原本要邀请的陪客，现在朴诚既要强作主人，喧宾夺主，我也可以礼让为由，是否能够让成，只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现在姑且向谋事在人的方向来进行。明晚在表面上还是先由我作主人，请朴诚作陪，朴诚不妨叫你自己的厨师做几色精心拿手的菜，可不要多，有三四个大菜就够了，其他的菜都是用王顺兴的，这样也使大家能多尝到一点我们杭州的风味。在我敬酒后，你徐朴诚也敬敬酒，我就替你特别介绍一下，说你是汪先生的学生。饭后你就把王顺兴上下的帐一人付了吧。因为明晚为了便于现场警戒，我是把王顺兴上下都包下来的。当然，我不能叫你这个主人请请客在暗里坐着，在临走的时候，我告诉她今晚的帐给徐军长抢会掉了，这样她即是不接受你的招待，东西已吃下了肚，也没有办法了。好在‘夫人’也会知道，在这里抢会帐，我是抢不过地头蛇的，这样‘夫人’也不会怪我。你既如愿以偿了，我也逃避了责任。”说得大家都笑了，事情就这样决定。我随即与傅也文商量，要他明天早晨去参加“群众欢迎大会”之前，把奎元馆面馆上下都包下来。除楼上留出一部分坐位外，空下的都由自己手下特务充吃客，把它坐满，晚上王顺兴也是如此。他们要吃什么尽量点，好在有“徐军长”请客，用脱两铤不在乎。说得大家又笑了。等到我们四个人回到西冷饭店时，陈璧君等她们早已入睡了。

翌日清晨，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乘着汽车大伙儿拥到了奎元馆。这时楼上下果已吃客满坐，只有楼上一角，还空着四、五只台子，正够我们坐。虽说是吃早店，首先搬上来几只冷盆。陈璧君胃口很强，一个人吃尽了一只红烧羊头和一碗半面，冷盆还不算在其内，是男女食客中胃口最大的一个。她感到很满意，主张明天再来。

陈食量固大，小便也繁多，一顿点心的时候，解了两次小溲，且每次不是到厕所里去，即在席前叫人拿来个干净的痰盂，叫所

有的女将军围成了一个肉屏风，她就安居其间，一下子解决了。像这样的情况，告诉人谁都不会相信，可是事实确是这样。

我们正吃到一半，傅式说老婆章慕君赶到了，后即陪同到了浙江抚台衙门旧址，也就是所谓“群众欢迎大会的会场”。伪浙江省政府傅式说以下几个大汉奸，早已恭候在那里，被胁麇集在那里的老百姓，大概也有一千多人。但他们与“清乡”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关，因为当时杭州根本不在“清乡”之列，与陈璧君要“视察”的，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毫不相关。

大会的程序很简单，先由傅式说吹捧一通，作为开场白，然后他邀请陈璧君向大家讲话。或许陈为了要炫耀自己，便一一介绍她的随员，其中有文有武，有男有女，以显示她这个女人并不简单。介绍完了，就要陈群代表她向大家讲话。陈在当时一无准备，可又无法推却，只好声嘶力竭，不知所以地胡诌了一阵。好在地广人稀，又没扩音设备，谁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草草终场，算是演完了这一幕。

杭州是个风景区，可是经过日寇的铁蹄蹂躏，已是满地荆棘，除西湖外，可说是寸步难行，仅逛了一次黄龙洞，也是大动干戈，费尽力气。

接着是参观的第一个地方，便是圣佑观小学，它是泉唐书院的后身，在杭州算是数一数二的小学校。可是陈璧君只当它是一条死胡同，走了进去连脚没有停一步，就出来了。

章慕君又把我们领到一家织绸厂参观。这家厂的规模也小得可怜，操作都是手工，织机也都是木制。那些大的绸厂，如虎林纬成，这时已为日寇华中蚕丝公司强占了去。临去时，这家绸厂的老板对我们去参观的人，每人送了两件衣料，对这个厂来说，是受了一次意外的剥削。

这天的午饭是在西悦来吃的。这家菜馆在杭州也算是一家老馆子，我们也照上午奎元馆的办法，把它全部包了下来。我们到

了那里不久，傅式说接到了章慕君的通知，也赶到了西悦来。随即看到了这菜馆附近加添了岗哨，馆子门口也站了六、七个警察。

在席间，傅式说问我：“晚饭预备在哪里？”我说：王顺兴。傅说：地方太脏了。陈璧君听了说：“只要好吃，再脏无妨。”傅一听无法更改，便说：那我叫省会警察局去布置一下。陈即阻止说：

“不要这个，我不爱这一套，就是你们贤伉俪俩，我也请你们不要劳驾，因为你是地方官，总感到有不便的所在，这是我知道的。”傅只好唯唯，没有接下文。后来傅单独对我说：“杭州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再说没有一点排场，她要不高兴的。”

我觉得傅的前一句话是老实的，后一句也算是窥测到陈的内心，可还不够全面。我说：“你的话对，没有排场，她会不高兴，可是真的有了排场，她也要表示不高兴的。我们要在她要与不要这一点上把它突出，这才是她真正要的东西。至菜馆内部的安全，我已叫杭州区作了布置，你看现在不是很好吗？”傅说：那我们是临时来突击一下子，所以食客大家不知道，很安静。王顺兴的食客，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上、中、下三等都有，那就不像这里西悦来了。我才告诉他：这里的上下食客也是我们的。傅才恍然大悟，便说：那是化了大本钱的。我和他开玩笑说：“决不向省政府报销。”傅说：她现在这么一说，晚上的事我倒很为难了。假使一点不戒备，万一出了点事，我吃不消。我说：你还是照你的计划去布置，即在王顺兴门口尽可以派十几名警察站岗，但要省会警察局长也要在门口守候，并要他和我搭配唱一段戏，调儿身段都很简单，只要我要他把门口岗位都撤掉时，他照办就是了。可能我的语气在份量上重一点，叫他只把这话当作台词就算啦！这样她真正要的东西也得到了，当然会十分满意。至沿途岗位，不妨照加，店内安全，我负责任。傅连称：“好，好！”就这样去进行了。

饭后也不及回西冷去，就在西悦来稍事休息。陈便率领男女

人等，到了东街路一百号（原系基督教的蕙兰中学）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和特工总部杭州区。陈璧君大概对特务颇感兴趣，所以要到这里来视察。她召集了所有特务人员，亲自讲了话，还分别接见了在杭州的特务头子，不过其中有一个，她就事先关照不必出来和大家见面，那就是在河内指挥枪杀汪精卫未获、而打死了曾仲鸣的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大特务陈恭澍（陈原系军统上海区长，为76号逮捕后投汪伪，时在杭州为李士群训练特务），其原因为了有曾仲鸣的老婆方君璧与曾的胞姊曾醒都在场，怕因杀夫、杀弟之仇而吵闹起来无法收场。陈璧君还自我解嘲地对我们说：“在当时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嘛！”由于陈璧君的安排，少演了一出丑剧。

离开了东街路一百号，陈璧君在杭州“视察清乡”已是全部结束，余下来的时间就是逛大街，买东西。在舒莲记买了许多洒金折扇，预备带到广东去送人的。又在咸章、大经等绸缎铺里买了大批湖绉和杭纺。把大家身上带的钱都凑出来给她买光了，还是不够，于是我只好临时出后门，向“四省行营”借了三万元来给她。这个数目在当时已非小康之家所能拿得出的，这两家绸缎店，确是在门市上做了一注大买卖。

这天的晚饭按照预定计划，就在杭州的一爿老饭店王顺兴吃的。据传这家饭店在清乾隆年间已经有了，乾隆弘历下江南时，曾在它店里吃过饭，因此民国后曾在羊市街（当时杭州市面以这条街为最热闹。光华阁前面分设过一爿皇饭儿，但因经营不得其法，所以歇业了。而在清和坊竹斋街的老店，还是生意鼎盛，两家赵长兴、两家天香楼的营业，谁都比不过它，所以我拣中了这一家。

当陈璧君的这一辆汽车领先到达王顺兴的门口时，不仅沿途警察都是对岗，即饭店门面也站了十几个警察，那个姓陈的伪省会公安局长，早已恭候在那里。车子一停，那个公安局长便过

来径启车门，待陈璧君跨出了汽车门，就听得一声“敬礼”。这时我已下了车，我便煞有介事地对那个警察局长说：“关照你们不要这样子，为什么还是这样？快些撤掉。”那个“局长”一声“是”字，把手一挥，自有人把警察带走了。陈璧君东西虽没有吃到，可已感到非常的满意，因为她要沽名钓誉，已如愿以偿了。

我们大伙儿涌上了楼，那个名誉陪客实际主人的徐朴诚，早已先我们而来了。除了为我们留的几个席面外，真是上下撑堂（客满），坐无虚席。当然这些吃客都是东街一百号杭州区的特务。只听得陈璧君对褚民谊的老婆她们说：“杭州的市面还不错！”这不知她是真的这样想法，还是自欺欺人，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这晚除鱼翅甜菜之类的几个大菜是徐朴诚叫厨师另烧外，其他的菜都是王顺兴的当地风味，如生炒鳝片、醋溜鲜鱼、炸响铃儿、蜜饯火方，乃至咸件儿、猫耳朵儿、三虾儿、豆腐，这些大众食品，也一律搬上了席面，主要是大家尝尝味道而已。

当徐朴诚也在敬酒的时候，我特地带他向陈璧君介绍。在散席临走的时候，我在席外转了一个圈子，对陈璧君说：“夫人，今晚这里的帐，已给‘徐军长’抢会掉了。”陈就唔了一声。这样我算是交待清楚。徐朴诚又深怕陈璧君忘记了是那一个“徐军长”，因此又走了上去，鞠了一个躬。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回到西冷饭店，得到通知，说是明天一早要去绍兴。我茫然不知道去那里干什么？便向陈春圃（陈与我睡在一个房间里）去绍兴干啥？陈说：是去看看“先生”的祖茔的。我倒觉得有些奇怪，汪精卫是广东新会县人<sup>①</sup>，他的祖坟怎的又会在绍兴？可又不便再追问，反正我总是看热闹的一个。翌日清晨，我们在西冷饭店才吃过了早饭，傅式说夫妇已陪同浙江省的联络部长日寇渡边大佐，带了一大卡车的日本兵和两卡车的保安队一起来了。接着特工总部的杭州区也开来了两部敞蓬车，上面满载穿着西装笔

<sup>①</sup> 汪精卫生于广东三水，寄籍番禺，此处误。

挺的特务喽啰，每人身上挂了一挺快慢机，左臂还缠了一条上面印有“青天白日”，中间还写有一个“特”字的臂章，深怕人家不知道他们是特务似的。说穿了，这还像特务吗？其实这也是做给陈璧君看看的。

这个车队是由日寇联络部长渡边与傅式说的坐车带头，接着是日寇的兵车与两辆特务的敞蓬车，前后簇拥陈璧君的保险汽车，后面才是其他一些人的车子，最后是殿以两卡车的保安队。虽然只有十几辆车子，可也长长的一队了。

钱江大桥炸毁以后，日寇还是无法把它修好，在高低不平的桥基上铺了几条长大的木板，大队汽车便在它上面缓缓地驶过，确也相当危险。到了绍兴，已是傍午，便在县商会里稍事休息，就在那里吃了午饭，又乘汽车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小水埠头。大伙儿弃车登舟，用小火轮把我们的船拖送到了一个小沿河的地方。那里早有许多僧尼在一个坟墓前敲得铙钹有声，就在这坟墓前大做佛事。原来这里就是汪精卫父亲的坟墓。墓碑上镌的是“曼亭公之墓”，下款是汪兆镛具的名。这汪兆镛就是汪精卫的哥哥，所以汪精卫的名字是叫兆铭，也是兆字辈金字旁。为什么在墓碑上只有兆镛而无兆铭？大概他父亲死的时候，汪精卫正因行刺摄政王未成被羁于北京刑部大狱，深恐受到牵连，所以不敢把名字镌上去。我因看到曼亭的“曼”字，有些好奇，便随口地问春圃，这曼字是不是排行？这句话却给陈璧君听到了，带了一些不高兴的语气说：“要说曼字排行，你还是我们的长辈啦！”话倒是实在的，可是我却窘得无地自容。

在佛事中从陈璧君起，受和尚指挥，向死人墓前先后行了礼。我们这一起不相干的人，也集体地行了三鞠躬，算是应有的点缀。前后没到半个钟头，又乘原来的舟车回到了杭州。这场鬼把戏大概是来杭州“视察”的主要内容。

回杭后的第二天，便乘原来的那辆包的专车，挂在特别快车

上匆匆回沪。伪四省边区行营每人送了我们一网篮的杭州土产。傅式说知道了，临时也照样来了一套，把一辆专车塞得满满的，真是劳民伤财，满载而归。陈璧君的“视察”清乡，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活见鬼。

## 二十四、镇江地区的“清乡”

江苏省镇江地区的“清乡”，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始的，它是在伪清乡委员会时期，在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最后的一个“清乡”地区，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才告结束，为时达二十个月。它对革命力量的摧残与破坏，起了极为严重的作用。在这个地区负责的“清乡”机构，从开始到同年九月，称叫“清乡委员会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后来由于伪清乡委员会的撤销（一九四三年五月廿日），各地“清乡”改由各该伪省市府自行办理后，改称为伪“江苏省第二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前者隶属于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后者则为伪江苏省政府了。此外还设有伪区保安司令，初属伪驻苏办事处，后亦改隶于伪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又有伪镇江地区清乡党务特派员办公室，亦隶属于伪清乡区党务办事处。还有一个“政工团”，配合了党务机构，从事反革命的政工活动。

伪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的伪主任一职，由伪江苏省教育厅长袁殊兼任，伪副主任为张修明。改为江苏省第二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时，“专员”一职，初仍由袁殊兼任，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改为张修明。公署下设秘书室和一、二、三、四、五、五科，分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封锁、警务、以及军法、军务，另外还设有军法室与警卫大队。伪军法官由伪主任与专员兼任。伪镇江地区保安司令，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前，由伪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派候莹充任。主任公署改组为伪专员公署后，伪党务特派员为沈千里，伪政工团的正、副团长，由张修明、沈千里分别兼任。这从一个地区的组织来说，是相当庞大的。



伪主任公署与专员公署之下辖三个县区，计为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在伪主任公署未改组前，也和其他“清乡”地区一样，分设为三个特别区公署。伪署长代行县政，改组后亦恢复了县治，改称“县长”，计镇江由张修明兼任；丹阳先后为杨诚、邱松甫；扬中先后为丁雨林与章棋，概受主任与专员的直接指挥。各县分设有伪封锁管理所，伪主任一职，也和各地一样，由署长、县长兼任，实际由副主任负责，直接受主任或专员公署第四科的指挥。各县的伪保安大队长，也先后由署长、县长兼其名义，由大队附负实际责任。在丹阳还设有伪警察大队，伪大队长田斯显，受伪清乡警察总队的指挥。伪清乡委员会撤销、主任公署改组后，也改隶于伪江苏省警务处了。

在这个地区日寇的所谓联络机构（实际是控制机构），由日寇的江苏省联络部设立了“地区出張所”，所长是日寇上田春荣。各县也分设有“县出張所”，设联络官。伪特别区公署与伪县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日寇控制下进行的。

镇江地区为大江南北的出入要道，以地接新四军在江南的茅山根据地，因此成为革命力量南北贯通的交通要隘。当日寇进行反动的“清乡”罪恶活动以前，在这个地区，日寇在军事上仅能控制一些点线，而广大的农村，都为新四军或人民武装自卫力量所掌握。开始“清乡”后，日寇即在这个地区进行了疯狂残酷的军事扫荡，并由汪伪“清乡”机构胁从当地居民捐钱服役，在这个地区的周围，筑起了竹篱笆，水道、交通要道设置了大小“检问所”。各县亦在各区设置了区、乡、镇公所，从而调查户口，编组保甲，举办联保切结，用以巩固日寇的“军事”成果。伪政工团亦派遣分团进驻到几个主要的区里，进行反动的政工活动。伪主任公署还发动各县，在指定的各个区里，实施所谓“重点突击”，妄图把反动政权巩固下来，而日寇的小部队亦在各个据点不断进行搜索。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四军所领导的镇江、丹阳的地方武

装，处境十分困难，革命力量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 二十五、伪清乡委员会的撤消与伪“清乡事务局”的设置

伪清乡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筹备，七月成立，日寇便把汪精卫推在前面，当作广告，大吹大擂，把汪伪政府的罪恶活动，集中在“清乡”上面，妄图把它当作完成侵华战争的一剂神仙妙方。可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与反动派的意愿背道而驰，“清乡”地区的人民，由于受到“清乡”的迫害，激起反“清乡”的怒潮，且愈来愈见汹涌；而伪组织的汉奸群里，亦由于“清乡”与非“清乡”之间的利害关系日复尖锐，双方的明争暗斗，也推向高潮。甚至连清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仅居名义）周佛海，为了自身（周逆本职为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及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利益（国税的征收与伪中储券的推行）也受到侵害，因此也高嚷“清乡”地区愈扩大，行政院的权力愈缩小（清乡地区的行政，伪行政院都须交给清乡机构，因此它是汪伪政府中的独立王国，不受行政院的牵制的）。可是“清乡”过的地区，虽一天到晚高嚷着骗人的鬼话，什么“确立治安”呵！其实这些汉奸心目中的治安，不但没有“确立”，反而更糟了。即以无锡来说吧，“清乡”不知进行过几期，后来感到自己也说不过去，才勉强宣告了“清乡结束”，实际又砸了。再加一期吧，自己也感难于启齿；不再来又不行，于是便巧立名目，叫做“刷新工作”。意即过去做的又旧了，现在再替它刷新一下。也可见敌伪双方的内心狼狈，正说明敌伪双方想用“清乡”来作为神仙妙方，来镇压中国人民是依然不灵，行不通的。至于改善民生，那倒做得仅是一字之差，就是把“善”字改为“恶”，因为凡是经过“清乡”的地区，人民的生活都是陷于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要是把它说是“改恶民生”，才是名实相符。

日寇是热衷于“功利主义”的，要是把“清乡”宣告失败，

就此停办，那主张“清乡”的日寇，就得切腹自杀；而从事“清乡”的几个头头，都得受到处分，影响他们今后的升迁，且这个数目是不少的。要是照旧硬干下去，不仅加深汉奸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更暴露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弱点，于是决定将伪清乡委员会撤销，把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该伪省市政府自行办理，这样也可以使汪逆免得“将军”独出，把失败的这笔帐，都算在他头上，不如藉此撤销，得以收蓬落帆，作个适可而止。不过由于过去把“清乡”渲染得太过份了，一旦就嘎然而止，对今后各伪省市政府要进行的“清乡”打击太大。于是在伪行政院与各伪省政府内，都设置了一个“清乡事务局”，以为对内计划审议的机构。它只对伪行政院或各该伪省市政府负责，不得对外，也不行文，所以既无印信，也没关防。至于“清乡”计划，向来都由日寇越俎代庖，不用自己费心，日寇所拟订的计划，或是文件，它的一字一句，还不是依样画葫芦，完全照办？那么所谓审议也者，还不同样是句空话！所以伪清乡事务局之有无，对当时的“清乡”情况来说，一无作用，只是在伪清乡委员会撤消后，为了掩盖自己可耻的失败，来作为欺世骗人，给留下一个“清乡”躯壳的僵尸而已。

在伪清乡委员会撤消前夕，汪精卫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今后的‘清乡’要全面开展，不再由中央派员直接去办，而由各省、市、市政府自行办理，所以‘清乡委员会’无再存在的必要，应予裁撤，另在行政院与各省、市、市政府内分别设置‘清乡事务局’，以为内部的计划审议机构。因此也毋庸对外，只是对‘行政院’与各该省、市、市政府负责而已。行政院的清乡事务局长一职，为了驾轻就熟，我想请你担任。”汪逆不待我答复，继续地说：“清乡委员会一经撤消，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以为中央不要‘清乡’了，这就易于造成今后‘清乡’的不良影响，所以我想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清乡会议’，以示中央对今后的‘清乡’还是重视的。这个会

议也希望你能着手准备。”这时我把要讲的话，都给他堵住了，只好接受下来，一一照办。

关于要召开一次“清乡会议”，我早在伪军事顾问日寇金子那里得到了消息。这个会议的召开，当然也出自日寇的主张。而汪精卫却向我煞有介事地把它说成是他的意思。

伪清乡委员会与各地的“清乡”办事处及上海分会，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sup>①</sup>起，都先后撤销，同时在伪行政院与各省市政府内设置了伪清乡事务局，我以伪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任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局长，伪副局长是由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中将厅长徐传楹来兼任的。

伪清乡委员会虽是配合日寇军事的一个政治组织，但其性质无异是一个军政混合机构，因此里面的人员，都用同军阶的。如处长一职的伪官，相等于伪军事委员会的厅长，故亦叙为同少将或中将一级。现在的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是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为了审核来文的便利，便把清乡委员会原来的各处改为科，专为伪行政院核办各省、市政府有关“清乡”的来文，并代伪行政院分配“中央”对各省市的“清乡补助费。”同时各地的“清乡”情况，汪精卫已不再亲自去“出巡”，而改由我或我派员出去“视察”，然后再把“视察”情况向汪逆汇报。不过每次出去“视察”，我从未作过主动，也都是由伪军事顾问部的日寇临时通知，也是像被牵着鼻子跟他们走的。我去视察过的地方，有上海的南汇、川沙，江苏的丹阳、南通、苏州（伪省府所在地的地方是必须去的），浙江的崇德、杭州，安徽的芜湖、蚌埠，湖北的汉口、武昌，广东的东莞、广州与香港。香港虽然不属广东省，且也并没在“清乡”，可是驻广东东莞日寇的“清乡”部队，是受制于日寇的香港总督府的。我到香港去，是专程拜客，别无目的。这在日寇的习惯来说，也算是“礼不可废”！

<sup>①</sup> 应为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

淮海、浙东那时虽也在“清乡”，却从未要求我去“视察”过，因而情况不明。

至于“视察”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查问一下“清乡”后，这个地区的人口、赋税比在“清乡”前是否有了增加，从而来决定这一地区的“清乡”有无成效。

各地的伪清乡委员会办事处与上海分会先后撤销后，县一级的“清乡”特别区公署也恢复了原来的县政府，把“清乡”的各种罪恶活动，也都包纳到一般的行政中去，使这地区的“清乡”与一般行政扭成了一片。“清乡”与地方行政的矛盾，虽因此得以消失，而哀哀无告的百姓，却受到双重的压榨与迫害了。

## 二十六、所谓“清乡会议”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伪清乡委员会开始筹备时，汪精卫召集过一次“清乡委员会”的会议。这次会议，无非要说明进行“清乡”罪恶活动的理由与建立机构决定人事，这次会议后，“清乡委员会”便没再召集过。

伪清乡委员会撤销后，曾在南京鸡鸣寺脚下、汪伪国民政府的大礼堂里，由伪行政院召开了一次所谓“清乡会议。”<sup>①</sup>虽出席的人员大都还是汪伪政府有关的各部会首长，各省市政府的地方行政人员也参加了。虽然不是伪清乡委员会会议的继续，而是另一个“清乡会议”。

这个“清乡会议”，虽由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为之筹备，而提案却预先征自各地方的伪省市政府与在南京的有关部、会。惟每一提案，事先概由伪军事顾问部拿去转送上海日寇的登部队（十三军）先行研究，附注意见，再行发还，然后方得列入议程。要是这提案与日寇的意见根本不对头的话，就使之难产，干脆不予提出，所以提到会上的提案，都是先做好的决议，然后再付讨论

<sup>①</sup> 此次会议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举行，名为“清乡工作会议”。

的。“清乡会议”如此，汪伪政府的其它会议，恐怕也很难例外。不过对“清乡”来说，日本鬼子是抓得更紧，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实。

这次“清乡会议”，汪精卫不知为了什么没有亲自来主持<sup>①</sup>，会议始终由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主持的。日寇方面参加的为汪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将，他的座位仅次于会议的主席，而权力过之，所以他的致词，完全是在对出席会议的人在“训话”。此外还有专任“清乡”的军事顾问金子俊治大佐与联络员有吉大尉，他们的座位，都是在柴山的后面，当然都没有发言。

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主要是为了掩盖两年来“清乡”活动所遭到的失败，并以此强调“中央”对这血腥的“清乡”仍属“重视”，为今后“地方政府”推行这一罪恶活动时，鸣锣喝道。

由于这次会议仅是一个骗人的宣传工具，所以并没有突出的提案。我当时是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局长，又是这个会议的筹备人，因此我在这次会议中提了三、四个提案。其中有一个方案，是把今后各省市地区的“清乡”时间，作了一个硬性的规定，这也是我任伪职中最主要的罪行。我提这个方案，因有鉴于过去在江苏进行“清乡”活动时，尤其是在无锡所遭遇到的情况，由于日寇不甘心它连续所遭到的失败，便把这一地区的“清乡”，一再的延续下去，即是宣布了“清乡”结束，还要来上一个“刷新工作”。所以我在这个提案里把清乡的各个阶段，在时间上都作了硬性的规定。如筹备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实施时期，最多为两期，每期为六个月。我还把日寇过去进行“清乡”活动时的各种项目与步骤，也把它逐项按期按时予以规定，使日寇无从借口。

伪清乡委员会一经撤销，自伪行政院起，各伪省市政府，也都先后设置了伪清乡事务局，这次“清乡会议”各省市政府的清

<sup>①</sup> 时汪精卫因背部手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后，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

乡事务局长，也都赶来参加。现在我顺便来谈一谈一件丑事。

伪湖北省政府清乡事务局长叫王遇甲，湖北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在他没有来南京之前，金子俊治与有吉省悟，都曾先后向我“推崇”王遇甲的为人，说他是生活俭朴、道德高尚、平日茹素念经，无异像个菩萨。王到了南京先来看我，我见到了他，不觉为之一愣，原来他是穿了军装来的。本来穿军装的人南京有的是，而王的这套军装，当时在南京却找不出第二套，因为王所穿的这套军装，除在日本式的军帽上缀有一个“青天白日红边”的帽徽外，可说无一不是日本式的，即他挂的中将领章也是日本式的。不仅服装如此，即说话的语气和举止，几乎找不出一点中国人的气味来。我问他是不是生长在日本，还是现在才回国的？他说回国已二十多年了。我又问他：除任伪清乡事务局长还兼什么军职？因为这个伪局长是个文职伪官，用不到穿军服的。他说：没有。我只好带着劝解的语气对他说：“你穿制服行动不方便，带了便衣没有？”他不仅回答了我“没有”，好象嫌我啰嗦似的，还补上一句说：“这样满好嘛”。他既嫌我啰嗦，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我想明天的“清乡会议”，即把这个家伙点缀其间，也够瞧的了。

这天开会的时候，王遇甲因在南京没有熟人，到会场去既借不到车子，只好雇了一辆黄包车，穿了这套非驴非马的军装，招摇过市。来到了汪伪国民政府，车夫当然不敢拉进去，也只好在门口下了车。他虽穿了这套奇装异服，胸前却佩有“清乡会议”的进入证，门前的岗位，还不是照例地来个“立正礼”，让他大踏着日本将官的方步而进，好像还满怀得意似的。这时在会场里的人远远地看到了王遇甲，从他走的方步与穿的服装来看，以为是个日本将官。奇怪的怎会没有车子（日寇的尉官，如因公外出，也有汽车代步）？因此大家格外注意，直至走到会场前才看到帽徽，知道

是个中国人。这时汪伪的训练总监叶蓬<sup>①</sup>，就走上前去，把王拦住，问王是那里来的？王就告以他的身份，叶蓬便说：“我姑不管你应不应该穿军服，即是要穿军服，我们中国的军服也有一定的式样，像你这样穿得不三不四，给人看了岂非笑话？我是训练总监，有权也有责任，不许你进入今天的会场。”后来经我解释确未带有便服，并知道他是远道而来开会的，再经人调解，叫王遇甲把军帽、领章、日本军刀等一律取下，放在会场外面，才许入场。

## 二十七、从黑暗到光明

在沦陷地区的清乡罪恶活动，自一九四三年改由各伪省市市政府自行办理后，各地方政府的汉奸头目，为了迎合日寇侵华战略的需要，纷纷把这罪恶活动继续推进，江苏由江南的苏州、锡、武、澄与镇江三个地区推进到长江以北的南通；浙江则由太湖东南第二期地区，向杭州地区伸展；广东、湖北两省与淮海特区，亦相继开办，先后成立了伪清乡事务局。其各伪省市政府的清乡事务局长，江苏先后为谢雪荪、孙育才、高鹤飞，浙江先后为汪希文、章颐年、×××，安徽先后为谢愈同、魏曙东、蔡耕舜、×××，上海先后为莫雅德、熊剑东、苏成德，湖北为王遇甲，淮海区的是否叫郎依山（？）不敢肯定，广东的忘了。

汪伪中央政府把“清乡”推给了地方政府，势必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经费不能不由伪中央来补助。这笔清乡补助费，在年度预算中，仍成了最庞大的一个数字，确使汪伪的财政部长周佛海伤透了脑筋，于是叫我去商量，能否打消这笔补助费？我说唯一的办法，只有取消“清乡”，才是釜底抽薪。周就要我拟个方案来大家研究研究，我就根据我们商谈的结果，拟定了一个方案，把所有“清乡”的内容全部进一步地渗入到县一级以下的一般行政中去，但并不突出“清乡”两字。就是说，虽有“清乡”的实质，

<sup>①</sup> 叶蓬时任伪军事委员会陆军部长。



而无“清乡”的名义，可是县长、区长的效绩，则以这个地区能否确立治安与增加人口和赋税为准。由于既没有标榜“清乡”，伪行政院与各省、市政府的清乡事务局，自无继续设置的必要。同时“清乡”既溶合于一般的行政之中，也就是说，“清乡”既成了一般行政，伪中央自己毋庸专款补助了，所谓“清乡”也者，也就无形取消了。周看了说：很好！我与陈公博商量后（时汪精卫墓木已拱，陈逆已任为代主席），再同日本方面联络。后经周逆通知我说，陈也同意，要我把这方案送交伪军事顾问部。不久，有吉告诉我：军事顾问部对此一无意见，已把它转送给军方了（上海登部队）。我满以为日本鬼子对于“清乡”已感精疲力尽，也要藉此收场了。谁知过了一个时候，伪军事顾问部竟把原件退回给我，说是军方不同意，并指出：这个方案不是要加强“清乡”，使我们感到惊讶的，这个方案竟出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长，不能不使我们深感遗憾。因之周佛海的希望就落了空。

在日寇八年侵华战争的岁月里，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前仆后继地与敌人作殊死战，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使日寇在战争的泥淖里愈陷愈深，无法自拔。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一举击溃了日寇的百万关东军，使日寇输掉了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它在沦陷地区进行了多年的“清乡”罪恶活动，才遭到了真正彻底的失败。抚今忆昔，我在抗战时期的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日寇在“清乡”区犯下的血腥的滔天罪行，都有我的一份，给国家和人民以及革命事业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真是罪无可道，百死莫赎。

#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63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闻少华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李学通

##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63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69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册

统一书号：11190·190 定价：1.45元